



# 「西湖小說」之研究

## 提 要

本論文所探討的是小說史上一個文學現象，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一為地域文學的關注；二為敘述學的角度。閱讀中國白話短篇小說時，可發現上至早期宋元話本，下至清初的話本小說，有許多故事，均以杭州或是西湖為背景的故事。明代中葉後白話小說的蓬勃發展，話本小說中集大成「三言」、「二拍」、「一型」等，也出現大量的以杭州或西湖為背景故事，尤其《西湖二集》《西湖佳話》等書陸續出版，「西湖小說」達到了最高峰。此外，除了西湖故事外，晚清之前尚未見有以城市為集體書寫的對象。

本文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緣起、研究範圍與方法；第二章主要針對外圍整體性去探討，簡述杭州的歷史、地理環境，以及優勢的文化條件，以期能對「西湖小說」作充分了解；第三章主要將「西湖小說」分為三大題材進行討論，分別是「講史」、「宗教」、「愛情」等，此外，更關注故事與地理景觀的相關性；第四章討論「西湖小說」所呈現出各種巧妙地藝術技巧並如何達到真實性的訴求；第五章對「西湖小說」探求背後的文化內涵，以了解大量的西湖故事所以產生的深層因素；第六章結論。

「西湖小說」是中國小說史上一個重要的環節，西湖故事的大量出現並非偶然。它與杭州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尤其是南宋之後，政治、經濟、文化南遷，所造成的小說書寫的城市現象。西湖小說的內容，彰顯出當地強烈的地域色彩，呈現出各式各樣的人物、風俗、語言、文化等豐富內涵。所以，對於小說的研究，以地域文學的角度去把握、省思，是值得一試。

關鍵字： 西湖小說、話本小說、地域文學、杭州、西湖

## 第一章．緒論

### 一．研究動機

筆者閱讀白話小說過程時，發現到不僅歷代詩詞以西湖為書寫對象，上至現存宋元話本；下至清初的話本小說<sup>1</sup>。有許多的故事，均以杭州或是西湖為背景的故事。現存宋元話本中，就有〈西湖三塔記〉、〈勿頸鴛鴦會〉、〈錯認屍〉、〈碾玉觀音〉、〈錯斬崔寧〉、〈菩薩蠻〉等多篇。明代中葉後白話小說的蓬勃發展，話本小說中集大成「三言」、「二拍」、「一型」<sup>2</sup>等，也出現大量的以杭州或西湖為背景故事。尤其《西湖一集》<sup>3</sup>、《西湖二集》、《西湖佳話》等書陸續出版，「西湖小說」的創作和流傳，達到了最高峰，成為小說史上。

這樣以城市為集體書寫的對象，在西湖故事之前是未曾有過的。直到晚清時開始出現《楊州夢》、《蘇州繁華夢》、《蘇州老騷》、《上海之秘密》、《廣州亂世記》<sup>4</sup>等書，以特定地名作為小說書名。從上所論，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杭州西湖乃是中國小說史上最早以該地名為書命名的集體現象。其二「西湖小說」時間上剛好與話本小說的發展吻合。從宋元開始茁壯，在明清交替時達到頂峰。從這個視角而言，「西湖小說」昭示了古典白話小說的嬗變軌跡。因此，「西湖小說」的

---

<sup>1</sup> 宋人所說的「話本」，原本並不限於短篇小說，後來由於約定俗成，為有別講史與其他體制，便專指「小說」。一直到了明代，因為有許多文人模擬宋元話本的體制、形式而進行創作或改作的小說。因此，給予這種案頭寫作的話本，一種新的稱呼為「擬話本」。不過，就目前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領域中，不管是「話本」或「擬話本」，所指皆是短篇白話小說，因此大多學者通稱「話本」，筆者也認同「話本」的定義可以採取範圍比較廣的說法。

<sup>2</sup> 「三言」指的是馮夢龍所編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書；「二拍」指的是凌濛初所編撰《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二書；「一型」指的是陸人龍所編撰的《型世言》一書。

<sup>3</sup>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3〈明清小說甲〉：「《西湖一集》佚，不知撰人。但《西湖二集》卷17〈劉伯溫薦賢平浙中〉篇曾引書目，云『《西湖一集》中〈占慶雲劉誠意佐命〉，大概已說過。如今這一回補前說未盡之事』」頁107。（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sup>4</sup> 上列所引用書籍，乃參照歐陽健等編著《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一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1991年）

繁榮，背後必定有其深層意義和文化現象。

西湖，古稱武林水，又稱金牛湖、明聖湖<sup>5</sup>。在唐代，因湖在錢塘縣內，改稱錢塘湖。此湖又位於杭州城西面，故稱「西湖」。至於它的成因，有許多種說法和傳說，不過經近代學者考證認為是西湖原是錢塘江出海的一個海灣，因河沙的沉積作用而形成為潟湖，江海舊地含鹹水和淡水，又經長期演進而形成淡水湖。現在西湖的面積大約有五、六平方公里，南北長約三千三百公尺，東西寬約二千八百公尺。

它是名聞天下的「人間天堂」，令人稱道不已的是其秀麗的風光和豐富的人文古蹟。回顧許多的歷史軼聞，戰國時期吳越相爭，有范蠡帶著西施隱姓埋名於此，兩人忘懷一切政事紛擾，整日泛舟於西湖之上。唐代有李泌、白居易前後到當地任官。宋代，有王安石、歐陽修、梅堯臣等聞說西湖美麗動人，都親自到此一遊，尤其蘇東坡共有兩次治理杭州，為當地百姓立下不少偉大的功績。並且留下許多歌詠西湖的詩詞，傳頌最廣，影響最深的，莫過於〈飲湖上初晴雨後〉：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sup>6</sup>

因為這首詩的流傳，使西湖從此有個美麗的代名 - 「西子湖」。如今多少歲月流逝，這一湖的青碧依舊，粼粼水光裡埋葬許多千古幽遠淒美的傳說。而且，西湖的山光水色道之不盡，湖畔柳絮紛飛、畫舫漁火點點、深邃幽遠的鐘聲，無不寫入在歷史文人的詩文中，尤其著名的「西湖十景」<sup>7</sup>更是不能錯過。

---

<sup>5</sup>（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6〈漸江水〉：「錢塘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父老傳言有金牛古見之，神話不測，湖取名焉。」（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1〈西湖總敘〉又云：「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勝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塘也，又稱錢塘湖。」頁1。（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

<sup>6</sup>（宋）蘇軾：《蘇軾詩集》（上），頁430。（台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

<sup>7</sup>「西湖十景」分別是蘇堤春曉、柳浪聞鶯、花港觀漁、麴院荷風、雙峰插雲、雷峰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南屏晚鐘、斷橋殘雪等。這十景的題名，主要是因為南宋畫家馬遠、陳清波

當然，白話小說中故事產生於杭州，並以西湖為背景的小說，並非只有短篇體制，長篇的小說也不算少數，如西子湖伏雌教主《醋葫蘆》、西湖香嬰居士《濟公全傳》、玉花堂主人《雷峰塔傳奇》……等。受限於筆者才疏學淺、時間有限，故本文限定以白話短篇小說中，產生於杭州，並以西湖為背景的作品為研究的對象。

## 二．研究範圍

本文所指「西湖小說」乃是產生於杭州，並以西湖為背景的故事。然而，引用「西湖小說」這個名詞，並非從本文開始。最早見於范宜如〈話本小說中詩詞運用及其意蘊 - 以「西湖小說」為例〉<sup>8</sup>一文，該文所指的「西湖小說」乃是以浙江文藝出版社編纂而成的《西湖古代白話小說》<sup>9</sup>與《西湖佳話》、《西湖二集》等三書為討論對象，分析詩詞在小說情節中的敘事功能，主要有「情節之導引」、「詩讖預言」、「結尾贊詞」等功用。進一步就詩詞內容歸納為「因緣果報的循環」、「宿命觀點的闡釋」。但全文所推論出來的結果，幾乎沒有呈現出西湖地域的色彩，關注的是詩詞在話本中運用之情形與其中意涵。

去年底北京大學劉勇強教授也注意到「西湖小說」的重要，發表了〈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sup>10</sup>一篇論文，發表在《文學遺產》期刊。主要闡述西湖小說具有雙重性格，除了強烈文人性外，內容兼具有世俗性；另外用敘事學觀點，表示西湖故事中人物的活動，常集中於西湖或寺廟等場景。然而，劉教授在文中所舉例的西湖故事屬於隨機抽樣式，簡單用數篇故事為代表，呈現的是一個

---

在畫西湖的風景畫作上所作的標題，之後，得當地百姓的流傳，成為著名的旅遊勝景。

<sup>8</sup> 范宜如：〈話本小說中詩詞之運用及其意蘊 - 以「西湖小說」為例〉，《國文學報》第 25 期 1996 年 6 月，頁 267-289。

<sup>9</sup> 《西湖白話小說》內容主要從「三言」、「二拍」、「石點頭」、「五色石」等書中，選出二十四篇以西湖或杭州的背景的白話短篇小說，（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年）

<sup>10</sup> 劉勇強：〈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文學遺產》2001 年第 5 期，頁 60-72。

概括文學現象，有其侷限性，當然對「西湖小說」背後的歷史、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尚未有全面性探討與分析。

同樣地，去年底出刊《女性的主體性 - 宋代的詩歌與小說》論文集，收錄了學者宋莉華〈汴京與杭州：小說中的兩宋雙城記〉一文，論文中有一小節討論「經濟重心的南移與「西湖小說」的繁榮。」<sup>11</sup>簡略用兩千多字提到「西湖小說」的興盛，主要是南宋定都於杭州，和明末經濟商業的發達所促成，表達出政治與經濟對文學具有重大且深遠的影響力。

除了以上三份期刊論文，與「西湖小說」有直接密切關聯外。其他專著方面，由於西湖故事時來自不同的話本小說，其中大部份的小說都有學者詳簡不一研究過。這些研究主要以一本話本為研究對象，如費臻懿《古吳墨浪子《西湖佳話》研究》<sup>12</sup>碩士論文，和張淑芬《周清原《西湖二集》研究》<sup>13</sup>碩士論文。這些學位論文大都分為四方面去探討，首先為作者與版本問題，再者為故事分類與內容簡介、主題思想，最後為藝術技巧探析等方面。然而從未有人將這些話本小說鎖定同一個地域為研究對象。並且從上面幾份論文的發表，令筆者更肯定「西湖小說」研究的意義，是值得努力，更有待全面性呈現。

首先，將話本小說進行全面檢索，利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sup>14</sup>、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sup>15</sup>、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sup>16</sup>等書目檢索，果然發現了大量「西湖小說」的作品。

---

<sup>11</sup> 宋莉華：〈汴京與杭州：小說中的兩宋雙城記〉，收於《女性的主體性 - 宋代的詩歌與小說》大安出版社，2001年10月，頁177-221。

<sup>12</sup> 費臻懿：《古吳墨浪子《西湖佳話》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1年5月。

<sup>13</sup> 張淑芬：《周清原《西湖二集》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4年6月。

<sup>14</sup>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台北：作家出版社，1957年）

<sup>15</sup> （日）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年）

<sup>16</sup>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台北：丹青圖書公司，1983年）

然而，在界定「西湖小說」之前，有二個問題要先提出來。第一是《京本通俗小說》的問題，從該書出刊都被認定為「元人寫本」的宋人平話殘卷本。然而經近代學者的考證，對該書的可靠性提出懷疑，首先是鄭振鐸先生，他就表示「從平話叢刻進化史 看來，元代會產生那末篇幅至少會有十餘卷以上得內容純粹且又編次井然的《京本通俗小說》，實是不可能的事。」<sup>17</sup>最後胡萬川老師更全面細心考證，發表〈有關京本通俗小說問題的新發現〉一文，明確指出：

其實，所謂的《京本通俗小說》並不是真的「元人寫本」的「宋人平話」，而是後人，最可能是就是繆氏本人（繆荃孫），將他所發現的《三言》 - 《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的殘卷，略動手腳，更動幾個人名字句所編成的。我們可以說，它實際是一本偽書。<sup>18</sup>

有鑒於以上學者的考證，可知《京本通俗小說》<sup>19</sup>乃是經後人編定而成的偽書，因此該書中有三卷發生於杭州西湖的故事，分別是卷 10〈碾玉觀音〉、卷 11〈菩薩蠻〉、卷 15〈錯斬崔寧〉。將予省略，不列入「西湖小說」之中。

第二是由於話本小說的發展上，時常可見作者將「宋元舊作」重新改編刊刻，「西湖小說」也有同樣的現象，如話本小說代表作家馮夢龍，將〈錯斬崔寧〉、〈錯認屍〉、〈勿頸鴛鴦會〉、〈碾玉觀音〉、〈菩薩蠻〉、〈李元吳江救朱蛇〉、〈五戒禪師私紅蓮記〉、〈張生彩鸞燈傳〉。分別改編為〈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喬彥傑一妾破家〉、〈蔣淑真勿頸鴛鴦會〉、〈崔待詔生死冤家〉、〈陳可常端陽仙化〉、〈李公子救蛇獲稱心〉、〈明悟禪師趕五戒〉、〈張舜美燈

<sup>17</sup> 鄭振鐸：〈明清兩代的平話集〉，頁 353。收錄於《鄭振鐸全集》第四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 年）

<sup>18</sup> 胡萬川：〈有關京本通俗小說問題的新發現〉，頁 2。收錄於《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94 年）

<sup>19</sup> 繆荃孫編：《京本通俗小說》（殘存七卷），（台北：世界書局，1975 年）

霄得麗女>。馮氏將這八卷發生於杭州的宋元話本，作了程度不等的修改，對主角的性格刻劃更為細膩，修改文句更為流暢，並加深了故事的思想內涵等，賦予作品新的生命力。對於馮氏的用心胡萬川先生也非常肯定，曾有云：

馮夢龍編輯《三言》，對於舊作是經過一番苦心修訂，而不只是簡單的將舊作彙輯成書了事的。他的修改是從題目開始，以至文字、情節整個內容的。因此，即使他所收錄的某篇果然是根據「宋人小說」而來，但是，我們卻不能輕易地收在《三言》裏的這篇仍然是「宋人小說」。<sup>20</sup>

因此本文將這些改編自「宋元舊作」的西湖故事，也收錄於「西湖小說」。如此一來，也能彰顯出「西湖小說」在小說發展的歷史軌跡上演變情形。最後試將書名與數量關係繪表如下：

---

<sup>20</sup> 胡萬川：〈從馮夢龍編輯舊作的態度談所謂宋代話本〉，頁 167-168。收錄於《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94 年）

書名	數量	書名	數量
《六十家小說》 <sup>21</sup>	7	《型世言》	2
《錢塘夢》	1	《石點頭》	2
《熊龍峰四種小說》	4	《西湖二集》	34
《萬錦情林》	1	《歡喜冤家》	6
《古今小說》	11	《十二樓》	1
《警世通言》	8	《西湖佳話》	16
《醒世恆言》	5	《二刻醒世恆言》	2
《初刻拍案驚奇》	4	《五色石》	1
《二刻拍案驚奇》	2	《豆棚閒話》	1

根據以上的統計，西湖故事共計 108 卷，詳細的出處、卷目請參見附錄(一)。

### 三． 研究方法與目的

關於西湖小說之研究，主要探討書寫相同地域下的作品，環境與故事的關連。希望有系統地呈現當地居民特定的心理與行為，並進一步探討歷史、地理、文化等因素對小說的影響，繼而發掘「西湖小說」作品中，共通的書寫模式和文化內涵，包括民俗傳統、經濟體系、宗教信仰、社會組織等。

<sup>21</sup> 早期稱為《清平山堂話本》是一部紀錄宋元明時期的話本集，同時也是現存最早的話本集。經近代學者研究，發現它原名為《六十家小說》，分為《雨窗集》、《長燈集》、《隨航集》、《欵枕集》、《解閒集》、《醒夢集》共六集，每集收小說十篇，成六十家。之前稱呼為《清平山堂話本》是因為殘本沒有集名，也沒有刊刻的年代和姓氏，唯有留下「清平山堂」字樣。今日所見的殘本現存二十九篇作品，而且證實「清平山堂」是明代嘉靖年間錢塘人洪楩的堂名。



### （一）地域文化研究：

古人很早就發現，不同地區的民俗傳統是有差異的，故有地域文化的分別，進而轉化成對民俗文化的分界標誌，深深地積淀在人們的印象之中。如《詩經國風》就將收集的詩歌，按照十五個地區來劃分。透過詩歌的表達，生動地表現出各地的風俗民情，這就是將文化按地域區分的先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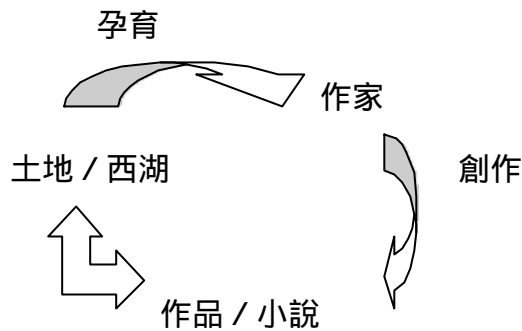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於地域文化研究越趨重視，而且不少學術單位也針對相似議題，舉辦研討會，如 2000 年 11 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就主辦「空間、地域與文化 - 中國文學與文化書寫」研討會。同時也有博碩士論文以地域文學的角度去分析作品、作家群。如范宜如撰寫《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 - 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博士論文<sup>22</sup>。

其實，法國著名的文學理論家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3-1893）指出藝術（文學）創作與發展，決定於三個要素，分別是「種族」、「環境」、「時代」。這就是文學理論中，著名的『泰納三原則』。進一步，他提出「藝術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sup>23</sup>的理論，所謂的「藝術品」當然泛指詩歌、雕塑、繪畫、建築、音樂、小說等。從上可知，環境（地域）對於作者的影響，是深遠且重要的。兩者的關係彷彿是土地與種子，作家得到土地充足的養分，就會開出燦爛奪目的藝術之花（作品）。三者的關係，如下圖：

---

<sup>22</sup>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 - 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1 年。

<sup>23</sup>（法）泰納：《藝術哲學》傅雷譯，頁 32。（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1 年）



所謂的地域文化 (Regional Culture), 乃一門研究人類文化在空間上的地理人文學科, 更清楚地說「在人類在聚落中所產生和發展出來的, 它以世代積淀的集體意識為內核, 形成一種網絡狀的文化型態。包含風俗、民情、宗教、神話、方言, 與自然生態和種族沿革等等, 組成一個相互關聯的有機系統。」<sup>24</sup>作家受地域文化的薰陶, 必然在書寫過程中帶有強烈地域意識。將耳目所及的山水風光、方言俚語、風俗習俗, 或是歷代當地的賢人名士都有可能寫入作品中。因此創作出地域文化鮮明的作品。「西湖小說」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出來, 形成一個特殊的小說史上現象。

地域文化具有四個基本的特徵：其一：文化的普遍性，每個區域都有其獨特的文化標記，如行為方式、語言系統、經濟體系、文化典籍、文化代表人物和一定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等。其二：文化的群體性，地域文化是地域群體的創造，其成員認同於這種高度一致的群體文化。並對其有一種歸屬感。其三：文化的繼承性，每個文化圈內的文化都在代代相傳，如文化典籍、古代建築、民風民俗等。其四：文化的滲透性，各個文化圈的文化都在歷史發展中不斷接融、交流、相互影響和轉化。<sup>25</sup>從上所論，透露出地域文化的活潑性與多元化，並非指涉簡單的

<sup>24</sup> 李大健：〈試論地域文化對作家創作風格的影響〉，《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2000年4月。

<sup>25</sup> 蔣寶德、李鑫金：《中國地域文化（上）》（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7年），頁2。

地理概念，而是一個包含文化時空概念。

## （二）敘述學分析

「西湖小說」故事，都是作家獨具匠心敘述（書寫）出來的。根據「敘事學」<sup>26</sup>（Narratology）的觀點，作者要向讀者展示它的敘事世界時，絕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將客觀世界的全部搬上書面，因為敘述是種時間線性的活動，作者得在奔流不息的「時間流」中開闢空間場域，在這些場域中尋找最適切的角度與讀者進行溝通。根據敘述理論，敘述作品必定有傳達者，也有接受者，前者正是活躍於文本中的「敘述者」，後者則是虛擬出來的「受述者」，在授受之間敘述者與讀者得以進行交流。<sup>27</sup>文學敘述與其它藝術不同的地方，在於它需要一個「敘述者」，有如電影中的鏡頭，透過鏡頭的運作，傳達出故事的脈絡。讀者也在鏡頭的運作之中，接收到作者的敘述策略。因此，敘事手法直接影響到故事的性質，即使作者處理相同題材，但不同的角度、編排方式或用語口氣，必定會呈現出迥異的作品風格。<sup>28</sup>

雖然作家書寫時會有各自獨特的風格，但話本原是作為市民文娛活動而產生的，自然地與相應的城市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話本書名或故事背景刻意標榜著特定的城市，其視角更是離不開當地的市井百態，並承載著當地悠遠的歷史文化。故西湖小說的作品中，會出現共通或相似的敘事模式，尤其在敘事時間和空間方面。

---

<sup>26</sup> The( structuralist-inspired )theory of narrative. Narratology studies the nature, form, and functioning of narrative ( regardless of medium of representation )and tries to characterize narrative competence. More particularly, it examines what all and only narratives have in common ( at the level of STORY, NARRATIVE, and their relations )as well as what enables them to be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and it attempts to account for the ability to produce and understand them.

<sup>27</sup> 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頁 7-1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年。）

<sup>28</sup> 胡亞敏：《敘事學》，頁 18。（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

在敘事時間方面，根據時間與情節的關係，小說時間可以分為外部時間與內部時間。外部時間是作者於情節之外專門紀錄的時間，它『像氣候或大氣層一樣包圍著』情節，是情節與使之得以產生、發展的廣闊無邊的現實生活之間的通道或橋樑。它不直接進入情節，卻是情節的土壤；它不直訴讀者，讀者卻要聚其檢驗作品與經驗世界的向背。它往往簡化為幾個數字加上年月日在作品中出現，作者卻要依此安排時代背景與情節距離。內部時間就是作品中情節運動的順序性與連貫性，它以心理時間為基礎。而外部時間卻以物理時間為基礎。<sup>29</sup>

將上面理論應用到話本小說中，外部時間指的是情節之外專門標記的時間。它雖然不直接進入情節，卻是情節發展的基礎。它常出現的模式是「話說 年間」，或說「話說 朝」，之後故事幾乎都採時間順序法發展下去。在「西湖小說」作品中，有相當大比率設定時間刻度發生在南宋。如此一來，準確的年月，不僅可以增加作品的真實感，更重要的是，通過時間的框架與限制，故事反映出時代和環境對人物的發展有關鍵性影響。

在敘事空間方面，「西湖小說」非常重視環境的描繪。使得空間充分展開，技巧地讓人物製造出更多曲折的情節。根據小說創作對空間的要求來理解，它應該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地域的內容，它承擔著人物的活動，同時又限制活動的範圍；二是社會的內容，它將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統統網羅於內；三是景物的內容，它是地域內容與社會內容在作品中的具體化與形象化。其實將空間的地域因素提出，並不在於它的審美價值，而是它的結構作用。這一點，正是以往的小說理論探討所重視不夠的。恰如故事因素在小說情節中的地位一樣，地域因素在小說空間中也是最原始、最基本但又最不可或缺的。正如任何物體的空間存在，都需以地域來加以界定一樣，在小說空間處理中也不例外，它是一切作品中

---

<sup>29</sup>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頁 43。（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

的人物和事件、矛盾的發生和發展的實際落腳點。<sup>30</sup>

因此，本文擬採用地域文化和敘事學的角度，去分析探討「西湖小說」，可分為四個部分。(一)：「西湖小說」的溯源與發展，並從歷史、地理、文化三方面了解其發展對小說的影響。(二)「西湖小說」的內容分析，主要針對宗教、愛情、講史等三大題材為討論。(三)「西湖小說」的藝術技巧，主要探析與其他話本小說異同之處，呈現出傳承與超越的歷史軌跡，和故事中人物形象與情節安排。(四)「西湖小說」的文化內涵。

---

<sup>30</sup>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頁 59。(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

## 第二章 . 「西湖小說」的發展背景

### 第一節 「西湖小說」的溯源

- 一 . 城市的興起
- 二 . 「西湖小說」的形成

### 第二節 杭州的歷史與地理環境

- 一 . 杭州的歷史軌跡
- 二 . 杭州的地理環境

### 第三節 杭州的文化優勢

- 一 . 刻書
- 二 . 藏書
- 三 . 文人集團交往

本章試圖先發掘小說中城市性，是何時起源。再論「西湖小說」的形成與發展情況。最後更全面性回顧杭州的歷史、地理環境，和文化環境等三方面，對「西湖小說」的蓬勃發展有何影響。

## 第一節 西湖小說的溯源

### 一 . 城市興起

回顧白話短篇小說的發展，不難發現，有幾過特定的城市出現，溯源宋元話本，常見的是北宋的國都東京（汴京），和南宋的「行在」<sup>31</sup>杭州。到了明清時

---

<sup>31</sup> 巡行的臨行駐地。因金兵南下，宋室南遷於此，雖名義為「行在所」，但是君駕駐蹕之處，地位實與都城無異，與「汴京」一北一南，分別為兩宋朝廷的所在，也是國家的政治中心。

期，因手工業發達，造成新興城市崛起。它們幾乎集中在江南地區，有南京、蘇州、揚州等地。小說也開始以這些新興城市，為書寫的城市。如此一來，顯現出城市南移的現象。但是從整個小說的歷史軌跡來看，「杭州作為小說創作的一個中心，持續時間則是最長的，作用也可以說是最大的。」<sup>32</sup>從早期宋元話本到明清話本以杭州為書寫的城市，不勝枚舉。

現存宋元話本中，東京（汴京）是最早書寫的城市。其中的名篇有《清平山堂話本》卷1〈簡帖和尚〉、卷2〈快嘴李翠蓮記〉；《古今小說》卷11〈趙伯昇茶肆遇仁宗〉、卷24〈楊師溫燕山逢故人〉、卷36〈宋四公大鬧禁魂張〉；《警世通言》卷30〈金明池吳清逢愛愛〉、《醒世恆言》卷14〈鬧樊樓多情周勝仙〉等作品。這些故事都深刻描寫了當時北宋國都汴京的風貌，除了繁華熱鬧的景象也將對當地市井小民日常生活作息、風俗習慣等方面諸多形容。

在小說中尤其特定場所出現，反映出當地居民的生活習尚。以東京相國寺為例，它處於大內前州橋之東，「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sup>33</sup>，乃提供市民遊玩、貿易的好地方。宋元話本中，相國寺常常被作者提及，當作市民往來的場所之一。在〈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寫到富翁王秀有一個珍貴的大金絲罐，十分喜愛。趙正為了顯示他的厲害，和宋四公約定要將它偷騙到手。王秀的家正好就在相國寺旁，在偷騙的過程中，幾次出入相國寺，都是人來人往。也間接反映出相國寺市民出入頻繁、街景熱鬧非凡的公共意象<sup>34</sup>。在小說的書寫，常常可見真實的場所應用在故事中，例如寺廟、茶館、遊覽勝景等。如此一來，增強故事的真實性和

---

<sup>32</sup> 劉勇強：〈晚明「西湖小說」之源流與背景〉《晚明至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尚未刊，本論文乃北大教授劉勇強先生先寄予筆者。）

<sup>33</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3「相國寺內萬姓交易」條，頁35。收錄《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

<sup>34</sup> （美）凱文·林奇（Lynch, Kevin）《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任何一個城市，都存在一個由許多人意象複合而成的公眾意象，或者說是一系列的公共意象，其中每一個都反映了相當一些市民的意象。如果一個人想成功地適應環境，與他人相處，那麼這種群體意象的存在就十分必要。」方益萍、何曉軍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

親切感。

值得注意，靖康之禍後宋室南遷臨時駐驛杭州。杭州城靡然呈現「東京化」<sup>35</sup>的現象，這主要的原因是隨著宋室南渡的東京移民，從貴族士紳到平民百姓皆有。由於他們對東京（汴京）的眷戀和記憶，引導著杭州的風俗習慣，朝向「東京化」趨勢。首先南宋人耐得翁《都城記勝·序》中指出：

聖祖朝宗開國，就都於汴，而風俗典禮，四方仰之為師。自高宗皇帝駐蹕於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侔，然中興已百餘年，列聖相承，太平日久，前後經營至矣，輻輳集矣，其興中興時又過十數倍也。<sup>36</sup>

從上面中不難看出杭州「山水明秀、民物康阜」，無怪乎來自全國的人「輻輳集矣」，尤其非常多的東京移民人口。至於「東京化」情形，試舉飲食方面，他們為了在此地謀生立業，開設東京口味店舖，開始影響杭州飲食口味。在《西湖二集》卷 2〈宋高宗偏安耽逸豫〉中有云：「有個宋五嫂，是汴京酒家婦人，善作魚羹，隨南渡來此，僑寓於蘇堤之上，賣魚羹為生」<sup>37</sup>。後來得宋高宗喜愛，因此享有盛名，從此杭人都來買食，其<sup>38</sup>。這件事不僅是小說家津津樂道的話題，同時在文人的詩詞中，也得以窺見。元末詩人張雨（1277-1352）在〈西湖竹枝詞〉一詩，寫道：

光堯內禪罷言兵，一番御舟湖上行。

---

<sup>35</sup> 「東京化」這名詞原創自宋莉華：〈汴京與杭州：小說中的兩宋雙城記〉頁 206；另外有關於汴京對南宋的影響，可參見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之〈京師開封文化對南宋的影響〉，頁 376-389。（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

<sup>36</sup>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頁 89。

<sup>37</sup> 《西湖二集》卷 2〈宋高宗偏安耽逸豫〉，頁 44。

<sup>38</sup> [宋]耐得翁：《武林舊事》卷 3「西湖遊幸」條，頁 375。



東京鄰舍宋大嫂，就船獨得進魚羹。<sup>39</sup>

另外在《夢梁錄》也寫到「汴京熟食店，張挂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括名人畫，裝點店面。」<sup>40</sup>當然杭州受「東京化」的影響，不只飲食方面，還包括文化娛樂、節日習俗、建築等多方面。然而，閱讀話本小說以東京為背景的作品，常透露出「昔是而今非」的感嘆，原因是：

東京這城市的風貌，首先正是在大量東京移民的回憶中得以展現的。對都城昔日繁盛的追憶，與靖康之亂以後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現實悲劇交織在一起，強烈的感時傷懷情緒成為宋元話本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之一。<sup>41</sup>

從上面這段話，可知宋元話本也反映出社會動盪、政局不安的時事，東京原本是繁華熱鬧的景象，如今只能鮮明地活在東京移民的腦海中。雖然身處於熱鬧繁華的杭州，也難以忘懷對故都的思念。

話本小說所以興盛在宋元之間，當時經濟繁榮，市民階層重視文化休憩的生活，故「說話」盛行，促成了話本的流行。然而說話乃口頭文學的技藝，為求生存，必須依附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一定水平的地方。國都當然成為最好的選擇。在《東京夢華錄》卷5「京瓦伎藝」就記載各種民間技藝的盛況，已經有相當高的水平。故話本承襲自說話的口頭敘述藝術，作品自然呈現出城市特性，成為都市文化的一種類別。故小說的興起，與城市的產生、市民的文化娛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另外，東京和杭州先後是皇帝的駐蹕所在，官員來往、商人出入，自然對於小說的流傳和興盛，比其他地方更具有優勢。

<sup>39</sup> 《西湖詩詞》，頁169。〔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sup>40</sup>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16「茶肆」條，頁262。

<sup>41</sup> 宋莉華：〈汴州與杭州：小說中的兩宋雙城記〉，《女性的主體性：宋代的詩歌與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頁182。

## 二．西湖小說的形成

杭州因為宋室南遷，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空前繁榮，就當時的筆記史料，如《夢梁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繁盛錄》等就記載著各地客商紛至沓來，人口遽增的現象。相對的秦樓酒館與說書賣技者，如雨後春筍產生，杭州城日益熱鬧，因此說話也隨著興盛起來。

各種文化娛樂不斷發展進步，從流動性質如個人的表演，到固定場所的演出。城市中於是有瓦子勾欄的出現。何謂「瓦子」？在宋人吳自牧曾有過這樣解釋：「瓦舍者，謂其來時瓦舍，去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sup>42</sup>。而表演的節目有民間百戲如說話、民歌、傀儡戲、皮影戲、雜劇、踢弄等各式各樣內容。杭州瓦舍演出的盛況，可從下面這段話知道：「關於瓦子勾欄的演出，以杭州北瓦最典型，在諸瓦中最大，有勾欄十三座，內有各種伎藝人演出，是宋代文化生活的一個縮影」<sup>43</sup>。到了清初《儒林外史》中老學究馬二先生到了西湖，這樣情形絲毫不遜色，他不免被眼前「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絃樓」<sup>44</sup>的盛況嘆為觀止，而「管絃樓」也就是「瓦子」，同樣是說唱賣技的場所。

在演出的項目中，因為說話人可將詩詞脫口而出、源源不絕。這樣精湛的說話藝術<sup>45</sup>，自然受市民的歡迎。說話人須具備相當程度的歷史知識，也要有一定水平的文學修養。隨著杭州「說話」相當興盛，說話人越來越專業，分工也越來

---

<sup>42</sup>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19「瓦舍」條 頁298。(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

<sup>43</sup>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第15章〈音樂舞蹈與城市文娛〉頁493。(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sup>44</sup> [明]吳敬梓：《儒林外史》第14回〈蘆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頁137。(台北：聯經出版，1987年)

<sup>45</sup>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之〈講說的藝術特色〉著 頁84。(台北：丹青圖書公司，1983年)

越細，有「小說」「講史」等四家數。據吳自牧《夢梁錄》記載：「說話者謂之舌辨，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之事。」<sup>46</sup>其中以「小說」一家最受歡迎，因為它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內，一次或幾次講完一個有頭有尾的精采故事。所以吳自牧又佩服說道「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題破。」<sup>47</sup>。因此說話人不僅受到百姓的喜愛，就連皇帝對小說也有特別的嗜好。在〈古今小說·序〉就有這麼一段：

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璫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厚酬。

杭州「說話」業的發達，《武林舊事》<sup>48</sup>就記載其中的「演史」、「說經誦經」、「小說」這三類說話人，就有 93 人之多。而且杭州的說話，也發展出當地的特殊類別，謂之『陶真』。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熙朝樂事」：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瞿宗吉過汴梁詩云：「.....陌路盲女無仇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其俗殆與杭無異，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峰塔、雙魚扇墜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者也。<sup>49</sup>

說話人為了讓故事內容更豐富、精采，不得不自己多閱讀書籍，累積知識。這是在話本小說的開始階段，作者與說話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常常是同時具

---

<sup>46</sup>（宋）吳自牧：《夢梁錄》卷 20「小說講經史」條，頁 312。（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 年）

<sup>47</sup> 同上，頁 313。

<sup>48</sup>〔宋〕耐得翁：《武林舊事》卷 6「諸色伎藝人」條，頁 454-455。（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 年）

<sup>49</sup>（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 20〈熙朝樂事〉頁 368。（台北：世界書局，1963 年）

有兩種身分。後來，為求內容更提昇，題材更廣泛，貧苦的讀書人或是在仕途上失意的文人，就投入話本小說的創作。因此「說話」業的興起、發達，直接地催生了話本小說，相對的說話人說話的口氣和套語，在話本小說中也時有所見。

隨著杭州不斷發展，與「說話」的盛行。使杭州對小說的影響日益重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明清時期眾多小說、小說家與西湖或杭州有關<sup>50</sup>。先舉小說家為例，真實姓名可考者有《型世言》陸人龍、《西湖二集》周清原、《剪燈新話》瞿佑、《包龍圖斷百家公案》安遇時、《東西兩晉演義》楊爾曾、《西湖拾遺》陳梅溪等，這些人都為當地杭州人。另外，姓名不詳化名有「西湖」者，有《歡喜冤家》西湖漁隱主人、《弁而釵》與《宜春香質》醉西湖心月主人、《天湊巧》西湖逸史、《幻影》西湖浪子、《皇明中興聖烈傳》西湖義士、《醋葫蘆》西子湖伏雌教主、《濟公全傳》西湖香嬰居士、《萬花樓演義》西湖居士等。

其二是小說中大量出現以杭州或西湖為背景的故事。現存的宋元話本中，就有〈西湖三塔記〉、〈勿頸鴛鴦會〉、〈錯認屍〉、〈碾玉觀音〉、〈錯斬崔寧〉、〈小水灣天狐詔書〉等多篇。明代中葉後白話小說的蓬勃發展，不管長篇與短篇的作品，有不計其數以西湖、杭州為背景的故事。在白話短篇小說中，《熊龍峰四種小說》四篇都以西湖為背景，《歡喜冤家》有六篇之多，其他小說集也有不等篇回以此地為背景。「三言」中有二十四篇之多，其中包括〈賣油郎獨占花魁〉、〈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樂小舍拼生覓偶〉等名篇；「二拍」有六篇，尤其《西湖一集》<sup>51</sup>、《西湖二集》出版，西湖小說達到了最高峰。之後，鼓舞了《西湖佳話》等小說的刊行。

---

<sup>50</sup> 請參見附錄（二）「明末清初小說作者與刊行與杭州有關 目錄」書目共計 43 本。

<sup>51</sup>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 3〈明清小說甲〉：「《西湖一集》佚，不知撰人。但《西湖二集》卷十七〈劉伯溫薦賢平浙中〉篇曾引書目，云：『《西湖一集》中〈占慶雲劉誠意佐命〉，大概已曾說過。如今這一回補前說未盡之事。』」頁 107，（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年）

從上所論，西湖小說在宋元已頗具規模，明清交替之際達到最高潮，到清初時猶有可觀，可惜清中葉後幾乎不再有優秀的作品問世。清康熙間刊行《西湖佳話》卷 12〈錢塘霸蹟〉、卷 15〈雷峰怪蹟〉已襲用了前人舊作<sup>52</sup>；醒世居士《八段錦》第一段〈懲貪色〉也抄襲《古今小說》之〈新橋市韓五賣春情〉<sup>53</sup>；題「東冶青坡居士」搜集的《西湖遺事》，一共有十六卷，有十五卷採自《西湖二集》，只有第二卷〈文世高反魂續成兩度因緣〉採自《西湖佳話》卷 11〈斷橋情蹟〉<sup>54</sup>。又有陳梅溪《西湖拾遺》基本上是《西湖二集》和《西湖佳話》二本書的選編<sup>55</sup>。

單篇小說錢塘漁隱叟《胡少保平倭記》故事內容與《西湖二集》之〈胡少保平倭記〉相同<sup>56</sup>。玉花堂主人《雷峰塔傳奇》<sup>57</sup>也不過是將《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故事繼續敷衍下去，增添白娘子水淹金山寺及生子的情節，後來其子夢蛟考中狀元，使鎮壓在雷峰塔下的白娘子得以獲救，一家團圓。上述所論，反映出到清中葉時西湖小說生命力已有停滯的現象，不再有引人注目作品出現。綜觀西湖小說的發展過程，基本上與話本小說的發展軌跡呈現一致性。

<sup>52</sup> [清]古吳墨浪子：《西湖佳話》卷 12〈錢塘霸蹟〉承襲自《古今小說》之〈臨安里錢婆留發跡〉；卷 15〈雷峰怪蹟〉承襲自《警世通言》卷 28〈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sup>53</sup>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在《八段錦》第一段〈懲貪色〉下註：「出自《古今小說》卷三〈新橋市韓五賣春情〉」只是將主人翁的名字改變過主人翁的名字，將男主翁名字從吳山變更為雲發；將女主翁名字從金奴改變為張賽金而已。頁 638，（北京：中國文聯出版，1991 年）

<sup>54</sup>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在《西湖遺事》下註：「凡十六卷...實則有十五篇採自《西湖二集》，惟第二卷〈文世高反魂續成兩度因緣〉採自《西湖佳話》卷十一〈斷橋情蹟〉，又杜撰回目以惑讀者。」，頁 704。

<sup>55</sup>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在《西湖拾遺》下註：「四十四篇故事，其中二十八篇取自《西湖二集》，十五篇取自《西湖佳話》，一篇取自《醒世恆言》。」，頁 560。

<sup>56</sup>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在《胡少保平倭記》下註：「內容與《西湖二集》中同名短篇小說全同，然究竟先有短篇的《胡少保平倭記》而為《西湖二集》收入，抑是短篇《平倭記》由《西湖二集》中轉抄，頗難定論。」，頁 280。

<sup>57</sup>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之《雷峰塔傳奇》，頁 603。

## 第二節 杭州的歷史與地理環境

### 一．杭州的歷史軌跡

杭州歷史悠久，是我國六大古都之一。溯源它的歷史，在春秋時期，這裡是吳越兩國爭霸的地方，直到秦始皇統一天下，杭州始設縣治，稱為錢塘縣，也是最早見於記載的史料<sup>58</sup>。後來經兩漢、魏晉南北朝，到了隋文帝（楊堅）在開皇九年（西元 589 年）改錢塘為杭州。

唐滅亡後，中原陷入五十四年的分裂時期，通稱「五代十國」。在這時期，杭州有了重大發展。因吳越王錢鏐<sup>59</sup>在此建都，用心治理，獎勵農工業，大興水利，使得當地更富庶繁榮。《古今小說》卷 21〈臨安里錢婆留發跡〉，就是描寫錢鏐傳奇的一生，雖然有些情節過分誇張，有意識地將錢鏐神人化。不容否認，他深植在當地人心中的地位與尊崇。尤其錢氏不貪圖自己私利，決定將領土無條件獻給宋太祖，保全了杭州百姓的安定生活，更是難得。北宋歐陽修〈有美堂記〉中也提到這一段歷史：

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波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sup>60</sup>

<sup>58</sup>〔漢〕司馬遷：《史記》之〈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始皇出遊過丹陽至錢塘。」頁 261。（台北：天工書局，1985 年）

<sup>59</sup>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縣人。生於唐宣宗大中六年（西元 852 年），卒於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西元 932 年）。吳越立國（西元 907-978 年）以杭州為京城。參見〔宋〕歐陽修：《新五代史》之〈吳越世家〉。

<sup>60</sup> 《歐陽修全集》（上冊）之〈有美堂記〉頁 280。（北京：中華書店，1986 年）

從上面這段話，可知宋初同樣擁有壯麗山水的金陵，經過藩亂割據，被戰爭慘烈地破壞，唯獨杭州能進一步安定發展，都要歸功於錢俶（錢鏐之孫）知勢不可為，決定「頓首請命，不煩干戈」奉表獻地，使杭州免於兵燹。因此到了北宋，杭州享有「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的美譽<sup>61</sup>。當時一代詞人柳永〈望海潮〉詞中也歌詠道「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鳳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sup>62</sup>。描寫北宋中葉杭州的繁華富庶，人口密集情況。

南宋時，杭州更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因為當時金兵南下侵犯，擄走宋徽宗、欽宗，史稱「靖康之禍」，高宗便急忙南渡，在紹興八年（1138）定都於杭州，改名臨安，並就五代錢氏故址，建行宮於鳳凰山。之後，原本中原大族、富商鉅賈也隨駕南遷，於是人口頓時遽增，杭州更加繁華熱鬧。就如咸淳臨安志所記載「錢塘古都會，繁富甲於東南，高宗南巡，駐蹕於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昔。」<sup>63</sup>。

同時在小說中的人物也應證了宋室南遷的這一段事實，如《醒世恆言》卷3〈賣油郎獨占花魁〉<sup>64</sup>中女主角莘瑤琴就是在靖康之亂時，百姓棄家逃命與父母走失，被鄰人陷害，賣到臨安妓女戶中；另外在《警世通言》卷20〈計押番金鰻產禍〉也記述當時「車駕杭州駐蹕，官員都隨駕來臨安」<sup>65</sup>，計押番一家也投奔杭州而來。《古今小說》卷17〈單符郎全州佳偶〉也有一段寫道「百姓從高宗南渡者，不計其數，皆散處吳下。聞臨安建都，多有搬到杭州入籍安插」；除了市井小民慌忙逃命，貴族士紳同樣也舉家南遷，在《西湖二集》卷12〈吹鳳蕭

<sup>61</sup>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10〈才情雅致〉「嘉佑二年，梅公儀摯以龍圖閣直學士出守杭州，仁宗賜之以詩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剖符宣政化，持橐輟才流，暫出論思列，遙分旰食憂，循良勤撫俗，來暮聽歌謳。』」頁167。

<sup>62</sup> 《歷代詞選注》閔宗述、劉紀華、耿湘沅選注，頁131。（台北：里仁書局出版，1997）

<sup>63</sup> 《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二〈西湖〉〔宋元地方志叢書七〕，頁4182。（台北：大化書局）

<sup>64</sup>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卷3〈賣油郎獨占花魁〉（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

<sup>65</sup>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20〈計押番金鰻產禍〉，頁275。（台北：里仁書局，1991年）

女誘東牆 > 女主角黃杏春一家，乃「宗室之親，從汴京扈駕而來，住於六部橋」<sup>66</sup>。關於這一段辛酸血淚的歷史，《警世通言》卷 12 < 范鰲兒雙鏡重圓 > 寫得格外詳盡，清楚交代兵荒馬亂之際，百姓逃難失散的事實。

吳歌云：「月子彎彎照幾洲？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飄散在他州。」此歌出自南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為宣和失敗，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帝北去。康王（高宗）泥馬渡江，棄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懼怕韃虜，都跟雖車駕南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婦終身不得相見。

經過南宋一百四十餘年治理，杭州在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空前繁榮進步，就當時的筆記史料，如《夢梁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繁盛錄》等書，就都記載著各地客商紛至沓來，今非昔比的盛況。如《夢梁錄》曾記載「紹興間，輦轂駐蹕，衣冠紛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sup>67</sup>。杭州因為宋室南遷，躍升為京師的地位，不管政治、經濟、文化都具有優勢的條件，故成為外地人理想居住的城市。近代學者陳正祥先生在《中國文化地理》一書中曾提到逼使文化中心南遷的三次事件，首先為「永嘉之亂」和晉室南遷，其二為「安史之亂」，第三個就是「靖康之難」<sup>68</sup>。可想而知，政治因素對人口遷移和文化南遷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元朝時，杭州已不再是國都，但其富庶繁榮仍為東南第一州。成為江浙行中書省的省會。元初時，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曾經來到杭州，就以「天城」稱呼，並寫到他的感受：「行在城所供之快樂，世界諸城無有及之者，人處其中，自信為

<sup>66</sup> [明]周楫《西湖二集》卷 12 < 吹鳳簫女誘東牆 >，頁 255。（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

<sup>67</sup>（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二「西湖」條，頁 227。

<sup>68</sup> 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頁 3-5。（台北：木鐸出版社，1984 年）



置身天堂。」<sup>69</sup>，在他的遊記中又寫到杭州繁榮情況：「杭州城之財富，為世界諸城所不及。」<sup>70</sup>。雖然元朝國祚不到百年，但是杭州的繁華富裕，在當時全世界大城中，很少城市可以與它並駕齊驅。

在元末，由於杭州遭受連年天災人禍，使得當地受到很大毀壞。在天災方面，因為杭州居住稠密，板屋居多，磚屋特少等原因，所以常有火災發生。當時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就曾記載在元順帝正元年（西元 1341 年）的火災情形：

四月十九日，杭州災，毀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災，尤甚於先，自昔從未有也。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實基於此。<sup>71</sup>

這次火災使杭州一直蒙受前所未有的劫難，對於杭州「自古多火」，時常造成慘重災情，在小說中也有描寫。周清原對此擔憂不已，更進一步分析出杭州多火的原因，藉著小說的傳播，希望喚醒居民的警覺心。他認為有五項主要原因：

居民稠密，突連綿；板壁居多、磚垣特少；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徹夜燒燈，幢幡飄引；夜飲無禁，童婢酣倦，燭燼亂拋；婦女懶惰，篝籠失簡。

<sup>72</sup>

人禍方面，明太祖朱元璋為了一統天下，遣大將常遇春圍攻杭州，造成嚴重的死傷。從史料上我們可看到當時慘況為大軍「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運不通，一城之人，餓死者十之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輻輳，借以活，而大

---

<sup>69</sup>〔義〕馬可波羅：《馬可波羅行紀》之〈蠻子國都行在城〉沙海昂注 馮承鈞譯，頁 578。（台北：台灣商務，1962 年）

<sup>70</sup>同上 頁 586。

<sup>71</sup>〔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 9〈火災〉條，頁 116。（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sup>72</sup>《西湖二集》卷 24《認回祿東嶽帝種鬚》，頁 487。

半病疫死。」<sup>73</sup>。由此可以想知戰爭所帶來的災難，令杭州的百姓死去大半，原本人聲鼎沸的大城市，幾乎快成為死城。

明、清改為杭州府治，因政治區域劃分的影響，使得杭州連東南第一大州地位都無法保持。首先在元末（1356年）三月，朱元璋起義「以應天為基地，建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sup>74</sup>，從此政治上的重要性，杭州被南京取而代之。明代所規劃浙江省，比較元朝江浙行省，不及三分之一，杭州省會的轄區也大為縮小。中葉後在經濟上，手工業興起，其他的新興城鎮如揚州、蘇州、上海等迅速崛起，甚至超越了杭州。

## 二．杭州的地理環境

在生產技術較為原始的古代，地理環境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杭州地處錢塘江下游，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生產豐饒，是名符其實的魚米之鄉。春秋時期，已成為吳越兩國兵家必爭的要地。三國開始，北方割據混戰，就有大批士人南移定居。尤其南宋定都於此，外地人口大量湧入，乃移民風潮的頂峰<sup>75</sup>。同時，附近州縣居民也紛紛遷入，府城不斷擴大，人口不斷增加。

交通水路是影響經濟成長的首要關鍵，杭州即今日浙江省會杭州市，別號武林。隋煬帝開鑿運河，運河成為聯絡我國南北的重要樞紐，聯繫著全國政治、經濟重心。尤其是元朝在大都（今北京）定都，為了保證京都漕運的暢通，又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修築「京杭大運河」。它的工程浩大，完工後，不再受限氣候

---

<sup>73</sup>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11〈杭人遭難〉條，頁141。

<sup>74</sup> 傅衣凌：《明史新編》，頁24。（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

<sup>75</sup> 鄭生勇：〈杭州歷史上的人口遷移〉「杭州歷史人口的發展有兩個高峰，一個是南宋時期，一個是清朝乾嘉年間。」，頁8。《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第四期，1997年。

因素，運河四季皆可暢通，並帶來經濟上的生機。

大運河便是全國最聞名的水路交通主幹。大運河北起北京，南迄杭州，全長 1782 公里，亦稱京杭大運河，稍早曾稱漕河，曾為南北漕運的大動脈。

76

古代修築技術比較落後，利用天然水道來開闢運河，要比在陸地上修築道路為省時省力。中國古代，特別是江南，水路交通就遠比陸路便利頻繁。大運河曾經中斷過，但是最後一段「鎮杭段」，史稱江南運河，長年暢通無阻。使得杭州可以與鄰近的湖州、蘇州、嘉興、鎮江等附近城鎮，流通貨物，調和供需。杭州據水路交通樞紐，有此地理上的優越形勢，所以北宋時代就已成爲江南第一大城鎮。

明代中葉時，商業發展迅速，手工業也空前繁榮。杭州氣候與土地，適合種植綿、麻、桑等經濟作物，為手工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料，促進經濟的發展，故當地成爲著名的絲織中心。而且杭州又比其他地方具有地利優勢，萬曆時人張瀚清楚地指出「嘉禾邊海東，有魚鹽之饒。吳興邊湖西，有五湖之利。」<sup>77</sup>。而杭州位於二地之間，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故外地的商賈不辭勞苦，到此地絲綢買賣為求謀利，常有萬頭鑽動的盛況：

杭州其都會也，山川秀麗，人慧俗奢，米資於北，薪資於南，其地實晉而文奢。然而桑麻遍野，繭絲綿苧之所出，四方咸取給焉。雖秦、晉、燕、周大賈，不遠數千里而求羅綺繒幣者，必走浙之東也<sup>78</sup>。

---

<sup>76</sup> 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頁 172。

<sup>77</sup>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 4〈商賈紀〉，頁 83。（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5 年）

<sup>78</sup> 同上，頁 83-84。

杭州因手工業發展，繼而推動工商業、紡織業、絲綢業等方面。因此吸引外地人口大量流入，投入生產的行列。也促進了各地的文化交流和經濟發展。此時商人的地位大為提升，有別於傳統重本抑末、貴農賤商的思想，明末皇帝貪逸奢侈，財政入不敷出，為了要彌補財政的缺口，縱容商人花錢買官鬻爵。這樣的情況，在小說中時常可見，如家喻戶曉的《金瓶梅》中男主人公西門慶，或是《西湖二集》卷 20〈巧妓佐夫成名〉主人公吳爾知，都是靠著「孔方兄」打通關節，謀到一官半職。

當時社會風氣受到非常大影響，原本市民儉樸守禮的風氣，逐漸為奢糜浮華的風氣所代替。尤其以富庶的江南最為明顯，而江南又以蘇州、杭州最為嚴重。當地的居民不積極從事生產，瀰漫著安逸和享樂風氣。因此明人陸楫就清楚的指出蘇、杭居民奢侈的生活：

予每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民必易為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為生者也。……今天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於蘇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不知其幾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眾也，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游，游必畫舫肩輿，珍羞良酌，歌舞而行，可謂奢矣。<sup>79</sup>

從上面這一段話，可以看出得天獨厚擁有湖光山色的蘇、杭居民，過著「按時而游，游必畫舫肩輿，珍羞良酌，歌舞而行，可謂奢矣。」這樣的生活不知羨煞多少外地人。然而杭州居民重視生活享樂，並非從明代中葉後商業經濟發達才如此。乃長久以來就較他城更為講究精巧，因此秦少游就曾說：「杭俗工巧，羞

---

<sup>79</sup> [明]陸楫：《葦葭堂雜著摘錄》收錄於〔百部叢書集成〕之《紀錄彙編》卷二百四，頁 3。〔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 年。〕

質樸而尚靡麗，人頗事佛。」<sup>80</sup>，過了幾百年了，明代杭州人張瀚也感慨道，這樣風氣不但沒有改善，反而受商業發展，更加變本加厲的情形：

吾杭終有宋餘風，迄今侈靡日甚。余感悼脈脈，思欲挽之，其道無由，因記聞以訓後人。……毋論富豪貴介，紈綺相望，即貧乏者，強飾華麗，揚揚矜詡，為富貴容。<sup>81</sup>

### 第三節 杭州的文化優勢

杭州因歷史朝代的不同，曾經設有各類學校，從南宋國子監到府、州、縣學，以及各類書院。當地自古又是刻書、藏書的重鎮。如此一來，有利於知識的傳播、

---

<sup>80</sup> [明]張瀚：《松窗夢語》〈風俗紀〉，頁139。

<sup>81</sup> 同上。同卷也寫到：「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制。洪武時律令嚴明，人遵畫一之法。代變風移，人皆志於尊崇奢侈，不復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龍鳳服飾，惟皇后、王妃始得為服，命婦禮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銀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紵絲綾羅，六品以下用綾羅緞絹，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是皆僭擬無涯，踰國家之禁者也。」

文化的保存。同時，杭州得天獨厚具有湖光山色的勝景，尤其西湖聞名遐邇，吸引文人雅士的駐足吟詠、流連忘返，寫下多少名篇佳作，讓後世懷念不已。

## 一．刻書

杭州的造紙、印刷業自古發達。中國人的四大發明，享譽中外的活字印刷術，就是宋代畢昇在這裡發明的<sup>82</sup>。隨著宋室南遷，無論是官刻或私刻<sup>83</sup>，杭州都成為全國最大的刻書中心。宋人葉夢得在《石林燕語》就談到：「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sup>84</sup>杭州不但刻印技術進步，刻印的數量、質量都稱冠全國。

明代時，私人刻書依然興盛，刻書中心依舊集中在江南地區，但重心有轉移的現象。因元統治時刻書重心移往福建，故「弘正以前，書坊猶多聚於閩中……厥後蘇州漸盛，萬曆以後，南京及杭州，書坊復蔚然興起。」<sup>85</sup>。雖然杭州不再居冠，然而一直是刻書重鎮。明人胡應麟就明白地指出，當時刻書最興盛的四個地點「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金陵也，燕市也，閩闔也，臨安也。」<sup>86</sup>上面所說臨安就是杭州。明清時私人刻書相當興盛，那刻書的內容，到底是何方神聖，使得出版業的如此活絡，明人陸容告訴我們答案是：

---

<sup>82</sup> 葉樹聲、余敏輝：《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杭州是我國雕版發祥地之一，私人刻書歷史悠久，舉世聞名的宋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就是這裡發明的。」，頁 46。（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年）

<sup>83</sup> 顧志興：《浙江出版史研究 - 中唐五代兩宋時期》載「宋代的私刻書，有以“趙、韓、陳、岳、廖、余、汪”為最之稱，其中的陳指陳起，岳指岳珂，廖指廖瑩中，這陳、岳、廖三家的主要刻書活動均在浙江，而陳起實為書坊刻書，又有陳思亦著名。私家刻書，廖瑩中雖然閩人，但刻書活動主要在杭州。」，頁 103。（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

<sup>84</sup> [宋] 葉夢得：《石林燕語》，頁 116。（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sup>85</sup> 屈萬里、昌彼得：《圖書版本學要略》，頁 57。（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年）

<sup>86</sup> [明]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 4 <經籍會通四>（台北：世界書局，1963 年）

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尚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世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sup>87</sup>。

上面陸容所說的「無益」之書，無庸置疑就是指通俗文學的作品，如小說、戲曲、傳奇等書籍；相反地，傳統、正規的文學，不受市民大眾注意，刻印的少之又少。尤其小說出版更是驚人，從明末到清初的話本小說創作，可說是到達顛峰期，著名有馮夢龍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陸人龍《型世言》、周清源的《西湖二集》，李漁的《無聲戲》、《十二樓》，還有無名氏《石點頭》、《歡喜冤家》、《照世杯》、《豆棚閒話》等書。這些書如雨後春筍產生，對於這種現象，孫楷第先生也注意到了：

從明朝泰昌元年（西元 1620 年）到清朝順治十八年（西元 1661 年），不過四十二年，就出了十幾部三百多篇的短篇小說，其餘不很著名的尚不算，在小說史中，這是極可注意的事。<sup>88</sup>

杭州是刻書的大本營，明代當地有名的刻書家，如有胡文煥「文會堂」、洪楸的「清平山堂」、陸雲龍的「翠娛閣」、楊爾曾的「草玄居」等家。這些書坊多半刊行是小說、戲曲之類的作品。由此話本小說在此地刊行的情形是很活絡興盛，在徐志平先生曾列出「清初前期話本小說相關地域分佈表」<sup>89</sup>中，共有話本小說二十六本，其中作者籍里或刊行地點在浙江省杭州府的就有十一本，超過四十%。今筆者將明末清初小說的作者或刊行與杭州有關的書目，統計在附錄(二)

---

<sup>87</sup> [明]陸容：《菽園雜記》，頁 129。（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sup>88</sup> 孫楷第：《滄州集》上冊〈中國短篇白話小說的發展〉，頁 72-77。（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sup>89</sup> 徐志平：《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第二章〈清初前期話本小說的地域分佈〉，頁 107。（台北：學生書局，1998 年）

中，確定的至少有四十三本之多。從上可知，杭州對小說的刊行與傳播佔全國舉足輕重的地位。

明清更替時，出版業者受到戰爭無情的摧毀，可能身家性命、財產均付之一炬。當然刻書和賣書的書舖會遭遇破壞，而刻版、作家的文稿等都可能遭到焚毀或損壞。經過動亂後，話本小說的讀者不會因此銷聲匿跡，反而潛意識上更需要精神上慰藉，而閱讀通俗小說正是最直接、方便，宣洩外族統治的苦悶。於是話本小說的市場再度活躍起來，書商急於謀利，就會將已經出版過的書，另外別題書名刊行。以《覺世雅言》的刊行為例，胡士瑩先生認為：

大概其時當明季兵燹之餘，《三言》版本，零落殆盡，坊賈乃擇其稍為完整者，隨手湊成，再加《今古奇觀》一篇，別題書名以牟利。<sup>90</sup>

又如，近年來在韓國發現的《型世言》，我們從內容上得知《幻影》、《二刻拍案驚奇別本》是其殘本<sup>91</sup>。這些都是因為市場上有需求，書商急於牟利，便將原書的回目變動，或是一部份內容加入他書，再重新出版。不管如何，從上面得知杭州刻書的發達是不爭的事實，不僅直接地提昇刻印技術，更間接地有助於保存文獻、傳播文化，促進當地文教事業的勃興，其貢獻不可忽視。

## 二．藏書

杭州自古為刻書的重地，出版書籍既多，自然也有人開始建樓藏書。與其他城鎮比較起來，杭州居民擁有繁榮的社會經濟基礎，除了滿求基本溫飽需求，更

---

<sup>90</sup>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頁 641。（台北：丹青圖書公司印行，1983 年）

<sup>91</sup> [明]陸人龍：《型世言》，本書前有一回〈導言 - 一部佚失四百多年的短篇小說集《型世言》的發現和研究〉陳慶浩撰，（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 年）



進一步追求生活文化，滿足精神上更高層次的享受。出版業的發達，使得印刷技術更進步，書籍的質、量都有顯著提昇，因此私人藏書家更願意收購而珍藏。而且藏書又可以遺留給子孫，薰染文化的氣息。清人葉德輝有云：「藏書與藏法書名畫不同，子孫能讀貽之。不能讀則及身而散之，亦人生大快意事。」<sup>92</sup>，從上面這句畫，透露出藏書家更是期待子孫能吸取古人聖賢書中的智慧。當然，這其中包含著盼望子孫認真苦讀，求取功名的意涵。

浙江私人藏書之風，到底多麼興盛。據吳琯《兩浙藏書家史略》初步統計，「自晉至清末，僅以私人藏書家計，就有三百五十九人，藏書樓有名可稽的達一百八十處之多」<sup>93</sup>在皇家藏書方面，清乾隆皇帝有感於江南文化的興盛，令人續抄四庫全書三部，其中一部就放在西湖旁的文瀾閣<sup>94</sup>。除了私人、官家藏書外，另外寺院、書院也藏有很多的圖書。當然寺院藏書除了一般書籍外，大多為佛經，有助於宗教的傳播。而書院的藏書也為數不少，而杭州其中比較著名有杭州的「西湖書院」，它原來是南宋國子監所在，到元朝時將它改為西湖書院，裡面就藏有二十萬冊圖書，另外還有「虎林書院」、「敷文書院」、「詁經精舍」等，同樣的也藏有可觀的圖書。

下面筆者引自周少川先生《藏書與文化》<sup>95</sup>一書中的三個圖表，清楚顯示出浙江該地歷代藏書風氣興盛。而杭州乃浙江省的首府，當然有不可分割的連帶關係。

表 2-1 宋代藏書家人數地域分布

<sup>92</sup> [清] 葉德輝：《書林清話》，頁 288。（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

<sup>93</sup> 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頁 1。（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

<sup>94</sup> 另外二部四庫全書藏在楊州的文匯閣；一部藏在鎮江金山的文宗閣。可參見王旭烽：《西湖新夢尋》之〈話說文瀾閣〉，頁 44-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sup>95</sup>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第 3 章〈古代藏書家與社會歷史環境〉，頁 190-192。（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地域	河南	浙江	江蘇	江西	福建	四川	安徽	河北	山西	山東	湖北	湖南	甘肅	陝西
北宋	42	27	22	35	18	15	6	11	7	7	2	2	9	3
南宋	6	40	12	23	14	15	5	1	1	6	2	2	0	0
合計	48	67	34	58	32	30	11	12	8	13	4	4	9	3

表 2-2 明代藏書家人數地域分布

地域	江蘇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四川	廣東	山西	山東	河南	河北	陝西
人數	182	80	60	35	6	2	7	11	9	5	3	5

表 2-3 清代藏書家人數地域分布

地 域	北 京	浙 江	江 蘇	安 徽	福 建	廣 東	山 西	山 東	河 南	河 北	陝 西	遼 寧	江 西	四 川	湖 北	湖 南	貴 州	上 海
人 數	36	267	247	158	74	26	34	17	5	6	4	3	9	8	9	4	3	12

從上面圖表得知江浙藏書風氣的興盛歷久不衰，為全國之冠。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南宋浙江的藏書家增加幅度最大，這與南宋偏安江左定都杭州，有相當大關係，因此藏書家人數從 27 人增加至 40 人；然而北宋因遭逢兵燹之禍，藏書樓遭受空前未有破壞，或是有些藏書家跟隨皇室逃往南方，因此人數從 42 人遽減至 6 人。其二從明到清浙江藏書家由 80 人快速成長到 267 人，主要是經濟成長，刻印技術進步，印刷業迅速地發展所造成，使得浙江藏書躍升全國之冠。從這些數據，也透露出當地文化水平比其他地區高。藏書不但直接地保留歷代珍貴的文化遺產，無形中也孕育出不少優秀的知識分子，更促使學術勃興，交會出更

燦爛的文化光輝。

### 三．文人集團交往

自隋朝科舉取士以來，讀書人「十年寒窗苦讀」無不希望早日金榜題名。尤其是出身寒門的讀書人，更期望能藉此光宗耀祖，脫離貧困生活，施展遠大的抱負。江南地區長久以來文化發達，非其他地方所能及，尤其到了明清兩代，江南子弟登科入仕的更是超越前代。「區區江南一地，由科考脫穎而出者，堪為全國之最。江南進士以其人數多、名次前、仕宦顯而成為明清時期最為著名的地域人文集團。」<sup>96</sup>

居為江南重鎮的杭州在南宋時太學設於該地，成為一時文化教育中心。因此，文風興盛又加上西湖的山水美景的號召下，吸引了外地的文人雅士紛至沓來，到此地來遊玩或寓居，並且留下大量的詩詞、散文加以稱頌西湖山水風光<sup>97</sup>。如明代文壇宗匠的袁宏道，是湖北公安人，就曾與友人等遊覽西湖名勝，寫下妙趣天成的名篇「西湖雜記」，其中有一段明白表示「飛來峰」一景，前後就來過五次之多，毫不厭煩。

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峰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為陶石簣、周海寧；次為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為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sup>98</sup>。

---

<sup>96</sup> 范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佈及其特色分析〉，頁 171。收錄於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97 年第 2 期。

<sup>97</sup> 清 陳夢雷編：《古彙》第九百五十三卷〈杭州府藝文一〉、〈杭州府藝文二〉，收錄有關杭州著名的詩詞、散文作品，頁 8578-8594。（台北：鼎文書局，1976 年）

<sup>98</sup>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之〈遊記〉，頁 14。（台北：世界書局，1964 年）

在小說方面，男主人公也同樣久聞西湖美景，與其神遊嚮往，不如決定親自走一遭，領會其中之美妙風流。此輩如《西湖佳話》卷 11〈斷橋情蹟〉、《西湖二集》卷 22〈宿宮嬪情滯新人〉、卷 14〈邢君瑞五載幽期〉等。其中〈邢君瑞五載幽期〉清楚地描寫太原詩人邢君瑞來西湖賞玩的動機：

因見白樂天也是太原人，曾來杭州做太守，每每做詩稱讚西湖之妙，日日遊於湖上，笙簫歌妓，時嘗不輟。後來離任西湖，竟害了相思之病，戀戀不捨，做了千古風流話柄，流傳於世。他是前輩人，恁般如此妙，難道俺是後輩，便不如他不成，不可把他一個人占盡了「風流」二字，俺不免也到西湖上一遊。<sup>99</sup>

除了到此地遊玩的文人雅士外，更有為科舉考試專程而來。尤其當考期將至，杭州城萬頭鑽動，盛況空前情形為「到省士人，不下萬餘人，駢集都城。舖席買賣如市，俗語云『趕試官生活』，應一時之需耳。」<sup>100</sup>西湖小說也描述到外地男主人公來到杭州的原因，有大半的都是趕考或是在此唸書準備求取功名。如《古今小說》卷 23〈張舜美燈霄得麗女〉；《警世通言》卷 6〈俞仲舉題詩遇上皇〉；《西湖二集》卷 4〈愚郡守玉殿生春〉、卷 3〈巧書生金鑾失對〉、卷 11〈寄梅花鬼鬧西閣〉、卷 20〈巧妓佐夫成名〉、卷 27〈酒雪堂巧結良緣〉等篇章。

自南宋開始，杭州書院林立，除了上節所述「虎林書院」、「敷文書院」、「詒經精舍」、「西湖書院」外。另外，明代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中，也記載著他走遍西湖勝景，所見其他書院的特色和由來，如「近山書院」、「兩峰書院」、「天真書院」、「萬松書院」、「吳山書院」等。西湖附近書院的密集，證明當地的文風鼎

<sup>99</sup> [明]周楫《西湖二集》卷 14〈邢君瑞五載幽期〉，頁 297。

<sup>100</sup> [宋]吳自牧：《夢梁錄》，頁 147。

盛，集聚多少名師宿儒在此授課，學生除了當地的讀書人外，更有外地來此寓居的文人。尤其是到了科舉考期前後，不難想像西湖畔文人雅士集聚於茶樓飯館，招朋置酒、高談闊論，交換彼此的意見。

除了書院外，文人們也會私下依據共同的愛好而結社，如「奇巧飲食社」、「花果社」、「七寶考古社」、「清樂社」等，這些集社的項目無所不包。南宋時以「西湖詩社」的規模為最大，成員在約定的集會日期，齊聚一堂，彼此切磋交換心得，通常在幾杯黃湯助興後，輪流題詩賦詠。如此一來，大家為一展文才，無不絞盡腦汁，因此激盪出不少佳作，流傳於外。

文士有西湖詩社，此乃行都縉紳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興適情賦詠，膾炙人口，流傳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藝精熟。<sup>101</sup>

從上可知，詩社的成員並非完全都是文人雅士，所謂「縉紳之士」，無疑就是當地的權貴之士，如地主、官僚等。他們附庸風雅刻意結交名士，提高自己文化的水平；相對的文人也樂意得到他們的支持，使得詩社的規模越來越盛大，名聲也傳播越遠。《西湖遊覽志餘》卷 21〈委巷叢談〉也應證士紳雲集，結社交友文風鼎盛的情況：

元時，豪傑不樂進取者，率託情於詩酒，其時杭州有清吟社、白雲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會，儒雅雲集，分曹比偶，相切磋，何其盛也。國初猶有餘風，故士人以詩學相尚。宣德、正統間，海內熙熙，而杭城繁盛，士庶燕會，雅而弗淫。<sup>102</sup>

---

<sup>101</sup> 同上，頁 299。

<sup>102</sup>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 21〈委巷叢談〉，頁 387。

明清時，江南素有才子之鄉的美譽，因為登科入仕的子弟，數不勝數。主要是優越文化環境非其他地區能夠相及，而杭州更是江南文化中心之一，此地文人在科舉的表現，自然也有突出的表現，尤其是以商輅最為難得。有明一代，只有兩位連中三元（解元、會元、狀元），他的事蹟在《西湖二集》中〈商文毅決勝擒滿四〉有詳盡生動的描寫，在此就不多贅言。同樣地，張翰也是杭州人，乃嘉靖十四（1535年）高中進士，他曾餘有榮焉地談到家鄉的科舉之盛：

余杭鄉試發解者，洪武中有花公綸，天順沈公繼宣，嘉靖間有余弟濂、周公詩，隆慶間有凌登瀛，萬曆初年莫睿。而會元則仁和劭公銳，發於正德戊辰。狀頭前有李公旻，後有茅公瓚，皆止吏部侍郎。乃得入殿閣者，穆宗朝有高文端公儀……若夫科第之盛，萃於江氏，直接五世，共六進士矣。

103

接著，筆者引用范金民先生〈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一文中所列出「明清江南各府進士比例表」<sup>104</sup>圖表，來觀察杭州府位居人文淵藪的江南，其進士的比例與其他各府作個比較，以及詳細的進士數量。

地 區	明		清		明清通計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蘇州	1025	26.53	657	16.37	1861	23.63
松江	424	10.97	249	6.20	673	8.55
常州	636	16.46	645	16.07	1281	16.26
鎮江	187	4.84	211	5.26	398	5.05

<sup>103</sup>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之六〈盛遇記〉，頁116。（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5年）

<sup>104</sup> 范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佈及其特色分析〉，頁174。收錄於南京大學學報（哲學 人文 社會）97年第2期。

江寧	357	9.24	311	7.75	668	8.48
杭州	477	12.34	892	22.23	1369	17.38
嘉興	471	12.19	491	12.24	962	12.21
湖州	287	7.43	378	9.42	665	8.44
合計	3864	100	4013	100	7877	100

從上面圖表得知蘇州、杭州、常州、嘉興四府，不管是明代或清代總是在前四名，有優秀的表現。「可見明清江南進士的地域分布主要在蘇松常杭嘉地區，南京、鎮江、湖州地區則相對少得多，而且由明至清有逐漸東移的趨勢，這顯然又與經濟和文風有關。」<sup>105</sup>尤其杭州的變化最大，由明至清進士的人數從 477 人快速增加到 892 人，其所佔進士人數為江南的 22 % 之多，上升的比率最高。顯現出杭州不僅有安定富足的經濟條件，當地文風的推動與重視也是不遺餘力，使得子弟們在科考時能有此優異的成績。

杭州是中國歷史名城，它城內西面有個名冠天下的西湖，令販夫走卒嚮往，文人墨客更是喜歡佇足賞玩。杭州與西湖的關係，好比血肉相連，不可分割。西湖這充滿詩情畫意的文化氛圍，得自杭州優越文化環境。當地刻書、藏書之風盛行，而且南宋又定都於此，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樞。到了明代中葉後因手工業的崛起，促使江南絲織業的蓬勃發展，奠定經濟繁榮的基礎。尤其，杭州的人文鼎盛，多少讀書人聚集於西湖，結社交友、吟詩賞玩，耳濡目染當地的傳說軼聞，遊歷附近名勝古跡，對杭州的文獻掌故均有深刻的認知與體會，無形中推動「西湖小說」的勃興。

<sup>105</sup> 范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佈及其特色分析〉，頁 175。收錄於南京大學學報（哲學 人文 社會）97 年第 2 期。

## 第三章．「西湖小說」之內容探析

### 第一節 西湖小說中歷史人物

- 一． 才子文士
- 二． 忠臣孝子
- 三． 奸臣佞賊

### 第二節 西湖小說中宗教故事

- 四． 佛道人物
- 五． 宗教信仰

### 第三節 西湖小說中愛情故事

- 一． 預設場景
- 二． 節日習俗應用
- 三． 集中時間刻度
- 四． 人物身分

本文所收錄西湖小說故事，乃是從十八本話本小說中擇取<sup>106</sup>。共收錄有一百一十回，從這些作品當中可以概分三大題材<sup>107</sup>。其一為愛情婚戀之題材，這是自古小說家創作時喜愛的題材，強調男女追求幸福和愛情的嚮往。這類的作品共計 45 篇，占西湖小說內容之 41 %。其二是宗教類之題材，此類作品共計 28 篇，占全部之 25 %，其三為講史類之題材，此類作品共計 21 篇，占全部之 19 %。因此本章將以上面所敘述的三大題材，為探討對象。

所選出的話本小說大都有學者或碩博士論文專門探討過，如『三言』、『二拍』、《西湖二集》、《西湖佳話》、《歡喜冤家》、《石點頭》……等。每回小說中的

---

<sup>106</sup> 請參見附錄（一）「西湖白話短篇小說一覽表」

<sup>107</sup> 請參見附錄（三）「西湖小說內容題材比重表」



故事內容，幾乎都有前人詳簡不一描述過，本文不再贅述。筆者重新閱讀文本時，嘗試以敘事學方法去思考「環境」<sup>108</sup>對故事結構的影響及它與情節、人物的關係。只要作者用心塑造一個良好環境，可以增強其文化氣氛、意蘊，及塑造人物繼而建構故事發展。筆者希望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讓西湖小說內容呈現出更真實、活潑的生命力。

就時間而言，杭州歷經多少改朝換代，跨越了幾千年的滄桑歲月，不停地在流逝。然而，以地理空間而言，它是凝固靜止的，擁有著獨特秀麗的自然景觀。居住在這空間的人民，自然會逐漸形成其生活方式、風俗、宗教、語言等，因此隨著時間消逝，積淀出該地特有的地域色彩。西湖小說的背景限定於相同敘事空間，地理環境對於該地區文化發展和人們的性格喜尚等，在潛移默化下有一定的制約作用。

## 第一節 西湖故事中歷史人物

小說中歷史人物，乃作者在真實的人物基礎上，增添個人適當的想像、虛構或是民間掌故遺聞，使得情節發展更跌宕起伏，當然基本情節是不能違背史實的，而且因應情節發展所虛構的人物或事件，在當時歷史環境中是可能會發生的。故作者應該對當時時代紛圍、生活風尚要能切實掌握，否則會使小說呈現出來的歷史人物，令人真假不清。

西湖小說中歷史人物常常與當地自然景觀有緊密的關聯，甚至結合。就如西

---

<sup>108</sup> 胡亞敏：《敘事學》曾對「環境」有所闡述：「環境包含三大要素，自然現象，社會背景，物質

產品。而自然現象，主要指天氣、風景、地域等非人工的因素……。社會背景，指由人際關係構成的社會活動。它既包含人物活動的時代背景、風俗人情，也包含人與人之間爭鬥、聯合、分離等具體關係……。物質產品，指人類生產或利用的客體。它一般具有人造或人為的痕跡，從城市建築到服裝樣式。」，頁 159。（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

湖上「蘇堤」、「白堤」，或湖畔「岳王廟」等，當親身遊歷於這些地理景觀中，背後蘊藏的歷史的軼事，油然浮現腦際，彷彿置身於前賢時流所共同經營的文化氛圍之中，自然地引起複雜感受和思緒。因此小說中往往可見歷史的典故意象，形成特殊的「感覺結構」<sup>109</sup>。

進一步地說小說家對西湖的書寫，他們所要強調的不僅是當地湖光山色（自然山水），而是山水背後的歷史記憶（人文山水）。藉著特殊景點以聯繫相關歷史人物，或是由山水去懷想曾經在此任官、寓居的文人才士。小說家豐富的情感能激發創作力，也才能真正感動讀者。

觀察西湖小說的歷史人物，近則是出生於杭州當地人，遠則更擴及整個浙江或是在此宦遊或寓居的人。對於這些歷史人物，並非完全是正面的稱讚歌頌，也有對奸佞小人提出嚴苛批評。因此將這些歷史人物分為「才子文士」、「忠臣孝子」、「奸佞權臣」這三大部分。

## 一．才子文士

歷史上著名的才子文士，都他們賦有超凡突出的才思，受到人們景仰和肯定。在西湖故事忠當然也不例外，當地文風興盛，對才子文士更是推崇倍至。在西湖小說中出現過的才子文士，有白居易（西元 772-846 年）、蘇東坡（西元 1036-1101 年）和林和靖（西元 967-1028 年）等人，在故事中往往強調他們的風流行徑和才思文筆，因此作者在書寫之中穿插不少的他們詩文作品。

---

<sup>109</sup> 夏鑄九：《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闡述「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指「在特殊地點和時間之中，一種生活特質的感覺，也是一種特殊活動的感覺方法，混合了「思考和生活的的方法」；換句話說，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為個體和群體在特殊歷史情境，參與永無止境的結構歷程的時空之流的另一種副產品 ( by-product )」，頁 92-96。（台北：明文出版社，1993 年）

想要真正體會西湖的美麗風情，非要親身走過湖上兩條堤岸。尤其是在春天，楊柳依依，桃花盛開，美不勝收。這兩條堤岸分別是「白堤」與「蘇堤」。無疑地，就是以白居易和蘇東坡命名的。為何呢？因為百姓日常生計最有直接關聯的人，莫過於是地方官。封建體制下，雖只有君主一人，但是他不可能親自治理天下，需委任於派駐各地的地方官。地方官如果清廉為政，勤政愛民，一定會受當地百姓會愛戴尊崇。

白、蘇兩人都是一代文壇領袖，個性直爽豪放，勇於直言，白居易論事鯁直觸怒憲宗，蘇東坡得罪王安石，兩人貶官前後都派任到杭州。白居易在穆宗長慶二年（西元 822 年）任杭州刺史；蘇軾到杭州任官共有兩次，第一次（西元 1071 年）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元祐四年（西元 1089 年）任杭州知府，前後治杭共五年。兩人都因被貶守杭，任官時行事風格也有很大相似性。因此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餘》中就表示「杭州巨美，得白、蘇而益章，考其治績怡情，往往酷似。」

110

古代水利不發達時，如果一下大雨，西湖水就滿溢出來；相反地，久旱和不雨，湖水就會乾涸，無法灌溉良田。因此當地百姓叫苦連天，於是白、蘇都決定將西湖整治一番。想到同樣方法「何不將此葑草淤泥取將起來，填築一條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又去，行人又便，此一舉而兩得之利也。」<sup>111</sup>，並在堤岸兩旁廣植桃柳，到花開季節，望之就如一片雲錦。雖然現在「白堤」、「蘇堤」非當時所建的堤道，但百姓為了感念他們的恩德，於是用兩人的名字取名紀念。這兩位才子政事之暇，總是到西湖上遊覽，與文人或高僧吟詩作樂。面對西湖山光水色，在創作上彷彿如虎添翼，留下不少名篇傳世，使得西湖美景，天下皆知。

當然「才子」身邊總是缺少不了「佳人」，西湖彷彿也是誕生奇女子最佳寶

---

<sup>110</sup> 《西湖遊覽志餘》卷 10〈才情雅致〉，頁 171。

<sup>111</sup> 《西湖佳話》卷 6〈六橋才蹟〉，頁 55。

地，歷史上耳聞能詳的就有西施、蘇小小等人。因此《西湖佳話》中〈白堤政蹟〉、敘述白居易巧遇名妓商玲瓏；而〈六橋才蹟〉中蘇軾則巧識名妓朝雲。另外，蘇東坡的風流韻事，在《熊龍峰四種小說》之〈蘇長公章臺柳傳〉也有一筆。敘述蘇軾在杭州任太守，一日與佛印飲酒興起，答應娶妓女章臺柳，後來忘記。妓女章臺柳久候無消息，乃另嫁他人。等蘇軾回憶起此事，已無能為力的故事。白、蘇兩人有名妓相陪，日後處世不免更加「文雅風流」，常留連西湖上吟詩作對、樂不思蜀。

可貴的是，兩人並不荒怠政事，除了用心解決民生疾苦外，並對西湖建設有非常大的貢獻。等他們離開後，也難忘西湖的好，常常在幽思難解下寫詩詞排憂。在〈白堤政蹟〉中有一段敘述白居易身心不快，他的親友關心問他原因，他回答道：「諸君若問吾心病，卻是相思不是愁。」他的親友進一步問他是否與商玲瓏離別有關，他正色道：

商玲瓏雖然解事，亦不過點綴湖山，助吾朝夕間詩酒之興耳，過眼已作行雲流水，安足繫吾心哉？吾所謂相思者，乃是南北兩峰，西湖一水耳。<sup>112</sup>

從最後三句話，對朝夕相處的商玲瓏不免是一種傷害。但從另一個觀點，不難想像西湖對詩人的影響力有多深，常是他魂牽夢繫的所在。其實白居易有一首詩〈春題湖上〉，更清楚交代出他的心聲「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sup>113</sup>最後這一句「一半勾留是此湖」，可想而知西湖在詩人的心中，有個不可取代的地位。

蘇東坡與白居易相比，西湖與他感情應該更是深厚。從蘇軾這首詩「居杭積

---

<sup>112</sup> 《西湖佳話》卷2〈白堤政蹟〉，頁35。

<sup>113</sup> 王榮初選注：《西湖詩詞》，頁12。（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

五年，自憶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買西湖鄰。」可知他深深愛上了這裡的湖山，自命為「杭人」。因為蘇東坡到杭州任官共有兩次，總共五年之久。第一次來杭當通判，正值壯年三十六歲，第二次來已十五年後，尤其用心治理，在元祐五年（西元 1090 年）寫下富歷史性的〈乞開杭州西湖狀〉，上書給宋哲宗，親自為西湖請命，說明西湖的疏浚開鑿攸關當地人民的生計，至今留下一句名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sup>114</sup>。如今西湖至今能有機會展現它特有萬種風情，令遊客為之傾倒。想必特別感謝白居易、蘇東坡這兩位大詩人。

接下來，順著白堤走去，會發現西湖上有座孤山。在唐代就開始有人在這座小山上建祠蓋廟，從湖上遠望樓閣參差。它地形之勝在白居易的〈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贈諸客〉一詩中，揣摩格外神似貼切。

波淡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

但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水中央。<sup>115</sup>

白居易用中國神話裏的蓬萊仙宮比喻孤山，一點也不過分。在夕陽下，孤山被餘暉照耀得金光閃閃，如身在仙境。難怪北宋有位大文士決意卜居于此，終其一生。他就是林逋（西元 967-1028 年）號和靖先生。《西湖佳話》卷 5〈孤山隱蹟〉就是描寫他傳奇生平。特別的是他終身不娶，以種梅養鶴而自娛，因此有「梅妻鶴子」佳話。最可貴的是他有二十餘年不入城，而無一日不恬然自足。然而他居於孤山，其實不孤，與他交往密切的有梅堯臣、范仲淹等人<sup>116</sup>。可能與他來往的人在文壇或政治上皆是佼佼者，因此他的詩名更加遠播，慕名而來的訪客絡繹

---

<sup>114</sup> 《西湖遊覽志》卷 1〈西湖總敘〉，頁 3。

<sup>115</sup> 《西湖詩詞》，頁 10。（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sup>116</sup> [宋]林逋：《林和靖先生詩集》中有多首詩提及梅堯臣、范仲淹等人作品。如「和梅聖俞雪中同虛白上人來訪」、「送范仲淹寺丞」等，同時林逋在〈寄梅室長堯臣〉詩中提到「君家先祖隱吳門，即日追游往事存」，可見他家與梅家本來就有交往的。台北：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集部〕，1975 年。

不絕。

林和靖對於種梅、養鶴的鍾愛。在精神層面上，可說是自我人格的期許和象徵。自古多少文人雅士以詠梅，比喻高潔的品行，因為寒冷的氣候下，只有梅花依舊綻放如常。同樣地，鶴體態瀟灑又較罕見，有「仙鶴」之別名。意味著不眷戀於塵世，孤高自好。所以說林和靖選擇以梅為「妻」，以鶴為「子」，自有他的用意和喜好原因。故《西湖佳話》作者墨浪子認為自古「隱之情，隱之時，與隱之地，則不一也」，然而從這三處考量，惟「林和靖先生為最」。林和靖先生對於自己一生能夠堅持至終從未任官，也非常自豪。在他生前就預蓋好的墳前，寫下這一首詩〈自作壽堂因書 - 絕以志之〉表達其心志。

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

茂陵他日求遺稿，獨喜曾無封禪書。<sup>117</sup>

林和靖去世後「後人思慕其高風，遂以其故廬立為祠宇，後復徙神位于蘇堤李鄴侯、白樂天、蘇東坡三賢祠內，合為四賢祠，至今祭享不絕焉。」<sup>118</sup>可知當地人對和靖先生的高風亮節景仰不已，將他與治杭有功的三位賢人並稱。如今孤山已經成為中山公園，仍舊為林和靖保留了一座「放鶴亭」，附近梅花依舊，靜靜地依偎在西湖畔，等待明日朝露餘暉。

## 二．忠臣孝子

小說中歷史人物，敘述文臣武將忠勇智謀的題材佔絕大多數。其次是表揚孝子的故事。在中國古代小說中不難發現幾乎有個共通性，就是宣揚「忠、孝、節、

<sup>117</sup> 《西湖詩詞》，頁 34。（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sup>118</sup> 《西湖佳話》卷 5〈孤山隱蹟〉，頁 87。

義」這傳統的道德教訓。杭州這地方，歷史上有吳越國（西元 907-978）南宋（西元 1127-1279 年）在此定都，因此曾經上演著許多歷史變遷的血淚故事。首先我先將這些人物細分為「武將」、「文臣」、「孝子」等三個部分。

### （一）武將

所謂武將乃統領軍隊，保衛疆土，抵禦外敵。在西湖小說中收錄有兩位武臣，一是吳越王錢鏐，一是寫下千古絕唱〈滿江紅〉的岳飛，在西湖小說的歷史人物以錢鏐和岳飛是屬於武將。兩人一生都在倥傯之際，早將生死置於度外，這是需要英雄的膽識和氣魄。首先，介紹這傳奇人物 - 錢鏐（西元 852-932 年）<sup>119</sup> 出生正值唐末藩鎮割據，戰火不斷，民不聊生。他出身貧賤<sup>120</sup>，長大後投軍行伍，逐步發跡，官至節度使，統領兩浙，後來據地為王，成為五代吳越王。他一生傳奇的事蹟，分別在《古今小說》、《西湖佳話》、《西湖二集》等小說中，都有詳盡的描述。可想而知，他是西湖小說中不可忽略的對象。至於本文將錢鏐歸於「武將」，可能會有些異議，但是主要考量他雖統領兩浙十四州，畢竟不是頭戴冠冕的皇帝。

吳越王錢鏐對杭州的發展奠下重要的基礎，主要貢獻如下：平息兩浙戰亂、修築海塘、疏浚湖泊、鼓勵農桑、發展海運等。使得吳越富裕在當時「甲于天下」。然而在小說中，筆者認為有幾處是值得討論的，一是錢鏐認為「富貴而不歸故鄉，獨如衣錦夜行」<sup>121</sup>，這個就是中國人深根蒂固「衣錦還鄉」的傳統觀念，一旦功名或是事業有成，必會馬上想要返鄉，將這份榮耀、喜悅與親友分享，否則隻身在外地即使大富大貴，心靈還是很空虛的。二是有關於「錢王射潮」的傳說，在

---

<sup>119</sup> [清]吳仕臣：《十國春秋》卷 77〈武肅王世家（上）〉載「武肅王姓錢名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頁 486。（台北：鼎文書局，1976 年）。或可參考王仲榮：《隋唐五代史》（下）第八章〈五代十國的政治與經濟〉之「吳越錢氏的建國及其附宋」頁 893-895，（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92 年）

<sup>120</sup> 《十國春秋》卷 77〈武肅王世家（上）〉載「及壯無賴，不善事生產，以販鹽為盜。」可知他長大後，販運私鹽，目睹亂世，後來從軍入伍。頁 486。

<sup>121</sup> 《古今小說》卷 21〈臨安里錢婆留發跡〉，頁 322。

< 臨安里錢婆留發跡 > 有一段精采傳奇的敘述：

其年大水，江潮漲溢，城垣都被衝擊。乃大起人夫，築捍海塘，累月不就。錢鏐親往督工，見江濤洶湧，難以施工。錢鏐大怒，喝道：「何物江神，敢怒吾意！」命強弩數百，一齊潮頭射去，波浪頓然斂息。不勾數日，捍海塘築完，命其門曰「候潮門」。<sup>122</sup>

雖然這傳說將錢鏐神人化、英雄化。但是從故事中可以發現百姓對安定生活的渴望，因此基本的水利建設是不可忽略的。而能夠重視百姓的聲音，讓他們得以安居樂業的官吏或統治者，在他們心中當然是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最後要提的是，錢鏐要造宮殿於鳳凰山，曾經有個看風水的建議他，如果將西湖填平，建宮殿於上，有千年王氣。而建於鳳凰山，國運只有百年。錢鏐聽到後，回道：「豈有千年而無真主者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sup>123</sup>由此可以看出錢鏐胸襟之大，見識之遠，不願個人私利而有損百姓之利益。作者在故事結尾寫道：

雖崛起一時，同於寇盜，能知上尊朝廷，下仁萬姓，保全土地，不遭塗炭，不妄思非分，而順天應人，其功與帝王之功自一揆矣，故能生享榮名，而死垂懿美於無窮。

從這段話透露出作者對「真正英雄」的景仰，難人可貴的是，錢鏐出身低賤沒有讀過多少書，由一介武夫爭戰各地，終於掙得了這吳越的江山。他不曾荒怠逸享樂，一貫勤政愛民。也因為錢鏐的遠識，沒有聽從看風水的建議，廢棄西湖。使得西湖才得以保存下來，如今我們才有幸一睹此人間仙境。

---

<sup>122</sup> 同上，頁 322。

<sup>123</sup> 《西湖遊覽志餘》卷 1 < 帝王都會 >，頁 6。



現在，吳越時代的鳳凰山宮殿，隨著歲月毀棄，只能埋入百姓的記憶當中。唯有寶石山上的「保俶塔」，據說是保佑錢鏐的孫子錢俶所建，當時宋太祖趙匡胤已經稱帝，錢俶為了保吳越免於戰亂，決定歸順，前往開封面見趙匡胤<sup>124</sup>，而其家人為祈求他能平安歸來而建立此塔。雖然保俶塔已經非原來面貌，經過後世的重修，但仍表徵著吳越治理杭州的那段輝煌歷史。

接著，要討論的武將，自然就是背上刺有「盡忠報國」的岳飛。在《西湖佳話》之〈岳墳忠蹟〉中有詳盡介紹，可惜宋高宗時，岳飛力主恢復中原，曾帶領岳家軍收復建康（今南京），對內平定馬進等強盜，對外金兵南侵時，連破兀朮拐子馬戰術，並聯絡四方豪傑欲收復汴京。然而令人氣憤不已的是秦檜等奸臣，以「莫須有」的罪狀，下獄問斬。岳飛雖然不是出生於杭州，但是他死後卻埋於西湖棲霞嶺下，他的赤膽忠心，深深感動杭州的老百姓。因此在西湖畔所建的岳王廟至今香火不絕，遊人不斷到此憑弔他。尤其一走進岳王廟，見到大殿下懸掛的橫匾－『心昭天日』，相信遊客會身不由己感染到一代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氣，不得不敬佩他臨死不懼的偉大氣節。

據說，岳飛墓前跪著秦檜等四個罪人<sup>125</sup>，聽當地人說這已經是第九次鑄造了。因為敵不住人們對他們的擊打唾罵。至今離岳飛罹難已八百多年了，人們對他們的氣憤仍未消止，更不用說當時南宋百姓對岳飛這民族英雄的冤死，是多麼憤慨不平。清代文人袁枚在〈謁岳王廟作十五絕句〉曾寫道：「江山也要偉人傳，神話丹青即圖畫。賴有岳于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sup>126</sup>。這四句詩，明白點出西湖有一代英雄岳飛在此埋骨建廟，人們賦予它不同的文化氛圍，添加些許崇

---

<sup>124</sup> [清]吳仕臣：《十國春秋》卷 82〈忠懿王世家（下）〉所載錢俶在宋開寶九年（西元 976 年）入朝面見宋太祖，而且貢奉犀玉帶及寶玉金器五千餘件、上酒一千瓶，又白金十萬兩等物品，頁 540。（台北：鼎文書局，1976 年）

<sup>125</sup> 四個人分別是秦檜、其妻王氏、張俊、万俟卨。

<sup>126</sup>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 26〈謁岳王墓作十五絕句〉頁 57。收錄於《隨園全集》下冊（台北：啟明書局，1960 年）

高、肅穆的意涵。故南宋以降的文人，如果來到西湖幾乎無不到岳王廟憑弔追思。因此許多有關西湖的詩詞，都會表達出文人對岳飛一生盡忠報國，卻得到含冤而死的悲劇下場，唏噓不已。例如宋末元初人趙孟頫〈岳鄂王墓〉一詩：

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中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山光水色不勝悲。<sup>127</sup>

## （二）文臣

毋庸置疑，文臣不需要衝鋒陷陣去戰場，消滅敵軍。主要強調的是，他們運籌帷幄的智謀，臨危不亂的膽識，能為皇帝分憂解勞，維持政局的安定。在西湖小說中，寫到歷史文臣，從唐代至明，總共有八位之多。首先我先依照時間的順序，將故事大要簡述，並討論他們與杭州或西湖的關係。如下表：

---

<sup>127</sup> 《西湖詩詞》，頁 34。（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姓名	年代	出處	故事大要	與西湖關係
褚遂良 (西元596-658)	唐	《西湖二集》之 <薰蕕不同器>	其人博學多聞，只要唐太宗如有不懂之事，必定要問他，而且時常規勸皇上親民、尚儉，使得當時政事太平。但是武后篡位時被殺害。	杭州人
羅隱 (西元833-910年)	五代	《西湖二集》之 <文昌司憐才慢注祿籍>	有「東南第一才子」之稱，原本有帝王之相，因為心起惡念，上帝將他的帝王骨數盡換過。幸而改過行善，文昌帝助其還回祿籍。後來做到吳越王錢鏐的諫議大夫，常規勸皇上行為。	浙江人
宋濂 (西元1310-1381年)	宋	《西湖二集》之 <壽禪師兩生符宿願>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平生有放生之德。後來轉世成為宋濂來救世，助明太祖統一天下，因博學精深，太祖對之禮遇非常，也因為宋濂的影響，太祖始信佛法。	前世是杭州活佛，今生來到西湖悟前生。
劉基 (西元1311-1375年)	明	《西湖二集》之 <劉伯溫薦賢平浙中>	朱元璋的開國國師，他足智多謀，使得朱元璋總能逢凶化吉，其更有個可貴之處，就是為國求賢，力薦敵軍元帥朱亮祖的才能，於是在朱歸降後，朱元璋如虎添翼，得以平定浙江。	元末時杭州深受戰火波及，因劉基得以平定。
王禕 (西元1322-1373)	明	《西湖二集》之 <忠孝萃一門>	當時飽學之士，與宋濂齊名，得到明太祖信賴，並參與修明史。後奉命到雲南勸降元遺臣，沒想到遇害而死。	浙江人
于謙 (西元)	明	《西湖佳話》之 <三臺夢蹟>	小時就異於常人，具奇稟異能。科舉及第後，一直深受朝廷重用，尤其土木之變時，臨危不	杭州人

1394-1457)			亂，穩定政局。後來被奸臣石亨等人陷害，下獄處決。	
商輅 (西元1414-1486年)	明	《西湖二集》之 <商文毅決勝擒滿四>	天性聰明，出口成章，果然三元及第，官拜翰林，因公正不阿，被奸臣所害而罷官。第二次入閣十年，仍為朝廷盡心做事，因他力薦項忠，使項忠得以順利擒到叛賊滿四。	浙江人
胡宗憲	明	《西湖二集》之 <胡少保平倭戰功>	任浙江監察御史，時倭寇盛行，沿海居民苦不堪言。於是其設計誘殺當時倭寇為禍最烈的寇首徐海、陳東、葉麻等人，蕩平沿海數十年之患。後來被言官彈劾日費斗金，於獄中病死。	任浙江監察御史

上表所舉出歸屬於文臣的的歷史人物，雖然有些非當地人，也未曾當任過杭州地方官，因此與當地人民沒有深厚的情誼。甚至有的主人翁與杭州根本沒有直接上的關係，得勉強去追溯淵源，例如在<忠孝萃一門>中的主角王禕，在故事開頭就交代他是金華府義烏縣人，而金華與杭州同屬於浙江，這恐怕是他與西湖唯一的關係。

值得思考的是，這些文臣雖然大半不是真正杭州人，但是作者刻意地將他們收錄在《西湖佳話》、《西湖二集》等西湖小說專著中，我想這與作者主觀的想法是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從事通俗小說的創作，幾乎是失意的文人，在面對現實經濟壓力下，最佳謀生之道。相反的，他所取材的那些功名顯赫的文臣，如果不是順利科舉及第，一舉成名天下知，如于謙、商輅、胡宗憲等。就是得到皇上的賞識，由布衣平民直接拔擢成重臣，如宋濂、劉基、王禕、羅隱等。這與小說中「發跡變泰」有共同的思考模式，作者除了認同這些文臣的事功，也傳達出作者對他們的欽羨，將自己的期待，投射於其中，渴望現實生活中也有這類人等來幫助，



獲得朝廷賞識。

每個歷史故事後，自有不同的人物，當然也有不同的時代背景和際遇。但是都強調出為人臣「忠」的思想。如竭盡輔佐君王，勇於直言規勸其缺失，不懼奸臣小人的毀謗等，這些無不是「忠」淋漓盡致的表現。甚至有些文臣，被奸人陷害，死於非命的不在少數。如褚遂良、王禕、于謙、胡宗憲等。他們悲劇性的下場，更使後世追念不已乃為人臣子的完美典範。

其中，在〈三臺夢蹟〉中有強烈的地域意識，在入話中有段議論，明白地告訴讀者，西湖乃靈秀之氣所鍾之地。而此靈秀之氣，乃是正氣為之主宰，故得以生出正人。繼續點出正人乃是明代忠臣于謙。作者更進一步舉證于謙稟西湖之正氣而生的理由，為「只因他生的那時節，杭州三年桃李都不開花，及他死的那一年，西湖之水徹底皆乾，以此察知。」<sup>128</sup>。在小說中描述貴人降生或死亡的神蹟，是屢見不鮮的，敘述手法幾乎以夢兆或是家中出現異象為主，但是于謙則是相當特殊的，其降生或死亡的預兆，竟然反應在西湖這自然景觀上。這種「天人感應」的現象，表現出環境與人的密不可分的關聯。

另外，〈三臺夢蹟〉描寫于謙忠勇愛國的事蹟外，特別的是在該卷後面附錄「于祠祈夢顯應事蹟」，該附錄主要描述鄉里共 34 人，祈夢於于祠得其顯靈的神蹟。《西湖佳話》作者自稱此舉乃為了「略舉所見所聞數則，以表于公神異，千載如生。」<sup>129</sup>其實當地盛傳于公顯靈，確有其事，非作者憑空杜撰。明代文人張岱《西湖夢尋》也有云：「公祠既盛，而四方之祈夢至者接踵，而答如響。」<sup>130</sup>其實百姓感戴歷史英雄人物，建廟供奉香火不絕的現象，是中國文化中一種特殊的

---

<sup>128</sup> 《西湖佳話》卷 8〈三臺夢蹟〉，頁 142。

<sup>129</sup> 同上，頁 175。

<sup>130</sup> [明]張岱：《西湖夢尋》之〈西湖南路〉「于墳」，頁 144。（台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

宗教信仰。

然而，這些文臣中有一位是比較受爭議性的，那就是胡宗憲。我們先看《明史》是這樣形容他的為人「宗憲多權術，喜功名。因文華結嚴嵩父子，歲遺金帛子女珍奇淫巧無數。」<sup>131</sup>。從上所論，可發現《皇明從信錄》、《明史》等諸書記載，與本卷故事稍有出入。周清原意圖將平倭之功勞全歸於胡宗憲。並且試圖開脫他與嚴嵩勾結貪贓枉法之事。或許會有人懷疑作者周清原是否為胡宗憲在浙時門下的文士，關於這一點因為其生平事蹟長期以來湮沒無聞，無法考證。

但是，有一項是可以肯定的周清原乃浙江杭州人<sup>132</sup>。在〈胡少保平倭戰功〉開頭就描述當地的慘狀「昔稱人物阜繁，積聚殷富之處，盡被焚劫。那時承平日久，武備都無，到處陷害，屍骸遍地，哭聲鎮天。」<sup>133</sup>故胡宗憲對平定沿海倭亂，使七省百姓免於生靈塗炭的功勞，乃不可否認的事實<sup>134</sup>。使當地人民得以免於活在恐懼中，恢復生活原有的秩序，所以內心對胡宗憲有份難以言喻的感激。因此，周清原潛意識中就將這位英雄美化了，而杭州人周清原所寫得內容與史料有所出入，就不足為怪了。

### （三）孝子

在《西湖二集》卷 6〈姚伯子至孝受顯榮〉、卷 31〈忠孝萃一門〉這兩卷是

---

<sup>131</sup>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五〈列傳〉第九十三「胡宗憲」，頁 5414。（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

<sup>132</sup> [清]談遷《北遊錄 紀郵上》曾載：「觀西河堰書肆，值杭人嘗撰西湖小說。」，頁 65。收錄在〔清代史料筆記匯編第一輯〕（香港：龍門書店 1969 年）

<sup>133</sup> 《西湖二集》卷 34〈胡少保平倭戰功〉，頁 692。

<sup>134</sup>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 55「沿海倭亂」載「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何。巡撫李天寵束手無策」頁 594。（台北：三民書局，1956 年）；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第六章〈從正歸內閣到朋黨對立〉「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胡宗憲為浙江巡撫，總督軍務……其對攪倭事還算盡心，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三十六年（1557 年）間，宗憲設計誘殺了當時為禍最烈的寇首徐海、陳東、葉麻、汪直及日本大隅島主之弟辛五郎等，兩浙倭寇的兇燄有所減殺。」，頁 251。（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 年。）

以孝子為主人公。雖然這兩卷是出自於《西湖二集》一書中，可是故事與西湖沒有直接的關聯。勉強追溯的是主人公同樣是浙江人。前卷姚伯華乃浙江人，年二十未娶，全心照顧年長父母。因為元末官兵假冒紅巾軍，搶掠錢財，又將姚伯華父母摔下山崖。在神人相助下，他終於尋獲雙親屍骸，歷經艱辛才將父母安葬於祖墳。後來姚伯華娶錢塘楊氏，子孫繁盛且顯達。而〈忠孝萃一門〉是繼續忠臣王禕的故事，其子王紳知父親被叛賊所殺，死於異鄉。因此入雲南尋找屍骸，因屍首遍野，無法辨識。後來孝感動天，父親託夢轉告自己因盡忠而死，已列仙界。而王紳也順利尋獲父親遺體而回。

在這兩則故事中，有兩處是共通處的。一是人死後「落葉歸根」的觀念，儘管外在環境多麼惡劣，為人子一定要完成這遺願。因此孝子姚伯華要「裹了父母屍首，每邊一個，背在肩上，不敢從大路而行，乘夜從小路而走，用盡平生之力，穿林渡嶺。」<sup>135</sup>要回到祖墳安葬；另一個王紳面對成千上萬、面目全非的屍首，要找到父親的遺骸，竟使用滴血認親，自己弄得「十指刺盡，幾於無血可滴，身體羸瘦，有如鬼形。」<sup>136</sup>。孝子不畏艱難，無非不希望亡魂「死不瞑目」，故對於死於異鄉雙親，扶柩回鄉安葬，是為人子孝順最高表現。

另外，孝子在遇到不可解決困難，總能在緊要關頭迎刃而解，不外是其孝行感動天，暗中得有神助，如姚伯華一面要躲過賊兵追捕，一面背負雙親遺骸要返鄉，過程中就有土地公為其渡船等情事。同樣地，王紳不僅是孝子，又是忠門之後，作者自然會安排他如願以償找到父親遺骸，以全孝子之心。

### 三．奸臣佞賊

---

<sup>135</sup> 《西湖二集》卷 6〈姚伯子至孝受顯榮〉，頁 123。

<sup>136</sup> 《西湖二集》卷 31〈忠孝萃一門〉，頁 653。

在西湖小說中，對歷史人物除了正面稱揚歌頌外，也有對其惡行，嚴厲的譴責和批評。在《西湖二集》卷 32〈薰蕕不同器〉、卷 7〈覺閻黎一念錯投胎〉，及《古今小說》卷 22〈木綿庵鄭虎臣報冤〉等卷。尖銳地呈顯唐代許敬宗與南宋奸臣史彌遠、賈似道等人的罪行。

在〈薰蕕不同器〉中主要採對比法，指出唐代褚遂良、許敬宗兩人都是杭州人，而且都以博學為名。然而一個極忠，一個極稱佞；因此一個流芳百世，一個卻遺臭萬年。許敬宗「生平不忠不孝，閨門污穢，人倫不齒。棄子於遠方，嫁女於蠻夷，無一可取。」甚至，他為了個人前途諂媚於武則天，並陷害褚遂良等忠臣。因為他長壽，故杭州人不客氣地稱其為「賊臣老龜」。

南宋的腐敗與滅亡，史彌遠與賈似道這兩個罪名昭彰的奸臣，他們兩人要負起很大的責任。都是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終日飲酒作樂，與妻妾遊於西湖之上，因權勢通天，陷害忠良無人敢問。最後兩人作惡多端以致死於非命。對於杭州而言，南宋雖然國祚不到百年，但是卻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期，使得杭州的繁榮空前。因此作者對於史彌遠、賈似道這兩個南宋的罪臣，在譴責上更無情，相對地作者就會大費周章議論個人己見。所以在〈覺閻黎一念錯投胎〉該卷正文前，足足有兩千餘字長篇大論，這是在話本小說中較為罕見的。

如今西湖葛嶺上還傳著一段悲劇故事，與奸臣賈似道有關。因賈似道為了飽覽西湖山水之美，在葛嶺建了私人府邸，取名為「半閑堂」。故事在府邸中紅梅閣發生，〈木綿庵鄭虎臣報冤〉有精采描述：

一日，似道同諸姬在湖上倚樓閒玩，見有二書生，鮮衣羽扇，乘小舟遊湖登岸。傍一姬低聲贊道：「美哉，二少年！」似道聽得了，便道：「汝願嫁彼二人，當使彼聘汝。」此姬惶恐謝罪。不多時，似道喚集諸姬，令一婢



捧盒至前。似道說道：「適聞某姬愛湖上書生，我已為彼受聘矣。」眾姬不信，啟盒視之，乃某姬之首也。眾姬無不股慄。

這故事演變為京劇〈紅梅閣〉，同時在元人劉一清《錢塘遺事》<sup>137</sup>中也有記載，從故事不難想像賈似道殘忍無情，只是一句脫口而出的話，付出代價的竟然是人頭落地。這女姬在後來戲曲上喚作李慧娘，書生為裴舜卿。這一段淒美的故事，又為西湖添上些許惆悵。

總之，對於上面所論歷史人物，不論是輔佐朝廷的文官，或是保疆衛國的武將，小說家無非強調的是主人公高尚的道德情操，或卓越的智識才幹。由此可知作者們可能都眼見於明清交替兵荒馬亂，百姓流離失所，生命、財產都沒有保障。所以小說家深切體會到賢官能將對國家安定、地方繁華的重要性。故引用歷史上人物如白居易、蘇東坡、岳飛、于謙、錢鏐一千人，藉著對他們忠勇、才智的描述與讚譽，來代表他對當時政治的一種期待與追求的心情。

## 第二節 西湖故事中宗教的故事

宗教的傳播與人文地理有非常密切關聯。特殊的地理環境常常會有不同的民間信仰。諸如山嶽、湖泊等皆有其不同神祇守護。又如盛行於福建沿海及台灣等地百姓所崇拜馬祖信仰，這是因為該居民以前是以漁民為主，祈求媽祖能帶來平安與豐收。因此宗教也可以透露出該區域生產方式或生活方式。杭州本身也有特殊的民間信仰，如潮神。意蘊當地居民希望透過祭祀，錢塘江潮不要氾濫，造成百姓生命或財產的損失。

在杭州，宗教的影響力仍以佛、道教為最。其實在《西湖遊覽志餘》中第十

---

<sup>137</sup>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卷5「賈相之虐」，頁1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四卷〈方外玄蹤〉便將杭州古今有名的佛道人物收錄下來，因此成為西湖小說的最佳題材之一。另外就杭州佛教興盛情況，有清楚的數目，同書中寫到「杭州內外及湖山之間，唐以前為三百六十寺，及錢氏立國，宋朝南渡，增為四百八十，海內都會，未有加於此者也。」<sup>138</sup>；道教方面，在《夢梁錄》<sup>139</sup>就記載南宋杭州著名的道觀，有德壽宮、景靈宮、萬壽觀、東太乙宮、西太乙宮、佑聖觀……共 14 數之多。尤其六月六日崔府誕辰，好不熱鬧「此日內庭差天使降香設醮，貴戚士庶，多有獻香化紙。」<sup>140</sup>因為杭州佛道盛行，故西湖小說中不少主人翁是佛道修行的能人異士。或者在作品中對佛、道思想的宣揚和闡發為目的。

## 一．佛道人物

以『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話》、《西湖二集》兩本西湖專著做比較，以宗教人物為主角的比率，相對地提高。例如《西湖佳話》共有十六卷，其中有六卷就是以佛道人物為主角，描寫其生平和軼事。這六卷分別是寫卷 1〈葛嶺仙蹟〉的葛洪、卷 10〈虎溪笑蹟〉的辨才禪師、卷 9〈南屏醉蹟〉的濟顛和尚、卷 16〈放生善蹟〉的蓮池大師、卷 13〈三生石蹟〉圓澤和尚與李源的故事。這與五代吳越開始，杭州佛、道教就一直興盛不減有相當大關係。

實際上，中國與宗教與山水的融合，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以佛教為例，有道僧人幾乎都遠離塵世，走入山林尋個僻靜幽美的地方，靜心修道，有利於排除俗慮，早日修得正果。因此我們在讀史籍上的資料，如《高僧傳》記載，隨處可見佛教僧人無不「性喜山水」，對自然山水比一般人更有獨特的審美感知。長久以來，有其豐富的意涵在其中，主要是：

---

<sup>138</sup> 《西湖遊覽志餘》卷 14〈方外玄蹤〉，頁 260

<sup>139</sup> 《夢梁錄》卷 8，頁 193-200。

<sup>140</sup> 《夢梁錄》卷 4，頁 159。

佛教進入山水以後，賦予山水豐富的宗教哲理意義，從而使山水的文化意蘊顯得更加深刻而豐厚。各處留下的山寺塔剎，給山水風景文化增添了豐富的人文內容與美學內容；而將山水構成的意象來比喻佛教的空理，則使山水意境得到更進一步的開拓與。佛教最喜歡運用的山水意象，有江月、浮雲、流水、溪聲、鮮花、竹林等等，因為這些意象的似有而無且變化無常的性質能用來恰切地傳達禪意。<sup>141</sup>

天下的名山勝水幾乎都是佛道人物選擇修行的絕佳環境，無疑地西湖也是。他們所建的塔寺道觀，坐落在名山大川中，自然增添當地濃郁宗教色彩。例如杭州有名的靈隱寺，最早由印度和尚慧理在東晉時選中修行的地方，經過歷代的擴建經營，如今寺院宏偉、亭臺錯落，山壁盡是碑雕石刻，成為遊人、僧徒、文士的遊覽勝地。

西湖小說中佛道人物與其他小說比較，在敘述上會突顯出故事發生的地理景觀。就如《西湖二集》卷 25 <吳山頂上神仙> 背景自然在吳山，<葛嶺仙蹟> 地點自然在葛嶺，而<靈隱詩蹟> 背景在靈隱寺，<三生石蹟> 地點在天竺寺……等等。而且作者會將主人翁選擇地點的原委也多有著墨。舉例而言<放生善蹟> 中蓮池大師在擇地而居的情景「回到了西湖之上，便在南北兩山，欲覓一僻靜之所。忽見五雲山一個去處，四山圍合，徑曲林幽，原是古雲棲寺的舊基。」<sup>142</sup> 接下來，便敘述古雲棲寺的興廢歷史。這樣一來，同時這些故事地點匯聚起來，彷彿漫步在西湖周邊的廟宇，聽著古人講述著該寺廟傳說軼聞，這種身歷其境的感受，自然地就縮小了作者與讀者的距離。

---

<sup>141</sup> 李文初等：《中國山水文化》第一章<山水與宗教>，頁 44。（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年）

<sup>142</sup> 《西湖二集》卷 16 <放生善蹟>，頁 305。

這些佛道人物與西湖的關係，有著相得益彰之效。西湖雖有山靈水活勝境，可是如果沒有著名佛道人物在此修行，如何得有盛名，為世人廣知。就如我們口耳能詳的濟顛和尚，俗名李修緣。原在靈隱寺出家，後來到淨慈寺作書記，有關於他的民間故事不勝枚舉，〈南屏醉蹟〉就收錄不少他有趣傳聞軼事，尤其「古井運木」的傳說，描述一次淨慈寺火災，要重蓋大殿需要大木，於是濟顛來到四川化緣求木。可是路運耗時耗力，濟顛利用淨慈寺的醒心井，與海相通，故利用神通將大木都運到井底下。如今遊客到西湖很少會錯過這古剎靈隱寺，實在與濟顛有很大關聯。因此，佛法所以有靈，乃高僧出世；古剎所以有名，乃高僧駐此弘法。而且，濟顛的故事，一直流傳在民間，甚至自成系列，例如有《濟公全傳》、《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sup>143</sup>等書陸續問世，故濟顛和尚可說是西湖小說所產生一個獨具鮮活個性的宗教人物。

雖然，在杭州道教的影響不及佛教，但是其淵源頗為久遠。論最有名氣道教人物，莫過於晉時著有《抱朴子》的葛洪。道教修行講究煉丹煮藥，以求長生。而葛洪就是看上西湖山奇水秀，人煙稀少，決定在此煉丹修行。有關於葛洪的修煉成仙傳說在〈葛嶺仙蹟〉有生動描述。今日『葛嶺』就是他以前所居的地方，建有抱樸道院，相當別緻有黃色圍牆，牆頭蜿蜒地向山上延伸，從西湖中看上去，彷彿一條龍似盤據著山頭。山頂上有個『初陽臺』，據說是當時葛洪吸取日月精華，觀天地之化機所在。而葛嶺至今仍是西湖一大勝景，可見「地借人靈，垂之不朽。」<sup>144</sup>

值得一提，在同書中有一段這樣描寫「葛洪在斷橋間走，見一漁翁自言自

---

<sup>143</sup>《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索引出有關濟顛和尚小說有：《濟公全傳》西湖香嬰居士、《濟公傳》（不題撰人）《濟公傳續集》（不題撰人）《濟公活佛傳》（不題撰人）《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

<sup>144</sup>《西湖佳話》卷1〈葛嶺仙蹟〉，頁19。

語……」。回到歷史上時間來看，葛洪乃晉朝人，而杭州人稱「斷橋」<sup>145</sup>，始於唐代，因此小說在敘述上出現了時間錯亂情形。對於這樣描寫，近代學者劉勇強先生認為是「小說家把西湖文化視為一個共時性整體的意識，對於仙家來說，時間更是無障礙。」<sup>146</sup>因此，時間在小說敘述上，不一定要合乎歷史發生的順序。在呈現特有區域文化，它可以被省略的。

## 二．宗教信仰

杭州寺院林立，著名的就有就有天竺寺、昭慶寺、淨慈寺、靈隱寺、虎跑寺等。當地最盛大民間宗教活動，莫過於「西湖香市」，關於此盛況在張岱〈西湖夢尋〉裏有一段生動的描繪：

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墳，市于湖心亭，市于飛來峰，無不市，而獨湊集于昭慶寺，昭慶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有蓬，蓬外有攤，節節寸寸。凡 霜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兒嬉具之類，無不集。<sup>147</sup>

從上可知，香客遠則從山東或是杭、嘉、湖地區而來，近則是當地附近村民。各地香客蜂擁進城燒香禮佛。除了進香外，難免趁此機會到西湖四處遊覽觀光，

<sup>145</sup> 《西湖遊覽志》卷2「孤山三堤勝蹟」記載「斷橋，本名寶祐橋，自唐時呼為斷橋。」，頁9。

<sup>146</sup> 劉勇強：〈晚明「西湖小說」之源流與背景〉，《晚明至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待刊）在此感謝北京大學劉教授特地撥空先將底稿寄與筆者，使筆者在論文方面獲益不少。

<sup>147</sup> [明]張岱：《西湖夢尋》之〈西湖香市〉，頁42。（台北：久博圖書公司，1987年）

於是市集買賣非常熱絡。因為杭州乃水鄉澤國之都，故江南附近城鎮「杭、嘉、湖三府屬各鄉村男女，坐船而來杭州進香。均泊於松木場或上岸自尋下處或歇各寺院房頭或在船中居住，其船何止千數之多。」<sup>148</sup>其中香市的規模以天竺香市為最大，而且較特別的是，香客中會有人抬著大蠟燭，一路上敲鑼打鼓，滿懷虔誠到上天竺觀音殿中點燃，供奉觀音娘娘片刻，之後將蠟燭吹熄，帶回家鄉去。據說是因為「這根觀音享用過得蠟燭，有消災解禍的良效。帶回去供夜間養蠶照明之用，可以保當年蠶絲的好收成。」<sup>149</sup>從上面的民間信仰，可以更深切了解到江南地區為全國著名的絲綢產區，有「絲綢之府」的美譽。因此當地以養蠶紡織的百姓，渴望藉著宗教的力量帶來今年平安豐收。

對於天竺寺觀音的信仰，在西湖小說中時有所見。寫到非本地人的進香，在《歡喜冤家》卷 23〈夢花生媚引鳳鸞交〉有所描述，故事乃賊人夢花生在杭州遇見趕考的王國卿，要求搭其便船回蘇州。且看夢花生如何自圓其說，設計上船：

小可乃吳縣人，因初一日與同伙伴往天竺進香，人多捱擠脫了。一直走到松木場，船多認不出，過了，並不見影。大分等不見我，先自回了。而盤纏、衣被俱在船中，如今身無錢鈔，懇求相公附攜到舍，船錢、飯錢加厚奉還。<sup>150</sup>

王國卿不疑有他，讓夢花生上船，可知往天竺進香的信徒，一定難以估計，故難免離群走失。同樣地，杭州人到天竺進香也是常有的。在《初刻拍案驚奇》卷 24〈鹽官邑老魔魅色 會骸山大士誅邪〉就寫到，當地人仇氏夫妻，年登四十餘，為求子嗣「每年二月十九日，是大士生辰，夫妻兩箇，齋戒虔誠，躬往天

<sup>148</sup> [清] 范祖述：《杭俗遺風》卷 1〈時序類〉，頁 24（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sup>149</sup> 崇理：〈西湖香市〉，《佛教文化》，1999 年第 2 期，頁 20。

<sup>150</sup> 《歡喜冤家》卷 23〈夢花生媚引鳳鸞交〉，頁 800。（北京：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 年）

竺。三步一拜，拜將上去，燒香祈禱。」<sup>151</sup>。之後，仇氏夫妻如願以償得一女，然而女兒正值二八年華時，被會骸山上妖魔擄走，幸好，天竺寺觀音顯靈將妖魔斬除，仇女得以重獲自由。

然而，西湖小說中宗教故事，並不全以嚴肅地宣揚佛法為主。在內容上有時鮮活表現杭州當地人受佛教影響的生活樣貌。就如上述提及天竺寺觀音信仰，又如杭州人特別重視放生，《夢梁錄》就記載「西湖為放生池」<sup>152</sup>。小說中對放生習俗常有提及，如《歡喜冤家》卷 13〈兩房妻暗中雙錯認〉也寫到「四月初八乃佛浴之日，滿城士民皆買一切水族，放于池中，比往日不同」<sup>153</sup>，另外在《西湖二集》卷 8〈壽禪師兩生符宿願〉和《西湖佳話》卷 16〈放生善蹟〉等都可見杭州人對放生習俗歷時已久。這些內容與真實生活互相呼應，使西湖小說在表現出佛教觀念不至於那麼拘泥死板，而顯得可親。

在杭州，佛道「二教之中，莫盛於釋，故老氏之廬，十不及一。」<sup>154</sup>。雖然道教興盛雖不及佛教，但是對於當地人生活也有一定的影響。較特別的是，在《西湖二集》卷 30〈馬神仙騎龍昇天〉和《歡喜冤家》卷 18〈王有道疑心棄妻子〉這兩篇中，不約而同彰顯出〈太上感應篇〉的重要。例如後者是寫一位書生和一位少婦為了避雨巧遇於西湖郊外，雖然兩人行為端正，未有差池。但是那位少婦仍被丈夫所遺棄。後來得神明之助，書生金榜題名，誤會也因而澄清。本篇是極生活化的取材，主要強調書生因閱讀〈太上感應篇〉，故能自我約束，才能得有善報。而〈馬神仙騎龍昇天〉中，主人翁馬自然也反覆叮嚀「人不可不看〈太上感應篇〉」<sup>155</sup>外。另外提到杭州多火災，因此道教傳有「辟火三方」，來遏止災

<sup>151</sup> 《初刻拍案驚奇》卷 24〈鹽官邑老魔魅色 會稽山大士誅邪〉，頁 268-279。（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1 年）

<sup>152</sup> 《夢梁錄》卷 12「西湖」條，頁 230。

<sup>153</sup> 《歡喜冤家》第 13〈兩房妻暗中雙錯認〉，頁 626。

<sup>154</sup> 《夢梁錄》卷 15「城內外諸宮觀」條，頁 256。

<sup>155</sup> 《西湖二集》卷 30〈馬神仙騎龍昇天〉，頁 633；另外〈太上感應篇〉主要內容抄襲自《抱朴

情發生。這些內容都自然地呈現杭州百姓受道教薰染的生活面貌。

佛、道教在教化人心時，有一個共同和重要的觀念就是「因果報應」。因此為善必有善報；為惡必有惡報。小說藉著宗教力量的制約，達到勸善懲惡的目的。讓人對行善提供了誘因，期待現世或來世的善報。相反地，讓意圖為惡之人，心生畏懼而停止。宣揚出今生的善惡，可以影響和決定自己或是子孫的貧富榮辱。這樣因果報應思想，在小說中是常見的。在《西湖二集》卷 4 < 愚郡守玉殿生春 > 主角趙雄因為收痊遺骸、敬惜字紙，故得中舉、官至宰相的善報。同書卷 23 < 救金鯉海龍王報德 > 主角楊維禎，因為放生龍子所化的金鯉，後來得龍女服侍、高壽善終的善報。以因果報應為主的作品，實在數量繁多，就無法盡列舉出來。

然而要履行這因果報應，敘述時空上可能出現輪迴轉世現象。如《西湖二集》卷 16 < 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 >，就寫宋代杭州才女朱淑貞<sup>156</sup>的故事，敘及她前世為負心漢，今世投胎故為薄命佳人。作者將她坎坷不幸的一生，試圖用宗教因果觀來合理化。另外，同書卷 24 < 認回祿東嶽帝種鬚 > 主角周必大，因為有次失火他及鄰人共五十餘人被拘禁獄中，後來他為了解救大家囹圄之災，認罪其火源來自他家，因此失官。幾年後再去應考，得神人相助，果然高中。後來為相二十年、高壽善終。其實「杭州多火，宋時已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小說也間接反映出杭州百姓蒙受火災的苦難。從以上作品看來，發生宗教報應之說，成功地與當地人物和事件融合，使故事的地域性更為濃厚。

---

子》內篇卷三 < 對俗 > 與卷六 < 微旨 > 兩篇，以通俗的文字加以整理貫穿而成，重視積功累德的因果報應。其編纂的作者來自民間，難以考證。 < 太上感應篇 > 以宣揚善惡報應思想為主旨，此書開宗明義第一句即為：「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善惡之報，如影隨行」結尾語為：「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後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後必降之禍。」於此可窺見此書之梗概。

<sup>156</sup>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卷三 < 宋代 > 之《斷腸集二卷》有載：「朱淑貞，錢塘女子，自號幽棲居士，嫁為是市井民妻，不得志以沒。宛陵魏端禮輯其詩為斷腸集，即此本也。其詩淺弱不脫閨閣之習，世以淪落哀之，故得傳於後。」，頁 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在上一節中，曾寫到明代于謙為西湖正氣所生，強調出此地乃神聖之地，靈氣匯聚。但是西湖並非只誕生英雄人物，在小說中也常見該地被作者選為妖怪產生之場所，之後危害世間的作品。如《二刻醒世恆言》卷 5〈栖霞嶺鐵檜成精〉，故事寫岳飛墳前所跪的秦檜、万俟卨的鐵像「受了日精月華，遁來地府。」<sup>157</sup>繼續為非作歹的故事。當然從內容中，作者除了表達西湖之山水靈秀外，對於南宋第一大奸臣秦檜的憤怒更是溢于言表，他生前作惡多端、陷害忠良。故事繼續敷衍他死後，惡性不改，陷害陸秀夫、文天祥等忠義烈士。最後被岳飛「率領陰兵，將銅鞭連肩帶腦擊碎其半，於是檜、卨之魂永世不得再為之祟矣！」<sup>158</sup>。故事結尾讓岳飛有機會為自己復仇，讓讀者大快人心，莫不稱好。

同樣地，又有〈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青青，她原是「西湖內第三橋下潭內千年成氣的青魚。<sup>159</sup>」因為吸取西湖的靈氣而幻化成人形，與白娘子結伴到人間。又如《清平山堂話本》卷 3〈西湖三塔記〉，內容主人翁奚宣贊被三個妖怪纏身不放的故事，最後三妖被真人收服。故作者在篇末結尾詩總結道「只因湖內生三怪，至使真人到此間。今日抓來藏篋內，萬年千載得平安。」<sup>160</sup>不管故事如何發展，這些危害世間的妖怪，難逃因果報應的懲治。

閱讀話本小說所表達宗教思想，除了「因果報應」之說外，「命運天註定」的觀念也是不可忽略。它主要強調命運的力量是不可改變，因此每個人的貴賤、禍福冥冥之間都已經注定了。就如俗語所言「世上萬般都是命，果然半點不由人。」尤其以〈巧書生金鑾失對〉和《警世通言》卷 6〈俞仲舉題詩遇上皇〉、卷 7〈

---

<sup>157</sup> 《二刻醒世恆言》卷 5〈栖霞嶺鐵檜成精〉，頁 145。《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不詳）

<sup>158</sup> 《二刻醒世恆言》卷 5〈栖霞嶺鐵檜成精〉，頁 150。

<sup>159</sup> 《警世通言》第 28 卷〈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頁 444。

<sup>160</sup> 《清平山堂話本》第 3 卷〈西湖三塔記〉，頁 19。（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陳可常端陽仙化>這幾篇故事為例，內容中強烈地流露出這樣命運觀，同時與當地的文士題詩風俗，巧妙地結合。〈巧書生金鑾失對〉中主人翁甄龍友來到杭州，「凡庵觀院宇，無不遊覽，以暢胸中之氣。有興的時候，便提起筆來，或詩詞贊頌，提於壁子之上。」<sup>161</sup>後來孝宗皇帝到寺廟進香時，便看到他的題詩，特別召見他，沒想到滿腹文才在皇帝面前完全施展不出，同啞巴一般。印證算命先生所言，其飛黃騰達之時未到；再者〈俞仲舉題詩遇上皇〉中主人公俞仲舉雖金榜無名，失望之餘題詩於茶肆，被太上皇所見，大為賞識，授其成都府太守，得以衣錦還鄉。最後〈陳可常端陽仙化〉主角陳可常原是秀才，後來到靈隱寺出家。剛好郡王到寺廟燒香，看到壁上其所題之詩，非常賞識。之後常邀他到府中做客。沒想到陳可常被人誣陷與侍女通奸。後來冤枉得以澄清，陳可常也坐化而去，原來陳可常是羅漢轉世，今生之劫難皆是定數。

---

<sup>161</sup> 《西湖二集》第3卷〈巧書生金鑾失對〉，頁66。

### 第三節 地理環境對愛情故事發展

在小說題材中，愛情故事歷來為一枝獨秀，長久來為世間男女所歌詠傳誦著。西湖小說也不例外，不乏才子佳人的故事。有未婚男友對愛情的追求，也有夫妻間情義的探討。故事中角色不設限為人與人的關係，跳脫既定的「人與人」藩籬，也包括人與鬼怪、狐、仙等異類的愛戀。然而本節主要針對環境對西湖小說中愛情故事發展影響。因「環境乃構成人物活動的客體和關係，它是故事結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sup>162</sup>。所謂環境並非指單向的固定空間，它是一個時空綜合體，乃隨著情節的發展、人物的活動等所構成。因此環境的探討，不僅包括空間因素，也需包含時間因素。

#### 一．預設場景

構成小說的整體環境，總是有幾個或許多個場景所組合而成。所謂場景，指「一個具體的空間裏持續進行著的事件，場景是由人物的行動和人物對話構成的，它很像戲劇的一幕。」<sup>163</sup>特定的場景，在小說情節發展有一定的功用。主要是為人物的活動提供一個適合的環境，讓情節得以順利開展。就西湖小說而言，無庸置疑是以西湖為中心去發展。湖上熱鬧繁華自然吸引了許多當地人或是外地人的賞玩、駐足。因此間接地增加了男女邂逅的機會，進一步產生愛戀。在小說中，作者有意識安排男主人翁去西湖遊玩，某種程度上是抱持能與佳人相遇的幻想。如〈邢君瑞五載幽期〉中就寫到「邢君瑞在蘇堤上挨來擠去，眉梢眼低，不

---

<sup>162</sup> 胡亞敏：《敘事學》，頁 158。（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

<sup>163</sup> 石昌渝：《小說》，頁 90。（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年）

知看了多少好婦人女子」<sup>164</sup>。明白地，將男主人翁在西湖上遊玩的目的顯露出來。

另外，西湖名篇〈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開頭處作者即聲稱「俺今日且說一個俊俏後生，只因遊翫西湖，遇著兩個婦人，直惹得幾處州城，鬧動了花街柳巷。」<sup>165</sup>。其中以〈孔淑芳雙魚扇墜傳〉中將主人翁徐景春夢想成真的際遇，寫得最為生動具體：

素聞〔西湖〕山明水秀，乃告其父母，欲往觀看。遂吩咐琴童，肩挑酒壘，出到湧金門外，遊於南北兩山、西湖之上，諸刹寺院，石屋之洞，冷泉之亭，隨行隨觀，崎嶇險峻，幽澗深林，懸崖絕壁，足跡殆將遍焉。……徐生忽然見一美人，娉婷先行，侍女隨後，其女雲鬟綠鬢，綽約多姿，體態妖嬈，望之若神女。……徐生觀之神魂飄蕩，嘆賞人間罕有、世上無雙，美人亦眉目留情，依依不捨。<sup>166</sup>

然而男主人翁所遇的美麗佳人，並非全是凡人。如〈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孔淑芳雙魚扇墜傳〉、〈西湖三塔記〉<sup>167</sup>等，皆是鬼妖之輩，原本平順生活頓時起了改變，之後遭逢的許多危機，最後都得高僧道士相助解除。〈斷橋情跡〉中姑蘇士人文士高，同樣是「因慕西湖佳麗，來到杭州。」<sup>168</sup>，之後，整日到西湖遊玩，最後如願以償在斷橋遇到佳人劉秀英。但是在西湖小說作品中，還是〈邢君瑞五載幽期〉中徐景春最為幸運，遇到是「水仙」，兩人訂下五年期約，期滿共赴仙界。西湖這絕佳的自然景觀，成為小說提供男女相遇最適合場所。促使來此遊玩的男主人公，總是有份期待能與佳人巧遇的心理。

<sup>164</sup> 《西湖二集》卷 14 〈邢君瑞五載幽期〉，頁 302。

<sup>165</sup> 《警世通言》第 28 卷〈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頁 421。

<sup>166</sup> 《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中〈孔淑芳雙魚扇墜傳〉，頁 126-129。《古本小說集成》：（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年）

<sup>167</sup> 該回男主人翁雖遊於西湖之上，遇見妖怪所化的三位佳人。但內容不涉及於男友情愛，而是強調宗教報應觀念，後來三怪被真人所伏，因此將該回歸於「宗教類」。

<sup>168</sup> 《西湖佳話》卷 11 〈斷橋情蹟〉，頁 211。

最後，要討論是《萬錦情林》之〈裴秀娘夜遊西湖記〉和《西湖佳話》之〈西冷韻蹟〉這兩個作品。前者是敘述裴秀娘夜遊西湖時，見到美男子劉澄一見鍾情的故事。後者是描寫南齊名妓蘇小小常乘油壁車遊西湖，有一次遇見當朝相公之子阮郁，兩人相戀至分手的故事及後來她慧眼識英雄贈金給窮書生鮑仁，果然鮑仁科舉高中，可是當他回來感謝蘇小小時，她就已經先辭世而別。有關蘇小小哀怨淒美的故事，在當地一直盛傳著，晚唐詩人李賀（西元 790-816 年）就曾寫〈蘇小小墓〉一詩，來哀悼紀念她。詩的內容是：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花不堪剪。

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佩。油壁車，夕相待。

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sup>169</sup>

綜觀這兩卷故事都以性別易位敘事角度去描寫，有別於傳統以男性角度去書寫。尤其是〈裴秀娘夜遊西湖記〉更為可貴，因為〈西冷韻蹟〉中蘇小小風流逸事長久在當地流傳著，甚至當地百姓為了紀念她，西湖畔建有「慕才亭」。所以小說以蘇小小為敘事主角去書寫，乃自然而然；然而裴秀娘乃故事中虛構人物，作者（余象斗）能突破傳統用女性角度去書寫，可謂難得。雖然該卷故事，並非完全是作者獨具匠心憑空創作出來，本事出自於「《醉翁談錄》傳奇類著錄有〈夜遊湖〉一目」<sup>170</sup>。但是作者藉著小說的書寫，表達出對女性追求愛情的渴望，明顯地站在同情與肯定的立場。

## 二．節日習俗應用

---

<sup>169</sup> 《西湖詩詞》，頁 23。（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年）

<sup>170</sup>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頁 328。

西湖小說中愛情故事，有相當卷回是融合著杭州當地的習俗。尤其是作者將故事有意識地安排於特定的節日，其中包含著深層的意涵。就如學者楊義認為「節日視為人類與天地鬼神相對話，與神話、傳說、信仰、娛樂相交織的時間紐節。」<sup>171</sup>杭州在特定節日的到來，自然會有當地特殊的風俗、活動，因此無形地製造未曾謀面的男女，相遇至相戀的機會。其中以清明節為最好時機，因為正值春意盎然，萬物甦醒。未婚男女心裡對愛情更加深一份期待、憧憬。而清明節家家戶戶出城掃墓，是杭州當地特殊的習俗。在《武林舊事》、《夢梁錄》中都有對清明節盛況，做具體的描述，如下：

官員士庶，俱出郊省墳，以盡思時之敬。車馬往來繁盛，填塞都門。宴于郊者，則就名園芳圃，其花異木之處；宴于湖者，則綵舟畫舫，款款撐駕，隨處行樂。此日又有龍舟可觀，都人不論貧富，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雖東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滯酒貪歡，不覺日晚。紅霞映水，月挂柳梢，歌韻情圓，樂聲嘹亮，此時尚猶未絕。男跨雕鞍，女乘花轎，次第入城。<sup>172</sup>

這一日的盛況空前，連東京金明池<sup>173</sup>都未必如此，那其他城市更望塵莫及。難怪吸引了〈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白娘子和〈邢君瑞五載幽期〉中仙女，都選這一天到西湖遊玩，而惹出一段故事。清明節除了掃墓踏青外，另外有個傳統風俗「都城人家，皆插柳滿簷，雖小坊幽曲，亦青青可愛。」<sup>174</sup>，這樣的描述，也見於〈邢君瑞五載幽期〉，同卷中又收錄杭州的俗語，如「清明不戴柳，紅顏成

<sup>171</sup> 楊義：《中國敘事學》卷2〈時間篇〉，頁169-17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sup>172</sup> 《夢梁錄》卷2「清明節」條，頁148。

<sup>173</sup> 東京（汴京）清明節，當地有遊於金明池的習俗。可見於《警世通言》卷三十〈金明池吳清逢愛愛〉，頁459-471。

<sup>174</sup> 《武林舊事》卷3「祭掃」條，頁378。

皓首」等，更突出小說的地域性。

另外〈裴秀娘夜遊西湖記〉中男女主人翁的相遇，作者也安排在清明節這一日。之後，故事繼續延宕至夕七夕到來。這一天，據民間傳說是牛郎織女一年惟一相會日，這節日蘊藏著男女悲歡離合的內涵。當地婦人女子「至夜對月穿鍼，餽釘杯盤，飲酒為樂，為之『乞巧』。」<sup>175</sup>裴秀娘也不例外，到花園「乞巧」外，心中更思念清明節時一見鍾情的美男子。因此害了相思病，一病不起，幸好被裴母發現女兒心事，為了救活女兒一命，因而決定招贅劉澄。〈裴秀娘夜遊西湖記〉在時間上以清明節為故事開端，至七夕為故事轉折處。節日的運用，成功地與情節發展扣住。將人物的心理、情緒更鮮明呈現出來。

杭州除了清明節外，同樣元宵節也是萬人空巷的盛況。在《西湖二集》卷12〈吹鳳簫女誘東牆〉就記載到「西湖之上，無景不妙，若到燈節，更覺繁華，天街酒肆，羅列非常，三橋等處，客邸最盛，燈火簫鼓，日盛一日。婦女羅綺如雲，都帶珠翠鬧蛾……。」這樣熱鬧節日，不免吸引外地人也趕來赴此盛會。有如《古今小說》中〈張舜美燈霄得麗女〉<sup>176</sup>男主人公張舜美也是在賞燈遇到佳人，因此展開一段不尋常的愛情故事。

接著，時間來到中秋前後，在杭州因為擁有特殊地理環境，錢江潮自古蔚為天下奇觀「每歲於八月內，潮怒勝於常時，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觀者，至十六、八日傾城而出，車馬紛紛，十八日最為繁盛。」<sup>177</sup>。在《西湖二集》卷1〈宋高宗偏安耽逸豫〉中對觀潮也有十分精采描述。然而現在要討論的是《警世通言》卷23〈樂小舍拼生覓偶〉，描寫男主人公樂和自小對順娘愛慕已久，因為門戶

<sup>175</sup> 《武林舊事》卷3「乞巧」條，頁380。

<sup>176</sup> 該卷與《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中〈張生彩鸞燈傳〉內容大致相同，只是文字有所潤飾。

<sup>177</sup> 《夢梁錄》卷4「觀潮」條，頁162。

懸殊，不能順利結合。直到八月十八日觀潮時，故事發生重大轉變，如下：

那潮頭比往年更大，直打到岸上高處，掀翻錦幕，衝倒蓆棚，眾人發聲喊，都退後走。順娘出神在小舍人（樂和）身上，一時著忙不知高低，反向前幾步，腳兒把滑不住，溜的滾入波浪之中。……樂和乖覺，約莫潮來，便移身立於高阜去處。心中不捨得順娘，看定蓆棚，高叫『避水！』忽見順娘跌在江裏去了。這驚非小，說時遲，那時快，就順娘跌下去這一刻，樂和的眼光緊隨著小娘子下水，腳步自然留不住，撲通的向水一跳，也隨波而滾。他哪裡會水，只是為情所使，不顧性命。<sup>178</sup>

當然，故事以喜劇收尾，樂和順娘終於有情人終成眷屬。難得的是，這一篇故事巧妙地融入杭州觀潮的習俗，讓故事發展就如錢塘江潮頭，令人驚心動魄。這習俗當然也蘊藏著豐富的文化代碼。學者劉勇強先生曾對該篇故事評論道「所謂江潮風波，既是寫實，又是象徵，它代表這一對熱戀中的情人所面對的難以克服的障礙和他們至死不渝的愛情。」<sup>179</sup>另外，值得一提是，故事中也寫到當地神祇信仰 - 潮神<sup>180</sup>，當未婚男女祈禱良緣，必走一趟潮王廟。婚後，夫妻再同來燒香感謝，這是其他城市所未見的風俗習慣。

### 三．集中時間刻度

在敘事時間方面，可分為外部時間與內部時間，前者指的是情節之外專門標

---

<sup>178</sup> 《警世通言》卷 23 <樂小舍拚死覓偶>，頁 335。

<sup>179</sup> 劉勇強：〈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刊於《文學遺產》中華書局出版，2001年 第五期，頁 71。

<sup>180</sup> 相傳為伍子胥屢諫吳王夫差，不要輕視越國的復仇計劃，夫差不聽，後來伍子胥自殺。當地盛傳錢塘江潮為其魂魄在發怒。關於這個傳說在邢昉〈錢塘潮〉詩中有云：「曉色千檣發，危濤萬馬奔。豈知此澎湃，中有子胥魂。」



記的時間。它雖然不直接進入情節，卻是情節發展的基礎。外部時間它常出現的模式是「話說 年間」，或說「話說 朝」，它雖然與情節沒有直接的關聯，可是其重要性是不可輕忽的。因為外部時間乃「是情節與使之得以產生、發展的廣闊無邊的現實生活之間的通道或橋樑。它不直接進入情節，卻是情節的土壤。」<sup>181</sup>同時讀者可以從作品中去檢驗，作者設定的外部時間是否與故事時代背景相符。閱讀西湖小說作品，發現相當大比率設定時間刻度發生在南宋，共四十五篇愛情類故事就有二十篇的比率，約有 44 % 之高。

西湖小說作者將故事朝代設定為南宋，主要是符合歷史的記載。當時金兵南下，高宗「駐蹕杭州，改為臨安府……，百姓從高宗南渡者，不計其數，皆散處吳下。聞臨安建都，多有搬到杭州入籍安插。」<sup>182</sup>這樣一來，原本人口不多的吳越古都，迅速地繁榮起來，人口激增，有隨宋室南遷的貴族，如〈吹鳳簫女誘東牆〉中女主人翁黃杏春一家；也有逃難的平民百姓，如〈賣油郎獨占花魁〉莘瑤琴一家。

除了外地人的定居外，杭州也有相當可觀的流動人口。有的是赴京趕考的讀書人，如《西湖老人繁勝錄》所載「諸路士人比尋常十倍，有十萬人納卷……每士到京，須帶一僕，十萬人試，則有十萬人僕，計二十萬人。」<sup>183</sup>，有的是來自全國各地商賈，來此買賣做生意。另外，還有來自附近城鎮的香客，尤其農曆二、三月，會到杭州名剎朝拜、進香，趕赴「西湖香市」。所以，杭州在南宋成為全國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

作者們將南宋設定為獨特的時間刻度，在敘事學上觀點而言，其實已將顯現

---

<sup>181</sup>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頁 59。

<sup>182</sup> 《古今小說》卷 17〈單符郎全州佳偶〉，頁 247。

<sup>183</sup> 《西湖老人繁勝錄》之「混補年」條，頁 117。

時間人文化情形。

敘事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把自然時間人文化的過程。時間依然可以辨認出某些刻度的，但刻度在敘事者的設置和操作中，已經和廣泛的人文現象發生聯繫，已經輸入各種具有人文意義的密碼。<sup>184</sup>

作家們在創作的時候，幾乎都是從自己最為熟悉的環境著手，這樣才能具體、生動的描寫，使作品具有說服力，令讀者信服。小說家最熟悉的環境，莫過於故鄉，或是居住的地方。耳目所及，皆能取材。故西湖小說作家大部分都是杭州當地人，或是曾經寓居、遊玩的文人。因此杭州對他們而言，具有一份濃厚的感情。而南宋這個時期，對杭州而言是歷史性的黃金時期，相對地影響到文人心理，蘊藏著對那段歲月的憧憬和嚮往。

時間刻度加以人文化時，其人文化現象本身常常帶有時代性和地方性。上面談及小說以南宋為敘事時間刻度，就代表著時代性。而風俗習尚就容易顯露出作品的地方性。杭州風俗「疇昔侈靡之習，至今不改也。」<sup>185</sup>又加上受宮廷貴族紙醉金迷奢侈生活的影響，市民更重視物質享樂。因此茶坊酒肆林立，當人們酒足飯飽後，難免會尋歡問柳。在《武林舊事》卷6中清楚地交代當時臨安城妓女盛況：

每樓各分小閣十餘，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每處各有私名妓數十輩，巧笑爭妍。夏月茉莉盈頭，春滿綺陌。憑欄招邀，謂之『賣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座』。……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風雨暑雪，不少減也。<sup>186</sup>

<sup>184</sup> 楊義：《中國敘事學》卷2〈時間篇〉，頁169-17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sup>185</sup> 《夢梁錄》卷1「正月」條，頁139。

<sup>186</sup>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6「酒樓歌館」條，頁442-443。

#### 四．人物身分

西湖小說中婚戀題材故事大部份將敘述時間限定為南宋，而且男女主人公身分，以文士和妓女身份為最多。在故事情節發展上，相似性也很強。如《西湖二集》卷 11〈寄梅花鬼鬧西閣〉、卷 20〈巧妓佐夫成名〉和《初刻拍案驚奇》卷 25〈趙司戶千里遺音 蘇小娟一詩正果〉等。這三卷故事，都是名妓看上男主人翁的才學不俗，於是資助他日用花費。讓男主人翁無後顧之憂，因而順利考上功名，踏上官途。然而〈巧妓佐夫成名〉是較特殊的，描述名妓曹妙哥利用官場陋習，花錢為吳爾知買官，內容具有強烈的諷刺性。

在情節發展上，《古今小說》卷 17〈單符郎全州佳偶〉卻與上面三卷不同，妓女楊玉反而是遇到文士單飛英，坎坷苦難的際遇終告結束。故事主要描述楊家與單家訂有婚約，卻遭逢靖康之難，兩家失散，楊玉流落為妓女。後來單飛英在任官時，巧遇楊玉得知她便是自己未曾謀面的未婚妻。於是設法為她脫籍，兩人終於有情人終成眷屬。

同樣地，故事都以文人與妓女組合者，但是主人公乃過去真實的歷史人物。分別是《六十家小說》卷 1〈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古今小說》卷 12〈眾名姬春風弔柳七〉、《熊龍峰四種小說》卷 3〈蘇長公章臺柳傳〉、《西湖佳話》卷 6〈西泠韻蹟〉等四卷。〈眾名姬春風弔柳七〉乃馮夢龍改編自〈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故事，可是情節上卻大相逕庭，賦予故事新的生命力。在〈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將風流才子柳耆卿（柳永）描寫為要得到名妓周月仙，竟然不擇手段的卑鄙小人。相反地，「馮夢龍改編下的柳耆卿，已經不是用計逼姦的下流人，

而是知情識趣、玉成才子佳人美事的地方官，足為風流名士典型。」<sup>187</sup>另外，〈蘇長公章臺柳傳〉與〈西泠韻蹟〉這二回故事，分別描述蘇東坡與蘇小小的風流軼事，在上一節已有提到。

西湖小說中描述妓女的情愛，尚有《古今小說》卷3〈新橋市韓五賣春情〉、《醒世恆言》卷3〈賣油郎獨占花魁〉、《歡喜冤家》卷15〈馬玉貞汲水遇情郎〉等作品。雖然男主人翁不再設定為文人才士，卻有別固定的敘事模式，給與讀者新鮮的閱讀感受和省思。〈馬玉貞汲水遇情郎〉中寫馬玉貞背叛丈夫與情人逃至杭州，為了生計竟賣淫為生，後來被官府查獲，後悔莫及，決定改頭換面與丈夫重修舊好；而〈賣油郎獨占花魁〉是話本小說的名篇，名妓瑤琴終於被販油的秦重所感動，決定將一生託付於他。作品跳脫落難公子與妓女的俗套，強調出女性意識自覺，在選擇對象時，其身份地位不再是最優先考量，而是男主人公是否真心相待、憐香惜玉。

重新回到「失意文人巧遇西湖名妓」的敘事模式，作者們不免在正文之前用一大段文字將「臨安城繁榮光景表白一回」<sup>188</sup>，主要強調出當時杭州熱鬧非凡，如〈巧妓佐夫成名〉寫到「高宗自南渡而來，粧點得西湖如花似錦，因帝王在此建都，四方商賈無不輻輳，一時瓦子勾欄之盛，殆不可言。」<sup>189</sup>從小說書寫，看到外面世界如同人間天堂，然而男主翁內心卻是失意苦悶，形成強烈對比。這些失意文人「自恃才高，務要登第。」<sup>190</sup>卻與現實生活相違。於是來到妓院中宣洩煩悶情緒，沒想到獲得女主公的青睞。從此生活得以改善，情感找到依歸。彷彿來到人世間的桃花源，暫時忘記現實的殘酷。

---

<sup>187</sup> 胡萬川：《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頁164。

<sup>188</sup> 《西湖二集》卷11〈寄梅花鬼鬧西閣〉，頁231。

<sup>189</sup> 《西湖二集》卷20〈巧妓佐夫成名〉，頁425。

<sup>190</sup> 《初刻拍案驚奇》卷25〈趙司戶千里遺音 蘇小娟一詩正果〉，頁282。

從上所論，作者在字裏行間透露出西湖的妓女，如同蘇小小，頗能識「英雄」，男主翁無不金榜題名，也不負妓女的情義，娶為妻妾。甚至〈趙司戶千里遺音 蘇小娟一詩正果〉趙不敏高中赴任襄陽，未能如願娶到錢塘名妓蘇眇奴，因而相思而死。另外，〈寄梅花鬼鬧西閣〉故事結尾頗為新奇，原本描述讀書人朱廷之來到臨安趕考，結識名妓馬瓊瓊，平日得她資助，果然順利登第。然而朱廷之家中卻有妒婦，不能相容。經親人調解及現實經濟考量，不得接受馬瓊瓊。後來朱廷之單獨赴任遠地。夜晚忽見馬瓊瓊陰魂來哭訴，以為瓊瓊被妒妻逼死。連忙做法事超度之。回家後見妻與瓊瓊皆安然無恙，方悟為野鬼假冒馬瓊瓊以騙取佛事得以超渡。這樣故事，敘事視角從家庭妻妾之爭轉換到佛教生死輪迴的儀式。作品除了增添不可思議的趣味性，也浸染上佛教的宗教意味。

## 第四章。「西湖小說」之藝術技巧探析

### 第一節 演進軌跡：從承襲到超越

- 一． 創作動機
- 二． 入話與正話
- 三． 敘事方式
- 四． 詩詞運用

### 第二節 風土人情：市民生活的社會圖卷

- 六． 人物形象
- 七． 方言俚語
- 八． 風俗習尚

### 第三節 故事情節：化平淡為神奇

- 一． 以奇為美的藝術觀
- 二． 巧合手法
- 三． 真實性

### 第一節 演進軌跡：從承襲到超越

話本是以民間技藝「說話」基礎上發展起來。追溯最早時間，發現敦煌遺書中，已經有初具話本小說雛形的作品；到宋、元時，話本小說的體制才定型；明

中葉後因商業發展和印刷術的進步，提供小說蓬勃發展的條件，促使文人模擬話本形式投入創作，開創話本小說的頂峰；清康熙後，話本漸漸步入衰微，已經沒有引人注目的作品出現<sup>191</sup>。話本小說雖然歷經時間的洗禮，自始自終依舊保留著口頭文學表達方式特徵，但是在其敘述方式、內容思想也隨著作者或是時代而有所改變。值得注意的是，上至宋元話本，下至明末清初都有以西湖為題材的話本小說存在。筆者試圖從話本小說整體的發展演變，探討西湖小說對話本小說從繼承到超越。

## 一．創作動機

綜觀西湖小說的作家，投入創作的動機，大致上可分為四種因素，第一為社會教化，其二是市場需求，第三為揭露社會黑暗面，最後是地域意識抬頭。以下將分別討論：

### （一）社會教化

話本原本是「說話人」的底本，單純為提供市民娛樂的敘事文學，然而當明清文人大量投身話本小說創作後，其敘述方式、內容思想都隨之豐富成熟。尤其話本小說為受到大眾的喜愛，其社會功用同時也受到重視。從話本小說集大成馮夢龍「三言」的取名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就不難想像，他藉著小說來宣揚倫理道德，教化讀者。馮氏在《醒世恆言》序中更進一步寫到：

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尚理或病于艱深，修詞或傷于藻繪，

---

<sup>191</sup> 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中將話本小說的發展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1）萌生期-唐（2）興盛期-宋、元（3）繁榮期-明天啟到清康熙（4）衰弱期-清雍正乾隆以後，頁 21-25（武漢：武漢出版社，1994 年）

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恆心。此醒世恆言四十種，所以繼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可以取其可以適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

從上可知，馮夢龍認為小說對百姓的接受度較高，因此透過小說的傳播，承擔起警世醒世的社會責任。對於這一點凌濛初也非常認同表示「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sup>192</sup>，因此「二拍」的內容中也不乏道德教訓的意味。之後，馮夢龍在《石點頭》的敘中再次強調「小說家推因及果，勸人作善。」<sup>193</sup>為主要功用。另外近年發現的話本《型世言》，內容所傳達的勸戒世人的意圖更是明顯。全書共洋洋四十回，竟然沒有一篇是歌頌愛情故事的作品。反覆強調「忠、孝、節、義」的傳統美德，要求讀者「以為世型」。相對的，全書共二十四回幾乎全為婚戀、世情題材的《歡喜冤家》，內容充斥色情的描述，該書被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列入「專演猥褻事」類<sup>194</sup>，然而作者也標榜著「愚者讀之，可滌腐腸；稚者讀之，可知世情」<sup>195</sup>的社會教化功能。

## （二）市場需求

不容否認，市場的需要和現實經濟的壓力，也是話本小說作者投入寫作的最重要因素。因為這些話本小說作家，幾乎都是仕途不順遂的文人。《西湖二集》作者周清原便是「懷才不遇，蹭蹬厄窮」的讀書人，面對現實經濟的壓迫，只好學說話人「手琵琶以求知于世」<sup>196</sup>，從事話本寫作。另外，「二拍」的作者凌濛

---

<sup>192</sup> 《拍案驚奇序》

<sup>193</sup> 《石點頭序》

<sup>194</sup>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稱「《僧尼孽海》、《歡喜冤家》、《一片情》、《載花船》、《弁而釵》、《宜春香質》、《風流悟》等七書『專演猥褻事』」，頁110。

<sup>195</sup> 《歡喜冤家》

<sup>196</sup> 《西湖二集》



初是見「三言」在市場反應熱烈「肆中人見其行世頗捷，意余當別有秘本圖出而衡之」<sup>197</sup>，於是也從事寫作話本行列，但是有鑑於以前題材被馮夢龍搜括殆盡，轉而作者獨立創作，因此在「二拍」的作品中，幾乎見不到宋元舊本的痕跡，對於這一點，凌氏的巨匠用心是值得肯定的。

雖然，馮夢龍的「三言」中，可見宋元話本的舊作，但是馮氏並非一味抄襲，反而用心改造，賦予舊作新的生命。首先他將回目異名，將僵硬沒生氣的題目，改為以故事內容為題，如〈錯斬崔寧〉改為〈十五貫戲言成巧禍〉、〈錯認屍〉改為〈喬彥杰一妾破家〉等，使卷題更能扣住故事的情節。另外又將舊作的文句加以潤澤，刪減不必要贅言，使故事進行更為順暢。如《六十家小說》卷 18〈錯認屍〉結尾詞寫到「至今風月江湖上，千古漁樵作話傳，屍首不能入棺歸土，這便是貪淫好色下場頭。」<sup>198</sup>馮夢龍就將它刪去，並添加故事情節，將詐財惡棍王青被喬俊附身，跳到西湖而亡。這些修訂使得說話的口頭色彩淡化許多，增加話本小說的書面化和道德教訓意味。

明清交替之際，無疑是小說創作的顛峰期，尤其明末商業經濟的發達，社會奢靡之風盛行，思想、行為更為開放，不願受傳統禮教的約束，追求聲色犬馬的生活。明末文人謝肇淛就明白指出當時娼妓盛行情況「今時娼妓佈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淫為生。」<sup>199</sup>對於這種聲色追求和喜愛，也反映在小說內容上。因此《十二樓》作者李漁痛心疾首的表示「蓋自說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猥褻鄙靡，無所不至。」<sup>200</sup>。總而言之，小說市場的需求和取向，不但會促使文人投入寫作，也會影響到小說內容的風格。

---

<sup>197</sup> 《拍案驚奇》

<sup>198</sup> 《清平山堂話本》之〈錯認屍〉頁 128。

<sup>199</sup>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之八〈人部四〉，頁 15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

<sup>200</sup> [清]李漁：《十二樓序》（北京 1986 年）

### （三）揭露社會黑暗面

明清文人書寫的話本小說與早期宋元話本比較，作者意圖揭露社會弊端、陋習等黑暗面，是較尖銳大膽的，反映出文人自我意識不斷抬頭。在早期的話本〈錯斬崔寧〉，主要描寫因巧合因緣兩個男女無辜受死的冤案。故事中作者只現身說了這樣一段話：

看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害命的時節，他倆人須連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鄰舍人家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卻被人抓住了？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塗，只圖了事，不相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這樣一段話，作者只是暗諷官府的腐敗無能，導致草菅人命的悲劇，說話的口氣還相當保留。然而到了明清，大部分話本小說的作者，彷彿是個直言無懼的勇士，將耳目所及的社會弊端，如科舉舞弊、官府腐敗、治安敗壞、娼妓問題等都寫進去故事中。在《石點頭》卷 10〈王孺人離合團魚夢〉作者揭露杭州惡棍拐賣良家婦女的事情。同書卷 7〈感恩鬼三古傳題旨〉，也深刻揭露科場買關節舞弊的情事。

《型世言》卷 26〈吳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雪裏手〉也細膩寫出惡棍為了錢財，設計出萬無一失的婚姻詐騙案。這些都反映出社會的弊端叢生，世風的敗壞。除了將真實生活的黑暗面，表現在話本小說中外，作者更勇敢站出來，無情、尖銳痛斥這些社會亂象的根源。又有《西湖二集》卷 18〈商文毅決勝擒滿四〉寫到「衙門中的人都要揉曲作直，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上瞞官府，下欺百

姓。筆尖上活出活入，那錢財便就源源而來。」<sup>201</sup>作者周清原氣憤指出衙門見錢辦事的腐敗事實。同書中〈祖統制顯靈救駕〉作者又借主角之口說出為官可惡之處：

我見做官的人，不過做了幾篇帖括策論，騙了一個黃榜進士，一味只是做害民賊，掘地皮，將這些民脂民膏回來，造高堂大廈，買妖姬每妾，廣置莊園以為姬妾逸遊之地，收蓄龍陽、戲子、女樂，何曾有一毫為國為民之心？還要詐害地方鄰里，奪人田產，倚勢欺人。這樣的人，豬狗也不值！<sup>202</sup>

周清原認為「黃榜進士」的官人「豬狗也不值」。如此毫不留情的指責，真是令讀者直呼過癮，大快人心。其實作者藉小說揭露社會種種黑暗面的同時，也得以宣洩出自己懷才不遇、悲憤難抑的情緒。這一點，學者鄭振鐸精闢地說出自己見解「明末平話小說，半為勸戒教訓，半亦陷于自泄悲憤的淵阱中，清原此作，正足以見當時平話集的風尚。」<sup>203</sup>從上面比較中，早期宋元話本反映社會腐敗、黑暗面，較為含蓄、保留許多。

#### （四）地域意勢抬頭

明清之際話本出版有很相當大比例，是出自於江、浙一帶。這與該地區具有繁榮、穩定的經濟基礎，有密不可分關係。而西湖小說乃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以創作以西湖或杭州為背景的小說。在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也注意到西湖小說的興盛情況，認為《西湖一集》《西湖二集》《西湖佳話》等書乃「專

<sup>201</sup> 《西湖二集》卷 18〈商文毅決勝擒滿四〉，頁 385。

<sup>202</sup> 《西湖二集》卷 29〈祖統制顯靈救駕〉，頁 606。

<sup>203</sup> 鄭振鐸：《鄭振鐸全集》第四冊〈明清二代的平話集〉，頁 408。（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

演西湖故事」<sup>204</sup>。這些作者們如果不是本地人，至少是寓居或到此遊玩過被西湖美景所感動的文人墨客。所以才能將當地自然景觀、風土民俗，自然、細膩地融入小說當中。

首先，依據筆者所收錄的西湖小說，將作者籍貫與其小說刊行年代完成下表。藉著下面資料檢視西湖小說的作者與杭州這塊土地的關聯，從這一個視角來應證西湖小說的作家其寫作動機與地域意識的不可分割性。

序號	書名	作者 / 刊行	成書年代	籍貫	備註
1	六十家小說	洪楸	明嘉靖年間	浙江杭州	
2	熊龍峰小說四種	熊龍峰 <sup>205</sup>	明萬曆年間	福建建陽	
3	萬錦情林	余象斗 <sup>206</sup>	明萬曆年間	福建建陽	
4	「三言」	馮夢龍	明天啟年間	江蘇長洲	
5	「二拍」	凌濛初	明天啟年間	浙江烏程	
6	型世言	陸人龍	明崇禎年間	浙江杭州	據韓國學者陳慶浩的考證，可知《型世言》為翠娛館主人陸雲龍之弟陸人龍所編寫。

<sup>204</sup>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 108。

<sup>205</sup> 歐陽健等：《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頁 70。有載「熊龍峰，明代刻書家，福建建陽人，生平事蹟不詳。」

<sup>206</sup> 歐陽健等：《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頁 94。有載「余象斗，又名世騰、象鳥，福建建陽人。字仰止、文台、字高、元素，號仰止子、三台山人、三台館主人，為明季著名的通俗小說刊刻者、書坊主人，約活動於嘉靖末至崇禎初年。」

7	石點頭	天然痴叟	明崇禎年間	不詳	胡士瑩先生認為其人應該是席浪仙，與馮夢龍交往密切。
8	西湖二集	周清源	明崇禎年間	浙江杭州	從序中可推論為杭州人，但生平不詳。
9	歡喜冤家	西湖漁隱主人	明崇禎年間	不詳	從署名可推論與杭州西湖有密切相關的人。
10	十二樓	李漁	清順治年間	江蘇揚州	李漁別署湖上笠翁，覺世稗官等。他雖出生於揚州，但曾經長期居住於杭州。
11	西湖佳話	古吳墨浪子	清康熙年間	不詳	從其署名可知他是吳人。但「古吳」不一定單指蘇州。據《中國古今大辭典》記載，吳地包括江蘇的淮、泗至浙江的嘉、湖一帶。同時該書卷 12〈錢塘霸跡〉自言：「此吾過西子湖濱，謁錢王祠而有感焉。」可知作者與杭州有密切相關。
12	二刻醒世恆言	心遠主人	清康熙年間	不詳	心遠主人另著有《十二峰》首有「戊申巧夕西湖寒士序」。推測該書編刊於杭州。
13	五色石	筆煉閣主人	清乾隆年間	不詳	有學者懷疑為江蘇東台人徐述夔。
14	豆棚閑話	聖水艾衲居士	清康熙年間	不詳	美國學者韓南認為艾衲居士即為《濟顛全傳》的作者杭州人王夢吉。而且古稱西湖為「聖水」。

從上表中，可以得知西湖小說的作家們，與杭州沒有任何關聯的有熊龍峰、余象斗、馮夢龍、凌濛初四人；生平不詳者有天然痴叟、筆煉閣主人兩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小說編纂者和刊刻者（書商）有別的，馮氏、凌氏與天然痴叟、筆煉閣主人是小說的編纂者，小說的問世主要歸功於他們的巧思心血。熊龍峰、余象斗兩人乃著名的小說的書商家，眼見市場有需求，有利可圖，於是將出色的作品重新整理成冊，刊印發行見諸於世，嚴格說起來他們並不能算是小說的作家。關於《熊龍峰四種小說》<sup>207</sup>和《萬錦情林》中各卷作品真正作家，已淹沒無聞無法考證其與杭州的關係。

馮夢龍與凌濛初兩人是明代話本小說的集大成者，其著作分別為「三言」和「二拍」更是話本小說的代表作。馮夢龍是江蘇長洲人，江蘇與浙江為相鄰的省份，因此家鄉與杭州相距不遠；凌濛初更是浙江烏程人，而杭州是浙江省會。對於富有山水之勝的杭州想必應該造訪過。現今暫且不論馮氏與凌氏兩人是否遊歷過杭州，但是從學者譚正璧先生考證「三言」的相關資料，不難發現馮氏編纂發生在杭州或浙江的故事，其本事幾乎來自前人雜記或史料。例如《古今小說》卷21〈臨安里錢婆留發跡〉，其本事可見《西湖遊覽志餘》、《七修類稿》或《西湖夢尋》等書<sup>208</sup>。雖然，「三言」並非是馮夢龍將西湖傳說、軼聞收集整理而成專書，但從「三言」中共有25卷關於西湖或杭州的作品，至少可以我們肯定的是馮夢龍對於「西湖小說」的認同；否則他大可不必費心將這些故事重新改編，亦可以置換故事發生的地點，不侷限於西湖或杭州。例如我們能夠想像〈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故事，發生的背景不在杭州而是在蘇州或其他地方，這是不可能的。因此，馮夢龍雖然不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地人，但是對於西湖的傳說軼聞可謂瞭若指掌，並且認同和喜好這些故事背後的歷史記憶。

無法否認，「小說中地域空間的選擇必然受到兩種情況的制約：一是作者本身的生活經驗；一是作品材料的客觀內容。」<sup>209</sup>小說家只能寫自己了解的、熟悉的生活，這對地域空間的選擇也同樣。或者是出於熟知，或者出於偏愛，許多小

---

<sup>207</sup> 歐陽健等：《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頁70。有載「此書收短篇小說四篇，曰《張生彩鸞燈傳》、曰《蘇長公章台柳傳》、《馮伯玉風月相思》、《孔淑芳雙魚墜傳》。……長澤規矩也（日）由原刊版式認為是萬曆時期的俗書。」

<sup>208</sup> 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頁103-1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sup>209</sup>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頁63。

說家都有個自己最得心應手的地域空間。馮夢龍、凌濛初等非杭州人，書寫「西湖小說」無非取決於作品材料的收集與整理。其他「西湖小說」的作家，多半是當地的文人或是長期居住於此的文士。儘管有些作者不知其真實姓名，但是從近代學者的考證，或是書中的序和內容去推測，幾乎都與西湖或杭州有密切的關聯。例如「西湖漁隱主人」、「古吳墨浪子」、「聖水艾衲居士」等。由於他們對這片土地一定有濃厚的感情，激發他的使命感，要將其輝煌的歷史和美麗的湖光山色，宣揚於外，給世人知道。這其中的意涵包括為，作家對鄉土的熱愛與自豪，和過去那些對西湖貢獻有功的能人賢士效法看齊之心理作用。果然，西湖作者的用心，果然沒有白費。如在《西湖二集》湖海士所寫的序中，就寫到：

蘇長公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而使眉目不脩，張敞不畫，亦如葑草之湮塞矣。西湖經長公開濬，而眉目始備，經周子清原之畫，而眉目亦嫵。然則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

從上面這段話，發現作序的湖海士讚譽周清原「西湖之功臣也哉」，已經將他和蘇東坡對西湖之貢獻相提並論，無形中將周清原的地位提高許多。在小說中，也透露出作者這樣的自我期許，如在《西湖二集》卷 23〈救金鯉海龍王報恩〉中曾描寫玉帝下詔書給主人翁楊廉夫，因為其「表彰西湖山水，厥功懋焉」<sup>210</sup>，得以死後，列入仙界。

由於地域意識的抬頭，西湖小說作者對於歷史題材更受重視，尤其是自古當地歷史名人的故事。這樣的情形在西湖專著中更顯而易見。例如《西湖佳話》共十六卷，其中〈白堤政蹟〉、〈六橋才蹟〉、〈靈隱詩蹟〉、〈孤山隱蹟〉、〈岳墳忠蹟〉、〈三台夢蹟〉、〈錢塘霸蹟〉等七篇，幾乎占全書一半的篇幅。如果用心將這七卷故事與地理景觀連貫起來，彷彿構成西湖獨特的風景線。同時，在《西湖二集》中，講演杭州歷史題材有〈吳越王在世索江山〉、〈宋高宗偏安

---

<sup>210</sup> 《西湖二集》卷 23〈就金鯉海龍王報德〉，頁 479。

耽逸豫>等十一卷。從以上故事，不難想像杭州自古以來繁華輝煌的歷史歲月，已深刻烙印在作家心中，藉著小說宣洩思古情懷。

最後，筆者要提的是，由於西湖小說所強調的地域意識。難免作家在行文當中，會忍不住將當地的好處，詳細地鋪陳一番。因此就容易忽略了故事結構的緊湊性。例如在《六十家小說》卷3〈西湖三塔記〉先引蘇軾〈引湖上初晴後雨〉「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溟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也相宜。」<sup>211</sup>一詩為開端，說到西湖好處再吟一詞「江左昔時雄勝，錢塘自古榮華。不惟往日風光，且看西湖景物：有一千頃碧澄澄波漾琉璃，有三十里青娜娜峰巒翡翠……」共用了一千餘字，描寫西湖四季、花木、特產等。對此莊因先生認為該作品「費了很多筆墨（唇舌），把西湖正反上下說遍了，極是累贅。」<sup>212</sup>因此，一味地注重背景的描述，而忽略小說情節的跌宕起伏，會大大削弱小說的可觀性。

## 二． 入話與正話

話本在敘述正文之前，往往有一段「入話」或稱「楔子」<sup>213</sup>，而入話的體制有多種不同。大多為一首或是數首詩詞，也可能是一則小故事，以小故事為入話的又稱做「得勝迴頭」。學者莊因在〈話本中楔子的體裁〉一文，將入話依其體裁細分為四種。第一為在卷首冠以詩句或詞，第二為除去詩文或詞句外，還加上一段閒話。第三為除去詩文或詞句外，再加一則或一則以上的故事。第四既有詩文或詞句外，又有一段閒話，或加一則或以上的故事<sup>214</sup>。然而入話的作用，到底為何？筆者認為以鄭振鐸先生的說法，最為恰當。他認為：

<sup>211</sup> [明]洪楗編：《六十家小說》卷3〈西湖三塔記〉，頁13。（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sup>212</sup> 莊因：《話本楔子彙說》，頁154。（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

<sup>213</sup> 「入話」最主要的是指進入正話（正文）之前的「小故事」。不過，明代洪楗編《清平山堂話本》往往將正話之前的那個部分標為「入話」，有時只是一首詩詞而已。所以，筆者以為「入話」的定義可以採取範圍比較廣的說法，即正話之前的部分，包括詩詞、議論、小故事等。

<sup>214</sup> 莊因：《話本楔子彙說》，頁135。



話本既是說書人的底本，我們就說書先生的實際情形一觀看，便知他不能不預備好一套或短或長的「入話」，以為開場之用。一來是，借此以遷延正文開講的時間，免得後至的聽眾，從中途聽起，摸不著頭腦，再者，「入話」多用詩詞，也許實際上便是用來「彈唱」以肅靜場面，怡娛聽眾的。<sup>215</sup>

話本小說的入話從「說話」的現場需要，演變成文人創作的書面文學需要。使得讀者在正文之前，能夠安撫雜亂、浮躁的情緒，進入沉靜的閱讀樂趣。並且藉著入話來預示故事主題或是營造氣氛，製造懸念等。首先在早期宋元話本中西湖小說，受口頭文學的影響較深，因此入話與正話內容關聯不太，其作用也未能適切明白彰顯出來，後來其入話的功用由聽覺向視覺靠攏，越來越重視小說書面化，讀者的轉變與需求。

現存宋元話本，《六十家小說》卷 1〈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的入話乃是主人翁柳耆卿所題美人詩一首七言律詩，詩句為「誰家柔女勝姮娥，行速香階體態多……萬種風流觀不盡，馬行十步九蹉跎。」<sup>216</sup>從這首入話詩看來，它與正話的關聯僅僅是用詩中「美人」呼應著主人翁柳耆卿到杭州任官時，邂逅一位美貌歌妓而已。接著，同樣是描寫與主人公與妓女在杭州相識的故事，《西湖二集》卷 20〈巧妓佐夫成名〉中的入話，就連說了七個小故事，分別是李師師、柳翠、曹文姬……等七人。主要是說明「妓女之中，人品儘自不同，不可一律而論。」<sup>217</sup>作者在入話如此費心安排，無非為了正話中「巧妓」曹妙哥出場而設計。

---

<sup>215</sup> 鄭振鐸：《鄭振鐸全集》第四卷〈明清二代的平話集〉，頁 338。

<sup>216</sup> 《六十家小說》卷 1〈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頁 1。

<sup>217</sup> 《西湖二集》卷 20〈巧妓佐夫成名〉，頁 420。

然而，並非入話故事越多，其藝術效果越好。應該適可而止，與正話的結合，追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的藝術境界。所以，歐陽代發先生認為〈巧妓佐夫成名〉作品「頭回故事太多，顯得冗長拖沓。還加上繁瑣旁徵博引，也削弱小說的藝術感染力。」<sup>218</sup>

隨著話本小說的發展，作者在構思時越見巧思，顯現出個人獨創意識。就李漁而言，他可說是話本小說最後一位集大成者。他生平有大半的時間，居住在杭州。而且「居杭期間，他完成了擬話本小說集《無聲戲》、《十二樓》的創作，又寫了《憐香伴》、《風箏誤》、《玉搔頭》等戲曲。」<sup>219</sup>他的話本獨具創意和革新，如《十二樓》全書每篇故事都以樓命名。如〈合影樓〉、〈拂雲樓〉……等十二樓，而且每樓為其中一篇故事場景之一，並攸關故事情節發展。這樣的巧思是前所未有。另外，該書的入話，全以詩詞引起議論。而且開頭議論與正話的主題密切相關。之後，不再額外講述一個小故事。

以〈拂雲樓〉為例，正話的故事，主要描寫男主人翁裴七郎在西湖，遇到兩位如花似玉的美女，原來一位是小姐，另一位是其侍女。為了得到小姐的芳心，裴七郎求助其侍女。兩人共同設下計謀，終於贏得美人歸。現在，回頭看該篇入話那首詩，最後的兩句一針見血有云：「不是紅娘通線索，鶯鶯何處覓張生？」<sup>220</sup>之後，李漁繼續批評侍女的刁頑、狡獪，乃閨房宣淫敗壞的一大禍害，不得不提防警覺。正話中，每篇的故事有回目不等，〈拂雲樓〉為例共有六回，這顯然是受到長篇章回小說的影響。

艾衲居士的《豆棚閑話》也流露出強烈的文人氣息。全書共十二則，每則故

---

<sup>218</sup> 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第10章〈明末其他擬話本小說〉，頁302。

<sup>219</sup> 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第11章〈清初擬話本小說代表作家李漁〉頁363。

<sup>220</sup> 《十二樓》卷7〈拂雲樓〉，頁125。

事各自獨立，沒有相關。但是故事的開展卻有一個固定的空間 - 豆棚底下。每回故事都藉豆棚下的說故事人的口，呈現給讀者。這種體裁在話本是前所未見的。而且全書的佈局更具哲理巧思，因該作品「凡十二則，暗合著十二地支或十二宮的神秘數字。它以豆棚作為說故事的統一空間以豆苗引蔓、開花、結果作為時間順序，連結十二個系列短篇成為一個完整的中篇。」<sup>221</sup>

接著，筆者以吳越王（錢鏐）故事說明「西湖小說」的演變情形，他的故事分別在《古今小說》卷 21〈臨安里錢婆留發蹟〉、《西湖二集》卷 1〈吳越王再世索江山〉、《西湖佳話》卷 12〈錢塘霸蹟〉。這三卷完成的時間是不同的，依其順序為《古今小說》、《西湖二集》、《西湖佳話》。仔細閱讀故事內容可發現大同小異的分別。在〈臨安里錢婆留發蹟〉、〈吳越王再世索江山〉皆提到錢鏐和鍾起的兒子相好，豫章術士相錢鏐乃貴人之事。但在〈錢塘霸蹟〉卻未談及此事，只以簡短的文字敘述錢鏐為何有個婆留的小名，以及少壯時販賣私鹽的行徑。並刻意增加戰爭場面的描述。最後將未死的鄰嫗改成已死，錢鏐造報恩坊且提拔她的兩個兒子，並刪去吳音所唱的還鄉歌。

另外，〈錢塘霸蹟〉還穿插貫休獻詩，錢鏐要他改「十四州」為「四十州」；以及不聽術士之言填平西湖的建議，而把宮殿建在鳳凰山的敘述。從上面這些更動，不難發現〈錢塘霸蹟〉文人色彩的增加。然而據《西湖遊覽志餘》所載敷衍鋪陳的〈臨安里錢婆留發蹟〉、〈吳越王再世索江山〉，這兩卷特重錢鏐不凡的出身以及發跡變態的過程，故事充滿迷信傳奇色彩，與早期說話人的口吻較為相近。如果再將《古今小說》卷 21〈臨安里錢婆留發蹟〉、《西湖二集》卷 1〈吳越王再世索江山〉比較，雖然兩卷的內容幾乎相同。但是在卷目編排上，可以看出《西湖二集》更突顯出文人自覺性，因為該書前六卷都是與君王有直接關係的，

---

<sup>221</sup> 楊義：《中國敘事學》之〈視角篇第三〉，頁 236。

接下來才是安排市井小民的故事。

西湖小說的作品，時間上跨越宋元至明清。筆者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發現話本小說的演變歷程，其中有承襲的，也有超越的。總而言之，如果以順序觀察入話演變，其形式和思想，愈趨複雜也愈趨密切。入話故事與正話故事之間如果情節類似，不妨視作正話的預演。相反地，如與正文故事相反，以為襯托之用。清初是話本小說發展到末期。《十二樓》、《豆棚閑話》等小說問世，更可見作者獨創巧思。從上所論，反映出作品的書面性和雅化的趨向，與早期的「說話」話本，越行越遠。

### 三． 敘事方式

西湖小說在敘述方面，也突出文人自覺性。話本小說一直遵循著「說給人聽」的講述方式，故作者採用第三人稱的全知敘述觀點，因此他對故事中一切無所不知。而且在敘述故事的同時，作者隨時可以現身，對故事中人物或是事件進行評論或解釋。尤其西湖小說是突出地域的文學作品，作者們在敘述上有幾個地方是很突出，並具有共通性。

#### （一） 正文首先介紹杭州好處

由於作者的地域意識的抬頭，在每篇故事正文開端，作者通常大費周章地將杭州吹捧、介紹一番。描述對象以作者放眼所及杭州的鄉村、城鎮、溪流、山嶺、名勝、古蹟等既定的目標，或是無形的風土民情、飲食習慣、消費享樂等行為。這樣情形在早期的宋元話本就已經出現，以〈錢塘夢〉為例：

說不盡杭州好景，有東菜、西水、南柴、北米。自古建都之地，名賢隱跡之鄉。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東西酒肆會佳賓，南北歌樓煙月市。有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sup>222</sup>

除了上面這一段話外，還有更鉅細靡遺的介紹，這樣的內容幾乎占篇幅一半。從介紹的文句中，顯示作者對杭州的山水或是繁華景象充滿讚賞與豐沛的情感。使讀者感受到，杭州素有「人間天堂」的美稱，當之無愧。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西湖三塔記〉。到了明清話本，雖然介紹的篇幅不再如此誇張，但是難免說上一段杭州的好。尤其是西湖專著，在正文前「且把臨安繁華光景表白一回」<sup>223</sup>，彷彿已成慣例。

## （二）引用當地真實的地名

話本乃承襲自「說話」，而說話人為了其故事能被聽眾接受，其人物、題材等都以聽眾熟悉為先決條件。這種以真實地名演繹虛構的故事，對小說的閱讀具有特殊意義。因宋元話本是說話伎藝的直接產物，而「說話藝術往往直接面對特殊的城市接受群體，自然要用受眾熟悉、喜歡的人物、故事和語言來迎合他們的興趣。」<sup>224</sup>後來，話本作家在創作時，也承襲到這種風格。

在〈西湖三塔記〉主人翁奚宣贊要到西湖一遊，其路程為「離家一直徑出錢塘門，過昭慶寺，往水磨頭來。行過斷橋四聖觀前 ..... 搭船直到涌金門上岸。」<sup>225</sup>又如〈張舜美燈宵得麗女〉，女主人翁素香「逕往鹽橋，進廣福廟去拈香。」

<sup>222</sup> 《錢塘夢》原是單篇話本小說，後來李卓吾批點《西廂記》。在書後附刊《錢塘夢》一篇，本文引自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轉錄之全文 頁 324。

<sup>223</sup> 《西湖二集》卷 11〈寄梅花鬼鬧西閣〉，頁 231。

<sup>224</sup> 劉勇強：〈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文學遺產》2001 年第 5 期，頁 60。

<sup>225</sup> 《六十家小說》之〈西湖三塔記〉，頁 15。

男主人翁張舜美尾隨在後，之後兩人互訴情衷，決定私奔到外地。沒想到被人潮沖散，女主人翁素香「逕出城門，從半塘橫去了。」反觀張舜美卻在「一條路往錢塘門，一路往師姑橋，一路往褚家堂，三四條叉路」<sup>226</sup>不知如何是好。在閱讀中該作品，熟知當地環境的讀者，不免隨著主人翁的腳步，直呼「錯過」，心中嘀咕主人公應該如何走才是。

這樣敘述手法，在《警世通言》之〈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發揮得最淋漓盡致，故事中有一段寫到清明節時，許宣要去保俶塔寺追祭祖先的路程。

許宣離了舖中，入壽安坊、花市街，過井亭橋，往清河街後錢塘門，行石函橋，過放生碑，徑到保俶塔寺……喫齋罷，別了和尚，離寺迤邐閑走，過西寧橋、孤山路、四聖觀，來看林和靖墳，到六一泉閑走。<sup>227</sup>

作者引用一連串真實的地名，穿插在作品當中，用來召喚讀者，喚起其對杭州的親切感，及加強故事的真實性更突顯出西湖地域色彩。讀者在閱讀話本時，彷彿身歷其境，隨著主人翁順著地名沿路而走。

#### 四．詩詞運用

話本小說乃韻散交錯的敘事文體，在入話中常見有以詩詞為開端，或是在正話故事中，利用「正是」、「有詩（詞）為證」等作為引入詩詞。詩詞在小說中的敘事功能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大體有五個方面，1、引詩（詞）以證事。2、人物言志抒情。3、繪景狀物。4、作者文才學識的表現。5、評論。

<sup>226</sup> 《古今小說》23卷〈張舜美燈宵得麗女〉頁359-360。

<sup>227</sup> 《警世通言》卷28〈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頁423。

詩詞的運用對於情節的進行，有調節敘事節奏、描寫人物或場景的作用，如果應用得當，可以增添小說的藝術效果。相對地，使用過於浮濫，會使小說的結構鬆散，反而成為累贅。舉一個例子，在《西湖二集》卷7〈覺閻黎一念錯投胎〉中，要形容楊皇后聰明非常，精通文墨，竟連用三十首詩詞，近一千餘字的篇幅。其實，這些詩詞無不是作者藉此展示個人學識之淵博，文筆之高妙。

西湖小說中出現的詩詞，有些是作者自作，有的則為前人之作。引自前人詩詞，應用在西湖小說上，除了考慮情節流暢自然外，更期待能突顯出特殊的地域性。詩詞的運用中，有以下幾點特色，值得一談。

#### （一）常用的套語

話本小說的任何作品，無一例外是由散文和韻文組成。而韻文部分，包括有詩、詞、駢文、曲等。而「話本小說的韻文，多半是現成的套語。」<sup>228</sup>西湖小說中，進一步發現有幾首詩詞，已成為西湖故事中常用的套語。首先舉例南宋林升所作〈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游人醉，指把杭州作汴州。」<sup>229</sup>這首詩出現在《警世通言》卷24〈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醒世恆言》卷16〈陸五漢硬留合色鞋〉、《熊龍峰四種小說》卷4〈孔淑芳雙魚扇墜傳〉、《西湖二集》卷1〈吳越王再世索江山〉、《錢塘夢》等篇。

作品中引用到林升〈題臨安邸〉這首詩，故事時間幾乎都設定於南宋。因為詩中直指宋室南遷後，不知記取教訓，早日恢復中原。反而修建豪華宮殿，整日醉生夢死，而杭州城的熱鬧也不減北宋的首都開封。讀者藉著這首詩，不難想像當時杭州的繁華熱鬧、歌舞昇平的景象。

<sup>228</sup> 石昌渝：《小說》第四章〈話本小說〉，頁148。

<sup>229</sup> 王維先選注：《西湖詩詞》，頁35。（台北：仁愛書局，1985年）

尤其，西湖詩詞中有一首最為著名，無人不曉。就是宋代大詩人蘇東坡所作〈飲湖上初晴後雨〉「湖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蘇東坡巨匠巧思，將西湖比擬為春秋時越國美女西施。她貧賤時雖亂頭粗服，也掩不住天生美色。在宮廷時盛裝打扮，更是奪目驚艷。比喻西湖不管風雨晦明，無不十分美好。這首詩也成為西湖小說中套語，常常被引用在作品中。有《六十家小說》卷3〈西湖三塔記〉、《錢塘夢》、《萬錦情林》卷6〈裴秀娘夜遊西湖記〉、《古今小說》卷17〈單符郎全州佳偶〉、《西湖佳話》卷3〈六橋才蹟〉等。另外，北宋柳永所作〈望海潮〉一詞，也常放在被西湖小說中，因篇幅有限，就不再贅言。

學者陳炳良在研究話本套語的藝術時，提出它有七種不同的功用：1、重複（repetition）作用；2、並列（juxtaposition）作用；3、抒情（lyricism）作用；4、對於文化水準低的聽眾來說，套語使他們感到是在參加一種高級的文化活動，也使他們認同於大傳統；5、由於要認同大傳統，講者常引用典故和賣弄語言技巧，這些技巧基本上也是語法的重複作用；6、它有時也產生比喻（metaphoric）的作用；7、在實用方面，說話人可以利用說套語時作一收束，向聽眾收取賞錢。<sup>230</sup>。從上所論，套語在小說中扮演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和多樣性。小說書寫時適時引入恰當的套語，不但使作品有「畫龍點睛」之效果，更進一步緩和敘事節奏，與讀者產生共鳴。

## （二）詩詞中融入真實地名

西湖小說中除了散文部分，常常會引入當地真實地名在其中。其實，作品中

---

<sup>230</sup> 陳炳良：〈話本套語的藝術〉，《小說戲曲研究第一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177。



詩詞，也有同樣的情形。這樣一來，兩者相得益彰，更突出該地的地域色彩。讓讀者對杭州的地理環境更為熟悉，加深其印象。

首先，我們可以見到不少以杭州當地景觀或地名為題的詩詞。這樣的情形，在真實歷史是屢見不鮮的。例如明代的于謙，就寫過不少與西湖有關的詩詞，如〈夏日憶西湖〉、〈岳忠武王祠〉等。因此，西湖小說的作者，經常描述故事中某個場景，於是利用詩詞，發揮繪景狀物的作用。尤其，是當地聞名遐邇的名勝景點。在〈邢君瑞五載幽期〉，敘述主人翁邢君瑞，好不快活地整日遊於西湖，因此題有「西湖十景」詩，這十首詩分別為有〈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夕照〉……等。作者從詩句中進一步描繪其景觀之獨特風光與個人感受。以〈斷橋殘雪〉為例，其詩句為「望湖亭外半青山，跨水修橋影亦寒。待泮痕邊分草綠，鶴驚碎玉琢闌干。」<sup>231</sup>

例外，也有詩詞不是以當地真實地名為題，而是出現在詩句中。例如，在《西湖佳話》卷3〈六橋才蹟〉，敘述蘇軾被朝廷所貶，來到杭州。原本鬱悶的心情，見到西湖後，豁然開朗。下面看作者墨浪子如何形容西湖好處：

碧澄澄，凝一萬頃徹底琉璃；青娜娜，列三百面交加翡翠。春風吹過，艷桃濃李如描；夏日照來，綠蓋紅蓮似畫。秋雲掩映，滿籬嫩菊堆金；冬雪紛飛，孤嶼寒梅破玉。曉霞連絡三天竺，暮靄橫鋪九里松。風生於呼猿洞口，雨飛來龍井山頭。簪花人逐淨慈來，訪友客投靈隱去。<sup>232</sup>

上面這一闕詞中，作者巧妙地融入了七個當地地名。這些詩詞，經常以西湖名勝景點為主要描述對象，從中宣揚當地山水風光好處。有的還可以回憶杭州的

<sup>231</sup> 《西湖二集》第14卷〈邢君瑞五載幽期〉，頁298。

<sup>232</sup> 《西湖佳話》第3卷〈六橋才蹟〉，頁42。

歷史，或融入當地民風習俗，如錢塘觀潮、西湖夜遊等。

### （三）賦予詩詞名句新的生命力

中國詩歌的歷史悠遠流長，流傳多少名篇鉅作，令我們後世景仰、欽佩不已。這些詩詞原本只見於文人雅士階層，市井小民沒有機會接觸。但是因「話本」的盛行，有些以前詩詞名句靈活生動地運用在小說中。使得這些平民百姓也能感受到傳統的文化氛圍。下面舉幾個鮮明例子：

首先，在〈賣油郎獨占花魁〉寫到秦重在路上無意遇見花魁莘瑤秦，從此魂不守舍、朝思暮想。想到自己是個賣油郎，身無分文如何一親芳澤，與她相處的時候。作者此時套用白居易〈長恨歌〉中名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來形容秦重的相思之情。之後，繼續寫到秦重的賣油生意越來越好，有媒婆想要幫秦重說媒，可是都被他拒絕了。因為秦重見過花魁娘子的美貌，立志要尋找個同樣出色的女子，方纔成親。說到這裡，作者又套用了元稹〈離思〉中名句「曾觀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來形容秦重相思之重與複雜的思緒。

另外，在〈吹鳳簫女誘東牆〉中寫到男主人公潘用投宿在一間客棧，而與女主人公黃杏春房間相對。有次潘用見到花容月貌的杏春，恨不得自己生兩片翼翅，飛到小姐房間去，與她說自己內心話。這時，作者套用了李商隱〈無題〉中名句「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從上面幾個例子看來，這些文人階層的詩詞，套用在話本中，亦生動自然，成功地烘托出小說要表現的情境。重新賦予詩詞名句新的生命力，傳播在民間階層。當然並非只有「西湖小說」賦有這個功用，它幾乎是所有話本小說共同的特色。

## 第二節 風土人情：市民生活的社會圖卷

早期說話人編寫優秀的話本，必須置身市井社會之中，豐富生活閱歷，以熟悉市民不同的生活面貌，熟悉他們語言，熟悉他們的風俗習尚等。更進一步，洞察了市井小民의思想和心態。這一點，在話本傳承上是一直被重視的。尤其西湖小說的先決條件乃框限於特定的地域。在此條件下，地域因素不僅限定作品中人物的活動，還制約作家的審美選擇與藝術手法。作者面對特定的地域書寫，作品自然會更貼近他們真實的生活。因此學者阿英在〈《西湖二集》反映的明代社會〉故云：「若細加擇錄編排，那是有一篇《杭州風俗志》好寫的。」<sup>233</sup>

竟然是杭州的「風俗志」，那西湖小說的內容上不僅是描寫西湖之春夏秋冬、陰晴朝夕之山光水色，庵觀寺院、亭臺樓閣之景觀勝處。更擴及當地節日、人物、僧道、氣候、物產等。因此西湖小說，呈現給讀者彷彿是一幅杭州的社會圖卷，從中我們輕易瞭解當地市民生活的樣貌。學者鄧紹基也認為「話本與擬話本主要是在商業經濟發達的城市中產生、流傳，為城市市民所欣賞和接受，並且確實也反應了一些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因此有人就把它們稱作『市民文學』。」<sup>234</sup>例如《西湖二集》卷 12〈吹鳳簫女誘東牆〉中，有一段生動描繪初春三月之西湖，當地人春遊熱鬧情形：

青山似畫，綠水如藍。……柳枝頭，湖草岸，奏數部管弦；……綠子畔，紅花梢，呈滿目生意。……挾錦瑟瑤箏，吹的吹，唱的唱，都是長安遊冶子；擎金卮玉液，飲的飲著，歌的歌，盡屬西湖逐勝人。……挨挨擠擠，

<sup>233</sup> 阿英：《小說閑談四種》之〈《西湖二集》反映的明代社會〉，頁 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sup>234</sup> 鄧紹基：〈談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兩個特色〉頁 285，刊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文精萃：小說戲曲卷》許建平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白公堤直鬧到蘇公堤，若男若女，若長若短，接衽而行；逐逐烘烘，昭慶寺竟嚷至天竺寺，或老或少，或村或俏，聯袂而走。三百六十曆日，人人靠桃花市趨萬貫錢回；四百五十經商，個個向杏花村飲三杯酒去。又見那走索的，金雞獨立……跑馬的，四女呈妖……齊雲社翻踢鬥巧，角觥社跌撲爭奇，雄辯社喊叫喳呼，雲機社搬弄躲閃。……<sup>235</sup>

## 一．人物形象

西湖小說中主人公，除了生於斯的英雄人物，如吳越王錢鏐、于謙、商輅等。也描述在這特定的空間下，改朝換代的歷史人物，有的是文臣武將，有的是文人才士。曾經任官、駐足此地，甚至改善市民生活，貢獻良多的人物，如白居易、蘇東坡、胡宗憲等人。這些歷史人物已經在上一章討論過，就不加贅言。

然而，話本中主要的人物，反而是尋常的市井小民。如手工業的工人、商人、胥吏、僧尼、妓女、媒婆、盜賊等，這些人物在以前傳統文學作品是不受重視的小人物，如今都是小說裏的主人公。故歐陽代發先生說：「話本小說不再著意描寫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或叱詫風雲英雄人物，主要是反映下層市民的社會生活。其描寫的主角，也主要是下層小人物，如中小商人、手工業者、店員、工匠、江湖流浪漢，以及社會地位低微的勞動婦女等。」<sup>236</sup>更可貴的是，在話本中這些市井小民形象，個個無不是性格鮮活，血肉飽滿。

這些主人公，在〈碾玉觀音〉中是碾玉工匠，在〈賣油郎獨占花魁〉是挑擔賣油的小販，在〈新橋市韓五賣春情〉是經營絲綿舖的小老闆，在〈王孺人離合團魚夢〉是到臨安選官的貢士，在〈任孝子烈性為神〉中是生藥舖的主管，在〈

<sup>235</sup> 《西湖二集》第12卷〈吹鳳簫女誘東牆〉，頁257。

<sup>236</sup> 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頁84。

張採蓮隔年冤報 > 從小賣於富家的丫環。不管這些故事內容虛構程度如何，至少它深刻地反映出市井小民背後無奈的悲歡離合，及勇於面對生活中的挫折之勇氣。

另外，在《型式言》卷 26 < 吳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雲裏手 > 中，正話開頭說到「浙江杭州府 ..... 是個帝王之都，南柴北米，東菜西魚，人煙極是湊集，做了個富庶之地，卻也是狡獪之場。」<sup>237</sup> 原來，故事主要是敘述當地一起複雜的婚姻詐騙案。其中有一段寫到一個姓趙的裁縫在官府為鄰居做證時，官員懷疑他買通鄰居，於是連忙出示「十家牌」的情形：

趙裁慌道：「見有十家牌，張穀過了，『趙志裁縫生理』便是小的。三府討上去一看，上邊是：

周仁 酒店 吳月 積織 錢十 淘沙 孫經 挑腳 馮煥 籠頭 李子孝 行販  
王春 縫皮 蔣大成 磨鏡<sup>238</sup>

上面所稱的「十家牌」，實際上就是當時社會的里甲制度。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看，該作品反映出杭州的社會組織結構，和市井小民實際從事行業。有的經營酒樓，有的是挑夫。這些記載在正史上所不易見到，更顯得可貴、生動許多。

## 二．方言俚語

語言與地域環境有密不可分關係，「一方面它是傳播文化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又保存和體現了特定文化。」<sup>239</sup> 尤其，方言俚語的運用更具體表現出當時

<sup>237</sup> 《型式言》卷 26 < 吳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雲裏手 >，頁 322。

<sup>238</sup> 同上

<sup>239</sup> 趙世瑜、周尚意：《中國文化地理概說》，頁 132。（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年）

真實的生活氣息。並且往往帶有大量與當地環境環境有關的語匯。這樣的情形，在西湖小說中是常見的。

例如在《西湖二集》之〈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形容驚鈍的人，就引杭州俗語道：「飛來峰的老鴉，專一啄石頭的東西。」<sup>240</sup>該故事結尾處，也寫到「至今杭州俗語道：『大瓦巷怒氣沖天』」<sup>241</sup>以上這兩句俗語都與與杭州地名有關聯。另外，在《西湖二集》之〈文昌司憐才慢注祿籍〉敘及五代當地人羅隱之語非常靈驗，因此「浙江人凡事稱為『羅隱題破』者，此也。」<sup>242</sup>這句俗語則與地方人物相關。同樣地，在同書中〈吹鳳蕭女誘東牆〉「至今西湖上名為『鳳蕭佳會』」<sup>243</sup>、和〈巧妓佐夫成名〉「杭州俗語道：『落得拾蠻子的用。』」<sup>244</sup>

話本小說中穿插當地方言俗語，使得作品充滿通俗活潑的氣息。而且這些方言俗語外地人不但不會使用的，恐怕也不容易領會其中意涵。故方言俗語的大量使用，強化了小說的地域色彩。

### 三．風俗習尚

#### (一) 節日習俗

俗語常說「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風俗習尚的差異，具有強烈的地方特色。舉凡食、衣、住、行生活方式和習慣等，皆為其探討的範圍。而且「在各種文化因素中，生活方式或風俗習慣的地域差異是最容易為人觀察到和感受最深

<sup>240</sup> 《西湖二集》卷 16〈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頁 338。

<sup>241</sup> 《西湖二集》卷 16〈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頁 349。

<sup>242</sup> 《西湖二集》卷 15〈文昌司憐才慢注祿籍〉，頁 314。

<sup>243</sup> 《西湖二集》卷 12〈吹鳳蕭女誘東牆〉，頁 268。

<sup>244</sup> 《西湖二集》卷 20〈巧妓佐夫成名〉，頁 427。



的了。」<sup>245</sup>因此西湖小說中作品，往往故事融入當時風俗習尚。雖然沒有針對該民俗或地方掌故詳細的說明，但是自然地融入小說情節中，更顯得生動真實，也間接地呈現當時的民俗圖像，顯示出與其他地域的不同。

風俗習尚乃主要強調時間上的延續性和空間上的差異性。而影響它最大的因素是自然環境。就如飲食文化為例，北方食粟，南方食稻。西湖小說的地域範圍，主要是指以西湖為中心，擴及到整個杭州。與「南北之分」相比更為精細。需進一步強調其特殊的地理環境，所造成的民風異俗。就如杭州全國獨一無二觀潮的勝處 - 錢塘潮。尤其到了農曆八月十八日，更是壯觀。在西湖小說中，有數篇作品，就提到這一點。舉一個簡潔的例子，在《古今小說》卷 38 <任孝子烈性為神>「正值八月十八日潮生日。滿城的佳人才子，皆出城看潮。」<sup>246</sup>從這一段話，證明杭州人的心目中，已將錢塘江人格化了，稱八月十八日為潮生日。並且觀潮的風俗與當地百姓生活緊密結合著。

又如春遊的習俗，西湖一直是附近居民最好的旅遊勝景，尤其大家經過凜冽的寒冬，見到暖和的春陽，無不扶老攜幼走出戶外，享受一番。西湖小說對於當地人春遊的風俗，也時常可見。《西湖二集》卷 12 <吹鳳簫女誘東牆> 將三月的西湖之熱鬧景象，描寫的特別淋漓盡致。除了小說外，文人的詩文雜記也都有記載，在袁宏道 <晚遊六橋待月記> 一文，有云：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艷

---

<sup>245</sup> 趙世瑜、周尚意：《中國文化地理概說》，頁 128。

<sup>246</sup> 《古今小說》卷 38 <任孝子烈性為神>，頁 572。

其實，西湖小說對於杭州的風俗習尚的描寫，舉目皆是。恰可提供我們觀察當地百姓生活的一個視角。如李漁《十二樓》卷6〈拂雲樓〉描寫男主人公在端午節到西湖看龍舟情形，「偶值端陽佳節，闔郡的男女都到湖上看競龍舟，……正看到熱鬧之處，不想颶風大作，浪聲如雷，竟把五月五日的西湖水變作八月十八的錢塘江。」<sup>248</sup>另外學者吳禮權在〈《西湖二集》：一部值得研究的小說〉<sup>249</sup>一文中，就清楚指出在該書中杭州的風俗習慣，如在卷二〈宋高宗偏安耽逸豫〉中有聚集西湖之濱遊觀市賣之風、學士題寫之風、八月十八觀海潮之風。卷五〈李鳳娘酷妒遭天譴〉有七夕婦女染紅指甲之風。卷八〈壽禪師兩生符宿願〉有買魚鰲放生之風。卷十一〈寄梅花鬼鬧西閣〉有杭州好營酒樓妓館之風。卷十二〈吹鳳簫女誘東牆〉有燈節士女遊樂之風。在卷十四〈邢君瑞五載幽期〉有清明節戴柳、祭掃、飲酒之習。在卷十六〈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有元旦五更接灶拜天，以椒柏之酒待親戚鄰里之習、請客以燒鵝羊肉為敬的風習。卷二十〈巧妓佐夫成名〉有妓女設局聚賭之風。

西湖小說書寫了當地的生活景況，和市民的風俗習尚。令人有閱讀當地社會文化史的感受，瞭解當地豐富文化的底蘊。這些寶貴的資料，除了提供我們觀察杭州社會的一個真切的視角，更可以補充正史典籍所遺漏的民俗紀事。

<sup>247</sup> 《袁中郎全集》之〈袁中郎遊記〉，頁12。〔台北：世界書局，1964年。〕

<sup>248</sup> 李漁：《十二樓》卷6〈拂雲樓〉，頁127。

<sup>249</sup> 吳禮權：〈《西湖二集》：一部值得研究的小說〉，頁116-127，《明清小說研究》，1991年第二期。



### 第三節 故事情節：化平淡為神奇

優秀的小說會讓讀者愛不釋手，主要在於情節之跌宕曲折、扣人心弦。因此具有引人入勝的吸引力。到底情節對於作品有多重要，學者雷群明形容的非常貼切，認為「如果把文學作品比作一個人，那麼作品的情節結構就是人的骨架。」

<sup>250</sup>故情節為故事結構中的主幹，也是人物、環境的支撐點。

#### 一．以奇為美藝術觀

我國古典小說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奇」。從神話開始記載以超乎想像的神怪變異的事情。到了唐傳奇，文人在寫小說是「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sup>251</sup>。接下來，話本雖然由民間「說話」演變而成，但其故事情節也注重巧思奇特。有學者就明白指出「明清白話短篇小說描寫著普通人的尋常生活，卻又堅持著以奇為美的傳統觀念，因而創造了自己的時代特性和民族風格。」<sup>252</sup>西湖小說中多數作品，也可以發現它們對情節的重視常中出奇的美學追求，因為取材來自百姓俯仰之間真實生活的題材。經過作者匠心獨運之後，竟然化平淡為神奇，成就出一本優秀的作品。

賈文昭、徐召勛在《中國古典小說藝術欣賞》有云：「我國古典小說中的奇，大致可分為四類，即：神話的奇、迷信的奇、荒誕的奇、正常的奇。」<sup>253</sup>，據他們的看法，也包括了西湖小說故事情節的奇，下面依其標準擇較有特色的作品為例。

<sup>250</sup> 雷群明：《聊齋藝術通論》，頁 53。（上海：三聯書店，1990 年）

<sup>251</sup>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之〈二酉綴遺（中）〉，頁 486。（台北：世界書局，1963 年。）

<sup>252</sup> 黃清泉、蔣松源、譚邦和：《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之〈『三言』、『二拍』與白話短篇小說的藝術世界〉，頁 145。（台北：洪葉文化事業，1995 年）

<sup>253</sup> 賈文昭、徐召勛：《中國古典小說藝術欣賞》，頁 128。（台北：里仁書局，1983 年）

### (一) 神話的奇

「小說起源于說故事，而說故事追溯上去，其源頭就是神話。」<sup>254</sup>神話可說是人類早期所創造的故事，雖然它主要功能不在於娛樂，但是其內容多是怪異、神奇，啟發人們的想像空間。後代小說家在書寫時，並未完全失去與神話的聯繫，反而時常去汲取神話近乎魔術般的神奇魔力，有時還引用在作品中，使故事充滿奇異的幻想。

如《西湖二集》卷 29 < 祖統制顯靈護駕 > 的入話，敘述吳堪與螺女的故事<sup>255</sup>，而且還加上貪官對百姓的刁難情節。那個縣官一聽說吳堪娶了一個絕色的妻子，就想要得到手。於是無理要求要吳堪取到「蛤蟆毛及鬼臂」。因為仙女妻子的幫忙，吳堪順利取來這兩物。次日，縣官又要吳堪取「蝸斗一枚」。吳堪聽從妻子的話，「牽一獸至，大如犬」。縣官叫人將炭燒紅餵食，那黃犬食完炭火，沒想到口吐大火，將貪官及其家人全被燒死。而吳堪則與螺女「坐於光火之上，冉冉升天而去」。這神話非常生動有趣，給人強烈的新奇感。

### (二) 迷信的奇

所謂迷信的奇多與宗教信仰、神靈鬼怪有關係。舉凡鬼怪為非作歹、神靈庇祐、鬼魂附身等超自然事件。首先在《拍案驚奇》卷 24 < 鹽官邑老魔魅色 會稽山大士誅邪 > 寫杭州有一少女被妖怪所抓去，後來因當地天竺寺觀音顯靈而得救。另外《警世通言》卷 23 < 樂小舍拼生覓偶 > 內容有關於當地潮神信仰，因樂小舍見順娘觀潮落水，急忙跳入相救，後來得潮王相助，兩人得以平安無事。

---

<sup>254</sup> 石昌渝：《小說》，頁 5。

<sup>255</sup> 該故事取材自《搜神記》之 < 白水素女 >，參考陳萬益等編：《歷代短篇小說選》，頁 55。（台北：大安出版社，1996 年）

西湖小說中敘述鬼怪作祟的作品，頗為常見。有《六十家小說》卷 3〈西湖三塔記〉描寫白蛇、烏鴉、獼猴這三怪化為人形，危害人間，最後被道長所制伏。另外還有《醒世恆言》卷 6〈小水灣天狐詒書〉、《二刻醒世恆言》卷 5〈栖霞嶺鐵檜成精〉、《警世通言》卷 24〈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西湖二集》卷 11〈寄梅花鬼西閣〉、卷 21〈假鄰女誕生真子〉、卷 22〈宿宮嬪情滯新人〉等。

小說中出現鬼神顯靈庇祐的情節，也屢見不鮮。幾乎都是為了化解主人公所遭逢的危機，使其情節能順利進行。在《西湖二集》卷 6〈姚伯子至孝受顯榮〉描寫姚伯華要將雙親遺骸送回故鄉安葬，沿路鬼神護佑三次。同書中〈祖統制顯靈救駕〉、〈愚郡守玉殿生春〉、〈忠孝萃一門〉等也出現鬼神護佑的情節。最後討論鬼魂附身的情節，故事幾乎都是主人翁受冤屈而死，要尋仇報復或洗刷冤情。在《西湖二集》卷 5〈李鳳娘酷妒遭天譴〉黃貴妃附身在仇人李鳳娘身上，自殘而死。同書〈張採蓮隔年冤報〉張採蓮附身在王立身上，訴說冤情，讓官府得以順利逮捕到凶手。

然而鬼魂附身也有不同的目的，在《西湖二集》卷 27〈酒雪堂巧結良緣〉，女主人公賈雲華為了要與情郎再締前盟，共度今生。竟然死而還魂，附身在另一個女孩身上，使這段淒美愛情故事有個好的結局。從這一類故事看來，作者都努力將鬼神的幻想世界，與現實生活自然無痕地銜接上。製造情節的複雜、曲折性，增添作品中神奇的色彩。

### （三）荒誕的奇

乃指不合乎客觀事物的發展邏輯，令人出乎意料，不可思議，無法解釋。例如《古今小說》卷 21〈臨安里錢婆留發跡〉描述吳越王錢鏐降生時家中紅光四射，彷彿失火，而且其元神為一大蜥蜴。當然其他特殊的人物降生時的奇蹟，或

是夢兆等皆屬於此類。如《古今小說》卷 30〈明悟禪師趕五戒〉寫到蘇軾的前世乃五戒禪師，而蘇軾之母王氏在出生前夢見一個和尚，走入房內。同書中〈月明和尚度柳翠〉時寫柳翠乃玉通和尚轉世，柳翠之母在出生前也「夢見一個和尚，面如滿月，身材肥狀，走入臥房。」<sup>256</sup>

另外，在《西湖佳話》卷 7〈岳墳忠蹟〉描寫岳飛父母在生他時，夢見「一個金甲紅袍，身長丈餘的將軍，走進門來，大聲道：『我是漢朝張翼德（張飛）也，今暫到汝家。』說畢，即時分娩。」<sup>257</sup>，又如在《西湖二集》卷 18〈商文毅決勝擒滿四〉敘述商輅出生前，其父母夢見城隍爺送子給他們，並說將來會光耀門楣。從上面這幾篇故事，得出一個慣例，小說在描述歷史上英雄人物，幾乎都會增添一段貴人「降生神蹟」情節，用意暗示主人公的與眾不同，非等閒之輩，並且在故事中主人公果然不辜負眾望會有一番大作為。

#### （四）正常的奇

所謂正常的奇，「一是把日常生活的社會生活典型化，由典型化中產生的奇；二是選擇生活中奇特而又有一定生活意義的事件，由事件自身產生出來的奇；三是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中產生的奇。一言以蔽之，所謂正常的奇，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具體描寫中產生的奇」<sup>258</sup>如在《醒世恆言》卷 3〈賣油郎獨占花魁〉一個是賣油的小商販，一個是王孫公子才有機會接近的花魁。兩人身分懸殊如天壤之別，故事到底如何發展，使得賣油郎能「獨占」花魁。其情節發展，緊緊扣著個「奇」字。原來那賣油郎秦重，果然是「（情）重」。世間難有的痴心情種，對花魁娘子真誠純樸的付出，絕無貪念。故事有一段，秦重好不容易，存到一筆

<sup>256</sup> 《古今小說》卷 29〈月明和尚度柳翠〉，頁 433。

<sup>257</sup> 《西湖佳話》卷 7〈岳墳忠蹟〉，頁 116。

<sup>258</sup> 賈文昭、徐召勛：《中國古典小說藝術欣賞》，頁 132。

錢可以與莘瑤琴共處一宿，沒想到他竟是細心體貼照料醉臥的莘瑤琴。無怪乎這個真誠善良的小商人，終於勝過驕奢成性的王孫公子們，贏得美人心。

《古今小說》卷 26 <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 中，這故事的情節比 < 賣油郎獨占花魁 > 更複雜、奇曲，牽涉的人物也更廣。除了情節奇特外，故事的標題也很新奇，不免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因為鳥命人命相比，如天地懸殊，更何況以一害七。但是「讀完作品，覺得完全可能，真實可信，情節雖越轉越奇，卻總在人之常情，事之常理之中。」<sup>259</sup>閱讀該作品有現今的偵探小說的趣味，人串物，翻新出奇，層層深入的情節結構。

即使，話本小說發展到末期，作品的情節與標題仍講求新奇。如李漁《十二樓》之 < 拂雲樓 >，該卷的小標題也很突出，如 < 破疑人片言成二美 癡情客一跪得雙嬌 >，這樣聳動標題，令讀者手難釋卷。而且李漁在該卷中將主人公裴七郎的妻子封氏，描寫成扭捏作態的醜婦，處處要引人注意。有一天到西湖散步，沿路故意賣弄風情。沒想到，忽然下起大雨來，醜態頻出，『幾乎把上百個少年一齊笑死。』此時有兩位絕世美女出現，吸引住眾人的目光。沒想到，封氏回到家後，「曉得自己的尊容原不十分美麗」，活活氣死。之後，故事繼續發展，描寫裴七郎如何得到這雙嬌的經過。該故事利用人物美醜之對比，充滿幽默詼諧，使情節頗為新奇、有趣。

## 二．巧合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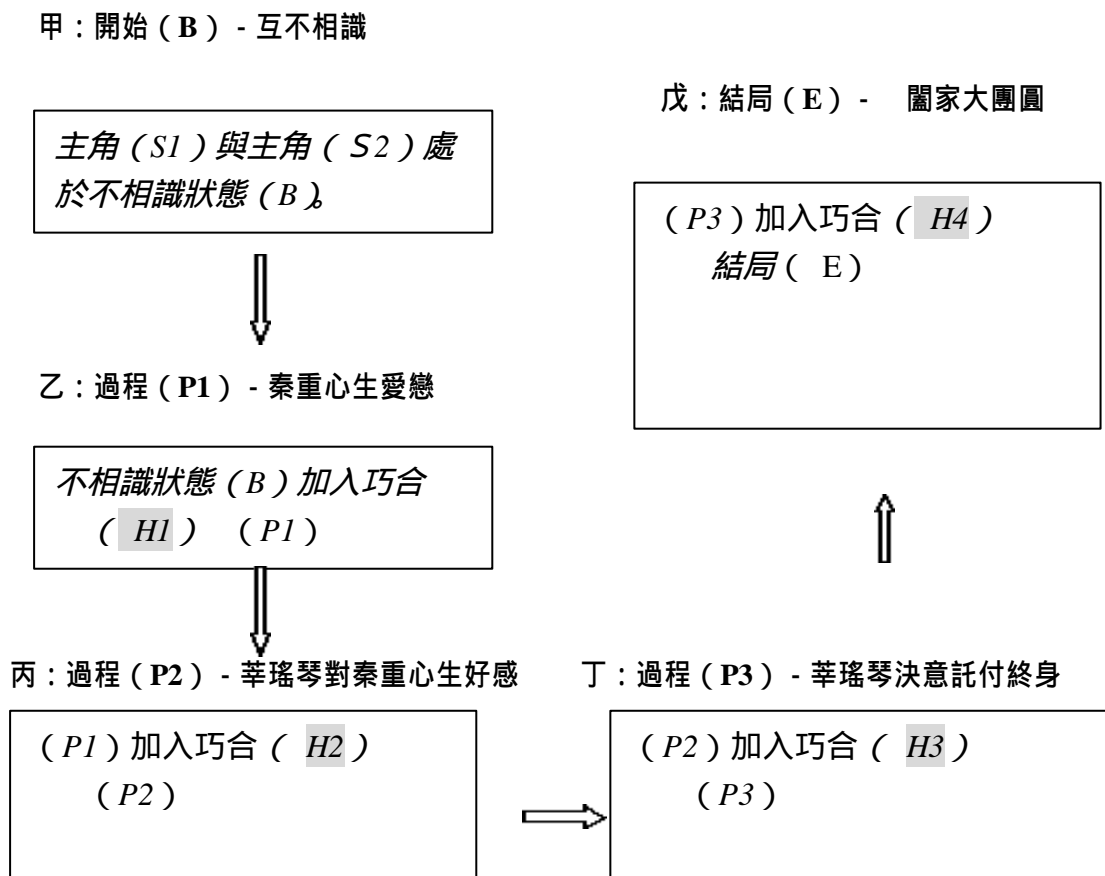
「奇」與「巧」如同「磁」與「鐵」，不可分開才会有作用。如上一節所討論 < 賣油郎獨占花魁 >，在故事中，一開始秦重「巧」遇花魁莘瑤琴心生愛慕。

---

<sup>259</sup> 黃清泉、蔣松源、譚邦和《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之 < 『三言』、『二拍』與白話短篇小說的藝術世界 >，頁 148。

秦重好不容易籌到十兩錢，可以與花魁共處一宿，「巧」在莘瑤琴剛好醉酒，使秦重得以細心照料她一晚。後來，莘瑤琴被王孫公子欺負，真「巧」又遇到秦重化解危難，護送回去。更「巧」的是，秦重生意越來越興隆，於是找來一對外地夫妻幫忙，最「巧」，這對夫妻是莘瑤琴的親生父母，故事最後得以闔家大團圓。

筆者，將〈賣油郎獨占花魁〉敘事程序 (narrative process, 簡稱 NP), 分為個五敘事程序 (甲 戊), 表現如下：



說明如下：

主角 (S1) = 秦重

主角 (S2) = 莘瑤琴

開始 (B) = 互不相識狀態

巧合 1 (H1) = 秦重巧見莘瑤琴。

過程 1 ( P1 ) = 秦重心生愛慕。

巧合 2 ( H2 ) = 莘瑤琴剛好醉酒，無法服侍秦重。

過程 2 ( P2 ) = 莘瑤琴對秦重心生好感。

巧合 3 ( H3 ) = 莘瑤琴被王孫公子欺負，巧遇秦重化解危機。

過程 3 ( P3 ) = 莘瑤琴決意託付終身。

巧合 4 ( H4 ) = 秦重找來一對外地夫妻幫忙，這對夫妻是莘瑤琴的親生父母。

結局 ( E ) = 闔家大團圓。

俗語說：「無巧不成書」。在西湖小說中每一作品，或多或少都運用到巧合的手法。讓故事情節峰迴路轉、引人入勝。如《古今小說》卷 27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莫稽為了個人顯達富貴，竟將踐妻金玉奴推入江中。後來，莫稽與上司許公之女成婚時，發現新娘竟是前妻。原來，事情真「巧」，金玉奴被許氏夫妻所救，並收為義女。在《西湖二集》卷 13 <張採蓮隔年冤報> 中，張採蓮要與哥哥逃回故鄉那夜，真「巧」，遇到賭輸的王立要到周家行竊，使得張採蓮誤認王立為兄，慘遭殺害。

巧合的手法，在《醒世恆言》卷 33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中發揮最為淋漓盡致，情節安排中處處扣住一個「巧」字，劉貴得丈人資助，回到家恰巧二姐開門遲了，所以才編造戲言故意戲弄她一番，使得二姐出走，接著，劉貴被盜賊所殺，又是「巧」。二姐在回娘家路上，遇到崔寧結伴而行，也是「巧」。沒想到，崔寧身上所攜帶的十五貫錢，又與劉貴所遺失的錢吻合，更是「巧」。作者為了讓案情得以昭雪，也是利用到「巧」字。安排大娘被強盜所擄，而其強盜竟是殺害劉貴的兇手。讀者對一連串情節的發展，巧合到瞠目結舌，嘆為觀止。

### 三．真實性

小說構思安排的最大困難，是追求情節的跌宕曲折、奇巧不斷的時，要能兼顧作品的真實性，使情節的發展，令讀者可信。「雖然可信的情節未必感人；感人至深的情節卻必須可信。」<sup>260</sup>所謂真實性，乃要兼顧到兩方面，首先要合乎當時社會的人情事理，符合所處具體生活環境。另外，要符合人物的性格特點，不能前後矛盾，無法統一。

小說情節的真實性，使作品具有更強烈的感染力量和藝術效果。在前面所舉的幾篇優秀作品，對於情節的真實性非常重視。故事中所發生的事件本身，在當時環境下是合理的。再舉〈賣油郎獨占花魁〉故事一開始就舉莘瑤琴與父母在金兵南下時失散了。使得莘瑤琴被惡人所騙賣入妓院。最後全家在杭州團圓。這樣故事發展，是合乎當時宋室南遷，定都杭州，人口劇增的社會背景。在《夢梁錄》有相同記載：「自高廟車駕由建康幸杭，駐蹕幾近二百餘年，戶口蕃息，近百萬餘家。」<sup>261</sup>

另外，上一節中所討論《京本通俗小說》之〈錯斬崔寧〉中，巧合手法靈活地運用在情節中，完全不減作品的真實性。故事的開始乃劉貴對陳二姐說已經將她賣了，因此得十五貫錢的戲言，之後展開錯綜複雜的情節。其實，在宋代買賣妻婢的情事是常見的。陳東原先生著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就寫到宋代「丈夫不賢以至鬻妻，是常有的事。」<sup>262</sup>。尤其，劉貴家中也窮困好些日子，如果出此下策，也不足為奇。所以成功的小說作品，題材都是取自市井小民熟悉、真實的生活。

---

<sup>260</sup> 馬振方：《小說藝術論》第四章〈小說的情節藝術〉，頁 11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sup>261</sup> [宋]吳自牧：《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之《夢梁錄》卷 19「塌房」條，頁 299。

<sup>262</sup>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第六章〈宋代的婦女生活〉，頁 15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



從上所論，成就一個優秀的小說作品，其藝術技巧是要兼顧多方面的。尤其情節是最關鍵、重要的因素。首先在構思時題目或是內容要求奇穎、獨特外。情節的安排更見巧合的手法，製造出曲折動人、高潮迭起的藝術效果。最後情節的真實性更不容忽視，要合乎當時社會環境和人物性格。令讀者有確實、逼真，歷歷在目的感受。

## 第五章 .「西湖小說」之文化內涵

### 第一節 水文化

- 一 . 文人雅士的天堂
- 二 . 經濟文化的開展
- 三 . 圖騰信仰

### 第二節 地域意識之建構

- 九 . 鄉土情懷的抒發
- 十 . 先賢典範的崇慕
- 十一 . 『地靈人傑』的自詡

明末清初時小說大盛其道，而且故事背景大部份以江南地區為主，尤其以蘇州、杭州、揚州居多。本文以西湖小說為對象，框限出特定地域文化。就整體而言，地域文化的形成不外乎兩種主要因素，其一是自然環境，其二是社會結構。自然環境，指的是水土、氣候、山嶽等自然條件，對古代人影響較深；社會結構，指的是人類隨著時間消逝，積淀出外在的人文環境，包括民族信仰、宗法制度、經濟發展等。本章嘗試從地理文化角度，發掘「西湖小說」特有的文化內涵。

### 第一節 水文化

受限於生存的需要，人類對水的依賴性超過其他的自然物，可以說人是離不

開水的。綜觀所有的古文明，都起源於水邊的，或者是海，或者是江，或者是湖。然而杭州得天獨厚，乃三者兼具。海是東海，江是錢塘江，湖是西湖。無怪乎學者王旭烽在《杭州史話》直呼「杭州是水的世界」<sup>263</sup>。更清楚說來，杭州主要有三種水：一是錢塘江，全長 600 多公里，當地人稱為母親河，因為它孕育出吳越文化。二為西湖，它位於杭州城的西面，與杭州城血肉相連，無法分割。三是大運河，又稱作京杭大運河。顧名思義，意謂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長 1782 公里。杭州又是江南水鄉重要的城鎮之一，自古籠罩著清雅靈秀的文化氣息，憑藉著川流交錯的河道，便利交通往來和豐富海洋資源。建立起自給自足、地靈人傑的人間稀境。

## 一．文人雅士的天堂

西湖具有湖光山色，風光明媚的美景，湖中有座孤山，溪澗幽深，古蹟眾多，一潭碧水，盡收眼底。當地有個美麗神話，認為西湖乃天上的明珠，一不小心墜地而形成<sup>264</sup>。後來杭州自唐以來相繼發開，再經詩人詞客不斷吟詠渲染，在北宋就有「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的美名。

西湖的美眾所皆知，歷史上不知吸引多少詩人詞客的留連駐足，著名的有宋之間、李白、白居易、林和靖、柳永、蘇軾、楊萬里、陸游、劉克莊、周密、張炎等人。儘管他們身份不同，有的入仕為官，有的是子然一身文人。但相同的是，在閒暇之餘嚮往自然恬靜的山水風光，尋求一種安頓自我的方式。西湖，正是他們最佳的去處。面對這山明水秀的人間天堂，心境格外瀟灑、超脫起來，更容易激發他們創作的靈感。難怪，北宋詩人晁沖之曾經有云：「不到西湖看山色，定

---

<sup>263</sup> 王旭烽：《杭州史話》，頁 12。（杭州：杭州出版社，2000 年）

<sup>264</sup> 《西湖民間故事》卷 1〈明珠〉，杭州文化局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 年，頁 1。

應未可作詩人。」<sup>265</sup>明白地說出沒有去看過西湖山水風光的人，可不能算是詩人了。

從上可知，古今許多名人才士，無不一遊西湖為幸，以未見西子為憾。下面舉蘇軾〈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一詩，從詩句中更清楚指出詩人名士來到西湖為何樂不思蜀，整日賞玩亦不怠倦的原因：

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  
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sup>266</sup>

詩人對於西湖充滿著濃厚的情感，不時滲透在詩句中。一來本性「獨專山水樂」，來此任官如魚得水，好不快哉！二來，西湖除了有秀麗的山水外，人文古蹟更多到不能勝數。單就寺廟而言，「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意指詩人每天拜訪一所寺院，需花一年時間才能訪遍。所以，治杭前後共五年，他仍謙虛說道，西湖景色風光「誰能識其全」。後來蘇軾離開杭州，竟然「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可知他對西湖的眷戀，依舊不減。

明代時，西湖的美仍舊使多少文人才士為之傾倒，還先後留下不少遊記。如高攀龍、袁宏道、高濂、張岱等人。其中袁宏道<sup>267</sup>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就曾提到其三弟（袁中道）在杭州遊玩的心得，有云：「三弟盛稱在杭

---

<sup>265</sup> 晁沖之，字叔用，山東鉅野人。生卒年不詳。宋元佑年間進士，與他的堂兄晁補之，都是有名的詩人。參見《西湖詩詞》，頁24。

<sup>266</sup> 《蘇軾全集》，頁644。（台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

<sup>267</sup> 袁宏道（西元1568-1610年），字中郎，號石公，萬曆二十年進士，做過吳縣令，國子博士，吏部郎等，但斷斷續續，總共不過五年左右。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號稱「公安三袁」。

胸懷如月，詩思如水，酒態如春。每踞石臨流，未嘗不思及兄。如人從杭州來，眉目髭鬚，皆說西湖。」<sup>268</sup>可知，西湖對文人雅士的影響多深，內心為其激盪不已，因而才思俱發，回來後，禁不住逢人「皆說西湖」。由此可知，西湖如詩如畫的勝景，深深感動到此遊玩的文人才士，因此激發他們靈感，得已創作出不少膾炙人口的好作品。如此一來，恰巧呼應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中一段話：

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  
<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sup>269</sup>

劉勰認為屈原能寫出《楚辭》這樣優秀的作品，無非乃「江山之助」。所以山川風物對作家的藝術創作和美學風格有著關鍵性影響。其實山水本無知，但對遊歷於山水間的文人雅士而言，卻是有知的。各有各的興懷、感受。尤其觀水時，容易興起「逝者如斯夫」的感嘆，所以李煜眼見江山易主，無盡的愁悵，也只能化作「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水，彷彿是文人面對人生挫折失意時，療傷止痛最好的一帖良藥。有助於讓心胸更為寬闊，重新省視人生的意義，喚起生命的自覺。

自古以來，凡有詩人文士遊歷的地方，都會留下他們的詩句。尤其文人們把酒助興，自然詩性大發。歷代有關西湖的詩詞可謂成千上萬，美不勝收。以白居易為例，他任官於杭時，酷愛西湖，留下諸多名作，引人遐想。有<湖上春行>、<春題湖上>、<錢塘湖春行>等詩。當然，這些文人雅士來到西湖所題詠的詩詞，並非完全只是歌詠讚揚山水的風光秀

---

<sup>268</sup>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之<袁中郎尺牘>中「答謝在杭司理」，頁44。（台北：世界書局，1964。）

<sup>269</sup> 劉勰：《文心雕龍》，頁711。（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

麗。經常可見詩人詠物寓情，抒發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見解或是對民間疾苦所寄予的悲憫和感慨。如白居易〈別州民〉：

耆老遮歸路，湖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  
稅重多貧戶，農飢足旱田。唯留一湖水，與汝救荒年。

這首詩透露出詩人對當地百姓在「稅重」、「農飢」的現實環境下，寄予無限的同情，和詩人即將離別杭州之難捨情感。所以，吟詠西湖的詩詞，並非只是風花雪月的題詠之作，其中也蘊藏人文關懷和其他豐富的意涵。

西湖小說中男主人公為文人雅士之輩，作者多半會寫上主人公遊覽西湖，陶醉於這如詩如畫的美景，流連忘返。如《熊龍峰四種小說》卷4〈孔淑芳雙魚扇墜傳〉；《錢塘夢》；《西湖佳話》卷11〈斷橋情跡〉、卷6〈西冷韻蹟〉、卷1〈葛嶺仙蹟〉、卷2〈白堤政蹟〉、卷3〈六橋才蹟〉；《警世通言》卷6〈俞仲舉題詩遇上皇〉；《西湖二集》卷14〈邢君瑞五載幽期〉、卷3〈巧書生金鑾失對〉、卷23〈救金鏗海龍王報德〉；《十二樓》之〈拂雲樓〉……等等作品。可看出，不管是現實生活上，或是小說中才子文士西湖為他們嚮往已久的天堂，有生之年都渴望走一遭。尤其《西湖佳話》之〈孤山隱蹟〉描寫林和靖傳奇的一生，西湖成為他最後的歸宿<sup>270</sup>，終生隱沒於此，朝夕與西湖相對。

當然，文人墨客不可能全都效法林和靖，從此定居於此。終需一別，離開後西湖常是他們魂遷夢縈的所在，尤其當現實生活無法再前往觀賞遊玩，只能在夢中神遊，稍減依戀難捨之情。明末張岱在《西湖夢尋》自序中就說到這樣的愁悵

---

<sup>270</sup> 據中國時報91年4月22日第五版，有個斗大標題「秀麗的西湖，自殺熱門點」，報導說從去年到今年4月以來已經有26人，選擇到西湖自殺。訪問獲救的自殺者意見，到西湖自殺主要是實現人生最後的浪漫念頭。其實，不只現在，過去就有好多名人，遺言交代而埋骨於西湖畔，如秋瑾、章太炎、張蒼水、蘇曼殊等人。

「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sup>271</sup>

## 二．經濟文化的開展

在本章的一開始，就提到杭州最主要的三種水，大運河為其中之一。在古代生產技術尚未發達時，錢塘江對當地人而言最為重要。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手工業的勃興，蘇、杭又為著名的絲綢產地，尤其「在南宋定都杭州的 140 多年間，杭州已經成為名符其實的『絲綢之府』<sup>272</sup>。為溝通全國絲綢供給與需求，最佳的交通運輸便是舟行，可以縮減運送的時間和費用。當然，杭州並非只有絲綢聞名天下，也是著名的米倉。調解全國物產、貨品供給流通，大運河是最佳選擇「流過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六省市，跨緯度 10 度，連貫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流域，是我國最偉大的工程之一。」<sup>273</sup>而杭州位居京杭大運河的終點。大運河攸關著當地經濟發展進步，因此地位逐漸地取代錢塘江，躍升為當地的經濟命脈，促使杭州具備全國重要工商城市的條件。

城市的進步促進手工業生產、商業活動都有快速的發展。杭州的手工業之興盛，在小說中隨處可見。舉個例子，《古今小說》卷 3〈新橋市韓五賣春情〉描述當地有個姓吳富翁家境富裕和維持生計來源，如下：

門首有個絲綿舖，家中放債積穀，果然是金銀滿篋，米穀成倉。去新橋五裏地名灰橋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吳山，再撥主管幫扶，也好開一

<sup>271</sup> [明]張岱：《西湖夢尋》，頁 24。（台北：久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sup>272</sup> 程勤：〈論杭州「絲綢之府」的形成〉，《絲綢》1998 年第 4 期，頁 40。

<sup>273</sup> 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頁 172。

個舖。家中收下的絲綿，發到舖中，賣與在城機戶。<sup>274</sup>

從上面這段話，發現杭州絲綢手工業已經有分工的現象。除了絲綢業外，杭州在其他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各式各樣的手工坊和行業不斷產生。《夢梁錄》卷十九「顧覓人力」清楚列舉出分類之細密，反映出杭州人力市場的活絡，從解庫掌事到酒肆店茶博士等，都有人需要僱用。尤其富裕的家庭，更是僱用許多的家僕和工匠，諸如在《警世通言》卷 8〈崔待詔生死冤家〉中的女主人公秀娘便是郡王府刺繡的；男主人公崔寧是碾玉的工匠。

再論商業活動的興盛，為滿足不同層次的需求，杭州開設有各種店舖。南宋時「杭州是行都之處，萬物所聚，諸行百市，自和寧門權子外至觀橋下，無一家不買賣者。」<sup>275</sup>以飲食消費為例，酒樓飯館的費用較可觀，多半提供商賈過客食用。一般平民雖不敢問津，但是這些市井小民也有不同的消費形態，據《夢梁錄》記載：

杭州城內外，戶口浩繁，州府廣闊，遇坊巷橋門及隱僻去處，具有舖席買賣。蓋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或稍豐厚者，下飯醬湯，尤不可少。雖貧下之人，亦不可免。<sup>276</sup>

隨著城市發展，飲食文娛消費等功能日益顯露出來。最明顯的就是原本只為貴族官僚、王孫貴人服務的型態，開始向中下層著眼，重視一般市民的需求。杭州得運河之利從五代時就是江南重要的城市之一。城市的繁榮富庶、商賈往來，直接地影響當地民風習尚，更進而減弱傳統道德之制約力量。學者陳東有在〈再

<sup>274</sup> 《古今小說》卷 3〈新橋市韓五賣春情〉，頁 63。

<sup>275</sup> 《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之《夢梁錄》卷 13「團行」條，頁 239。

<sup>276</sup> 《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之《夢梁錄》卷 16「薰鋪」條，頁 270。



論運河經濟文化與《金瓶梅》>中就詳細探討位居運河兩岸的城市，有利的經濟條件和居民心態上的改變。他清楚指出：

運河經濟文化分氛圍中，在商鎮河埠，在市民商賈心理，金錢成了追求的目標，利潤成了自身的價值。而且還形成的一種趨勢，一種自然而然的必然。正如要讓那些「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山民村夫放棄宗法倫理道德是一件難事一樣，要這些走南闖北、出錢進利的市民商賈不談基本利潤、不求物慾也是一件難事。<sup>277</sup>

學者陳萬益也持相同看法「明末的江浙城市，物質和精神生活都得以最自由地發展，在繁華侈靡的生活中，人民不顧受傳統禮教的束縛，行為放浪不羈。」<sup>278</sup>所謂「江浙城市」主要指運河邊的新興城鎮，如蘇州、揚州、杭州等。當地居民對於自身利益和享樂的追求，反映驕奢淫逸的商業氣息，催化其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改變。因此傳統倫理價值觀和標準，不再如牢籠般束縛人民的行為。學者徐泓〈明代社會的變遷 - 以江、浙地區為例〉一文，更清楚交代江浙人民，受商業活動的刺激，其繁華奢靡的生活習尚：

明代後期，社會風氣起了相當大的變化，儉樸守禮的風氣，逐漸為奢靡僭越的風氣所代替。一般人思想言行的這種普遍傾向，這是明末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局勢變化的反映。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與擴大，嘉靖以後，社會風氣奢靡，日甚一日。侈靡之風盛行，消費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業機會，更促進商品經濟的發達。侈靡之風盛行，又影響明末社會秩序的安定，僭禮犯分之風盛行。對「貴賤、長幼、尊卑」均有差等的傳統社會等級制度，

---

<sup>277</sup> 陳東有：《金瓶梅文化研究》之〈再論運河經濟文化與《金瓶梅》〉著，頁 25。（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 年）

<sup>278</sup> 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吳人生活》第二章〈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頁 70。（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 年）

衝擊甚大。尤其侈靡之風，刺激人們的慾望，為求滿足私慾，乃以貪污納賄為手段，破壞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風氣，使貪賄成風，恬不以為怪，而貪黷之風，又倒過來刺激社會風氣，使其更趨奢靡。<sup>279</sup>

西湖小說中就有不乏主人公追求財、色的故事，枉顧傳統道德教訓，寫出活生生的現實百態。如《歡喜冤家》卷9〈乖二官騙落美人局〉描述明末時京裡選秀女，要送到宮中。於是杭州府方家聽說後，連忙將正值妙齡、花容月貌的方二姑，嫁給五十多歲的王小山。夫妻倆生活日漸困窘，此時王小山心生一計，要利用方二姑的美色，誘鄰人張二官合開一家南北雜貨的店舖。沒想到，後來假戲真做張二官與方二姑兩人情投意合，生下一子，王小山最後憂憤而死，最後方二姑改嫁給張二官。

同書中，卷13〈兩房妻暗中雙錯認〉，敘述杭州府有姓朱、龍兩戶人家，緊鄰而居。這兩位主人公分別是朱子貴與龍天定，都是二十餘歲小財主。互見對方的妻子是絕色美人，都想要一親芳澤。於是兩家私下互相約定，夜晚時上演著換妻的戲碼，四人每日縱慾好不快活。最後被官府得知，命朱、龍二人之妻子改嫁，而他們兩人重新各娶妻房。這樣的荒唐無恥故事，突顯出重視個人享樂和滿足，藐視傳統倫理綱常的價值觀。

杭州，由於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富庶，人口的增加。南宋時當地社會習尚已有繁華奢靡的現象，據《夢梁錄》有云「臨安風俗，四時奢侈，賞玩殆無虛日。」<sup>280</sup>市井居民除了重視遊賞行樂，連生活享受也以奢侈為尚。因此為了滿足大眾的消費慾望，杭州常見南貨北味的各式店舖、高朋滿座的酒樓茶肆、濃妝豔抹的賣

<sup>279</sup>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 - 以江浙地區為例〉，收在《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上冊）》，頁137-159。（台北：中央研究院編印，1989年）

<sup>280</sup> 《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之《夢梁錄》卷4「觀潮」條，頁162。

笑青樓。在《古今小說》卷 29〈明月和尚度柳翠〉中，就描述杭州當時通和坊這一條街妓院的盛況：

原來南渡時，臨安府最盛。只這通和坊這條街，金波橋下，有座花月樓，又東去為熙春樓、南瓦子，又南去為抱劍營、漆器牆、沙皮巷、融合坊，其西為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這幾個去處都是瓦子。<sup>281</sup>

尤其，杭州具有聞名遐邇的西湖，富貴人家更是不惜千金，自備畫舫遊船、美酒佳餚，邀歌妓相伴，在湖上飲酒作樂，逍遙快活。在西湖小說上，時有所見豪民巨賈遊湖享樂，如《萬錦情林》卷 6〈裴秀娘夜遊西湖記〉中裴家全家在掃墓那晚，趁興賞月遊湖；《醒世恆言》卷 3〈賣油郎獨占花魁〉莘瑤琴為杭州名妓，常被王孫公子邀約遊湖；《西湖二集》卷 23〈救金鏗海龍王報德〉楊維禎天天與美妾在西湖上遊玩。難怪，杭州有個著名的稱號，喚為「銷金窟（鍋）」<sup>282</sup>。在有關西湖詩詞當中，時有所見其稱號。例如元末文人張憲在〈湖上〉一詩中，有云「綠蓋遮籠菡萏，碧瀾搖蕩鴛鴦。罨畫船中鼓板，銷金鍋裏時光。」<sup>282</sup>為何西湖有『銷金鍋』之稱，主要是：

從五代到北宋，杭州已儼然成為全國數一數二的大城市。在此背景下，西湖的遊賞活動迅速興盛活絡，整個環境品質也產生巨大的變化。尤其南宋建都臨安，西湖成為京城門外的近鄰，京城的繁華生活侵染西湖，於是使西湖成為炙熱鬪鬧的名勝，成為一般市民的行樂之地，著名的銷金鍋兒。<sup>283</sup>

從上所論，杭州人生活的富饒，西湖又是四時節令都是遊覽賞玩的好地方，

<sup>281</sup> 《古今小說》卷 29〈月明和尚度柳翠〉，頁 435。

<sup>282</sup> 《西湖詩詞》，頁 187。

<sup>283</sup> 侯迺慧：〈從山林天籟、湖遊娛樂、到悲歌懷古：西湖題詠詩在唐宋元時期發展的三個階段〉，《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14 期，1996 年 12 月，頁 29。

故成為市民享樂的中心。無怪乎，《豆棚閒話》的作者艾衲居士，要將蘇東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名句重新詮釋。他從負面去思考西湖與西施的存在：

西湖就在杭州郡城之外，山明水秀……酒樓台榭比鄰相接，畫船簫鼓晝夜無休。無論外路來的客商、仕宦，到此處定要破費些花酒之資，那本地不務本業的游花浪子，不知在內嫖賭浪費多多少少。一個杭州地方，見得如花似錦，家家都是空虛，究其原來，都是西湖逼近郡城，每日人家子弟大大小小走到湖上，無不浪費幾貫錢的。前人將西湖比西子者，正說著西湖無益於杭城，卻與那西施具有那傾國傾城之貌有害吳國意思一樣。<sup>284</sup>

市民百姓除了到聲色場所或西湖上縱情玩樂外，也追求在飲食、建築、服飾等各方面物質享受。小說家周清原就察覺當地奢侈習尚嚴重性，試圖藉由小說的影響力，喚醒杭州人的自省。在《西湖二集》卷 25〈吳山頂上神仙〉，有一段敘述到「上帝惡杭州百姓好為奢侈，作踐五穀，暴殄天物。」<sup>285</sup>於是藉旱災懲罰杭州百姓，讓百萬生靈無水可用，幸好得一位活神仙之助，災難得以化解。

杭州城市風氣崇尚奢靡，追求的是現實利益和生活享受，完全歸咎於運河這條河道所致，並非客觀正確的。政治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主因，南宋時高宗駐蹕於此，朝廷上下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指把杭州作汴州」無心收復失土。明中葉後，皇帝多半荒淫縱慾，無心於朝政，朝廷上下貪污腐敗。思想上，王學左派的興起與鼓吹，肯定人欲的存在。這些原因都促使社會風氣為之一變，造成百姓生活更為自由和寬鬆。<sup>286</sup>但是，無可否認地運河這條攸關全國經濟的黃金水道，

---

<sup>284</sup>〔清〕艾衲居士：《豆棚閒話》第 2 則〈范少伯水葬西施〉，頁 196。（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 年）

<sup>285</sup>《西湖二集》卷 25〈吳山頂上神仙〉頁 522。

<sup>286</sup>〔明〕李贄：《焚書》卷 1〈答鄧石陽〉有云「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

每天送往迎來多少貨物、商賈，促進了沿岸城鎮的發展，同時也開啟居民新的視野和價值觀，使得他們的言行舉止、生活方式等方面，自然而然與其他城鎮有明顯不同。

### 三．圖騰信仰

追溯杭州最早的人類活動與歷史文明，據近代考古學家考證，乃是新石器時代的河姆渡文化。它的遺址位於杭州灣以南寧紹平原上的餘姚縣河姆渡村。周圍有湖沼、丘陵，故有地利之便，既可漁獵，又可農耕。地肥水美，無怪乎是古人生存的絕佳環境。而且河姆渡遺址中，出土了大量以木、石、骨等製作的生活用具和生產工具，其中以骨器最多，多數以牛、鹿等動物的骨頭所製。從出土的文物，反映了當時農耕的技術已經相當發達。稻作文化，一直是越文化的標誌。該遺址中也發現了大量稻作遺存，因此證明我國是世界上稻作物起源的一個重要發源地。從另一個視角，說明中華文明起源的多源性，河姆渡文化在年代上早於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故它代表著中華文明長江流域以南的文化特色。<sup>287</sup>

回到文字記載，春秋時代吳越兩國爭雄稱霸，常兵戎相見。杭州原是越國的領土。但在西元前 494 年，吳王夫差打敗越王勾踐，因此越國歸屬於吳國。後來勾踐臥薪嚐膽、勵精圖治，以文種掌內政，以范蠡主軍事，實行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措施。終於在西元前 473，打敗了吳國，逼吳王夫差自殺，成為一代霸主，讓杭州重新成為越國的版圖。關於這一段歷史，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富戲劇性的其中一幕。

---

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從上面這一段話，可知對「天理」的輕視而對人欲的肯定。

<sup>287</sup> 張荷：《吳越文化》，頁 8-10。（瀋陽：遼寧出版社，1991 年）

再翻閱現存最早的浙江地方史料，成書於東漢的《越絕書》、《吳越春秋》，除了詳細記載吳越兩國的歷史外，並從中發現到越國人的原始信仰。那便是圖騰信仰 - 蛇<sup>288</sup>。古代人由於受外在環境的牽制很大，相較之下，顯得自己的怯弱和渺小。對生活周圍的自然物都感到畏懼與奇妙，進而產生一種複雜的聯想。以水為例，它為杭州帶來豐富的水產、秀麗的風光、肥沃的土地，更有利交通往來。可是水同時也會帶來災難，水患來襲造成家園的破壞，更甚者身家性命的損失，使得人們對它又愛又敬。當地人出於對水的敬畏，故藉著宗教的祭祀能祈求年年平安、豐收。於是越人就有「春祭三江、秋祭五湖」<sup>289</sup>的文化傳統。越人對於水的崇拜與信仰，學者烏丙安先生，這樣解釋道：

對水、火的信仰是大自然崇拜的兩種原始形式。水有江、河、湖、海……，因而也產生了多樣的水神，受人們供奉。人類對於水的依賴性超過任何其他自然物，因而水給人的恩惠和水加於人的禍患都是引起人們信仰水的客觀依據。<sup>290</sup>

對水的敬畏，也表現在吳、越人的斷髮紋身習俗<sup>291</sup>。在農耕技術尚未發達，古人必定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習性。因此當地人為求溫飽，需下水捕捉魚蝦等水產。為求豐收和自身生命安全，於是他們身上多半有紋龍、蛇之形。這種紋身的傳統，到南宋時仍時有所見。尤其是當八月十八日，全城幾乎有大半

---

<sup>288</sup> 「圖騰信仰」是古代大自然信仰及動植物信仰發展起來的一種原始氏族標誌的信仰形式。進一步解釋指和氏族對氏族祖先的信仰很有關係，往往在許多神話、傳說中講述本氏族祖先是某種動物或該動物的近緣，甚至出現了大量的異物感生的祖先誕生故事，以解釋古代對孕育的無知，既定了某種物種後，便形成了這種「圖騰」標誌的信仰。請參見烏丙安：《中國民俗學》第十七章〈信仰的原始形態〉之第三節「圖騰信仰」，頁 291-295。（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年）

<sup>289</sup>〔東漢〕袁康：《越絕書》，《四部備要》據抱經堂本，第 282 冊 卷十四。（台北：中華書局，1981 年）

<sup>290</sup> 烏丙安：《中國民俗學》第十七章〈信仰的原始形態〉，頁 285-286。

<sup>291</sup> 所謂「斷髮」指剪短前額的頭髮，於腦後束髻。但斷髮對於水鄉生活的人來說，既可減低在水中活動時水的阻力，亦可避免因水草纏住頭髮而產生的危險。「紋身」指在身上用針或石頭等刻劃龍蛇之花紋，塗以色料。參考梁白泉：《吳越文化：中國的靈秀與江南水鄉》，頁 42。

的人扶老攜幼的來觀潮。那時巨浪排天，磅礴而至，其勢如雷霆萬鈞，不可阻擋。然而，在巨浪之中會看到「善泅者數百，皆披髮紋身，手持十幅大綵旗，爭先鼓勇，泅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sup>292</sup>。究竟為何當地人會有紋身的習俗，學者張荷解釋如下：

吳越人的圖案多是龍、蛇之形，因他們長年在與水搏鬥中，視水為神 - 水龍王。自己身上刻有龍蛇之形，以示自己是龍蛇的子孫，可以免除災害，保佑自己的生命安全。<sup>293</sup>

從上可知，越人崇拜蛇（龍），他們尊奉蛇為他們的祖先，自稱是蛇的後裔。乃為圖騰信仰的一種形式。對於這種信仰（崇拜），在史料中不乏記載。在《吳越春秋》就提到，越王句踐派大夫文種送給吳王「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狀龍蛇，文彩生光」<sup>294</sup>的『神木』，以示越國畏懼屈服於吳國之意。同書中〈闔閭內傳第四〉也記載到吳越素來為敵，吳國一直努力要征服越國，這樣的野心也顯現在城門建築上「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地。」<sup>295</sup>

回歸文本探討，「小說中動植物、無生物化為人而進入人的世界與人交流的故事，其思想性質、文學技巧雖紛然雜陳，但普遍都可尋繹出神話原始思維的存留。初民的世界同一觀依舊在小說創作者的心靈之中，才会有物類化為人形蠱惑世人或與人為友，甚至與人結為夫妻等諸種交流的型態。」<sup>296</sup>西湖小說作品中，

---

<sup>292</sup> 《武林舊事》卷3「觀潮」條，頁381。

<sup>293</sup> 張荷：《吳越文化》，頁34。（瀋陽：遼寧出版社，1991年）

<sup>294</sup> [東漢]趙曄：《吳越春秋》，《四部備要》據平津館本第288冊〈句踐陰謀外傳第九〉（台北：中華書局，1981年）

<sup>295</sup> 《吳越春秋》之〈闔閭內傳第四〉。

<sup>296</sup> 劉雪貞：《傳統小說中狐妻故事之研究》，頁20。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2年。

以動物變形<sup>297</sup>為情節主軸的故事，共有狐、猴、蛇等動物變形類型，其中以蛇類為最多。最早的作品是《六十家小說》卷3〈西湖三塔記〉、〈李元吳江救朱蛇〉。明代馮夢龍將後者改編為〈李公子救蛇獲稱心〉，然後又創作出膾炙人口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之後，西湖墨浪子將該卷改編為〈雷峰怪蹟〉，甚至又有玉花堂主人《雷峰塔奇傳》將故事繼續敷衍而下。以〈李元吳江救朱蛇〉為例，描述李元因救了一條小蛇，沒想到那條小蛇竟是龍王之子化身，為報答李元救命之恩，龍王將一位龍女賜予他，助其金榜題名、仕途亨通。從這則故事中，應證當地對水的信仰，因而產生了水神的崇拜，稱它們為龍王，將蛇視為其子孫的化身。

另外，在〈西湖三塔記〉、〈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等故事，主要敘述蛇賦有特異能力，幻化成人形後，擾亂人世間的原有的次序與和諧。這些故事經過不斷流傳與改編，應證當地人將蛇看待成有靈的東西，對它存有神秘感和恐懼感的複雜心理。這些蛇變形故事，進一步透露著當地文化與蛇信仰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符合讀者的閱讀心理。值得一提的是，並非越人有蛇的圖騰信仰，多數的南方蠻夷地區對於蛇都有相同複雜心理。

---

<sup>297</sup> 恩斯特·卡西勒著，甘陽譯：《人論》，曾試圖從神話思維的角度去解釋「變形法則」，他認為「原始人……他們的生命觀是綜合的，不是分析的。它被看成是一個不中斷連續整體，容不得任何涇渭分明的區別。各不同領域間的界限並不是不可逾越的柵欄，而是流動不定的。在不同的生命領域之間絕沒有特定的差異。沒有什麼東西具有一種限定不變的靜止型態……由於一種突如其來的變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轉化為一切事物。如果神話世界有什麼典型特點和突出的特性的話，如果它有什麼可以支配它的法則的話，那就是這種變形的法則。」頁121。（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



## 第二節 地域意識之建構

在上一章中已證實西湖小說的作者，多半為杭州人或是久居於當地文人。真實姓名者，有《西湖二集》周清原、《型世言》陸人龍、《十二樓》李漁，化名者有《西湖佳話》古吳墨浪子、《歡喜冤家》西湖漁隱主人、《二刻醒世恆言》心遠主人、《豆棚閑話》聖水艾衲道人等。因此西湖或杭州是他們最了解的、熟悉的地域空間，如此一來，描述當地所發生的人、事、物，自然格外得心應手也特別生動、準確。正如老舍所言：

我們所最熟悉的社會與地方，不管是多麼平凡，總是最親切的。親切，所以能產生好的作品。到一個新的地方，我們很能得一些印象，得到一些能寫成很好的旅記的材料。到印象總歸是印象，至好不過能表現出我們觀察力的精確與敏銳；而不能作到信筆寫來，頭頭是道。至於我們所熟悉的地點，特別是自幼生長在那裏的地方，就不止於給我們一些印象了，而是它的一切都深印在我們生活裏，我們對於它能像對於自己分析得那麼詳細，連那裏空氣中所含的一點特別味道都一閉眼還想像的聞到。<sup>298</sup>

尤其杭州乃歷史古都，人文薈萃。文人作家不禁常懷念此地悠久的歷史，對當地地理環境與傳說軼聞均有深刻的認識與體會。因此這些文人作家對自己生長或久居的地方有強烈的自覺，形成與他地區隔的內在意識，正所謂地域意識。它驅使文人作家，書寫「西湖小說」之關鍵所在。在小說之字裡行間中，深刻地流

---

<sup>298</sup> 老舍：《老舍論創作》，頁 76。（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年）

露出鄉土情懷的抒發，尤其在面對特殊地理景觀下，懷想背後的歷史記憶、前人先賢的典範，自然興起「地傑人靈」的自詡。

## 一．鄉土情懷的抒發

### （一）讚頌杭州山水

任何人對於生長或久居的土地，自然會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尤其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感情更是濃的化不開。西湖小說作家，同樣擁有這樣的感受。不同的是，他們生處的城市，乃全國聞名遐邇的好地方 - 杭州。有引以為傲的自然景觀，更有與之相應的人文風采。尤其西湖妙境天成，冠絕宇內，不僅有山水之勝，還具有豐富的文物古蹟，呈現出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和諧交融。自唐以來多少詩人墨客為它題詠、讚嘆。到了宋室南渡後，杭州的發展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從此奠下文化古城的基礎。直到民初，學者蔣夢麟《西湖》一書中亦稱杭州「在古文化上，杭州有點像北京，因為它是『學人之省』的首府。」<sup>299</sup>說明杭州處處流露出濃厚文人氣息。不管人文、風景都為外地人所稱羨。就連四季景色，都別具特色。《西湖二集 序》

春則桃李呈芳，夏則芙蓉設芳，秋則桂花拖香，冬則白雪幻景，其雨既奇，其晴亦好，白日固可遊覽，夜月尤屬幽奇，不聞其有不備之美也。

這樣四季分明，各有特色的人間勝景。背後更有著悠遠的歷史、富庶的經濟環境，人文薈萃的優秀條件。小說作家俯仰而斯，不禁時時流露出對這塊土地的豐沛的情感。希望透過作品的流傳，顯揚山川之靈秀與磅礴。小說中，有的是寥寥數句的讚嘆，如《西湖二集》卷1〈葛嶺仙蹟〉描寫葛洪「直至臨安，見兩峰

---

<sup>299</sup> 蔣夢麟：《西湖》第二十四章〈杭州、南京、上海、北京〉，頁167。（台北：金川出版社，1983年。）

與西湖之秀美，甲於天下。」有的是長篇大論當地的山水風光，如《西湖佳話》卷4〈靈隱詩蹟〉描寫杭州之一勝景靈隱寺為「這南北高峰上，有浮屠七級，遠眺則群山屏列，湖水鏡浮；……秋冬則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起，水與階平。坐而玩之，物無遁形。亭前峭壁，皆鑿世尊羅漢，真是神工鬼斧。」前前後後共四、五百個字，煞費苦心。

當然除了用散文字句表達對鄉土的情懷，小說中也時常可見作者化身為故事中主人翁，吟詠詩詞來讚嘆杭州的地理景觀，和豐富人文資產。由於這份對鄉土熱愛，延伸出文人身居於此的自豪、優越感。激發他們用小說俚語來為杭州作地方誌的意圖，來保存豐富文化、理解鄉邦典故，或是傳述故舊史實。如此一來，透露出作者「捨我其誰」的使命感。

《西湖二集》序中有云：「吳越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載，流風遺韻，古蹟奇聞，史不勝書，而獨未有譯為俚語。」認為杭州從吳越王建國，到南宋定都於此，杭州的「古蹟奇聞，史不勝書」，可是卻沒有一部是用通俗的「俚語」（小說）來書寫，適合平民百姓來閱讀的作品。如此一來，得以凝聚鄉里居民的地方意識，喚起對這片鄉土的認同感。

文人作家除了有意識地記錄鄉里舊聞的用心。另一方面，由於當地有大量的地方志書及鄉邦文獻，故使文人有著「以地為重」的地域情感，促使他們將想法化為行動。古吳墨浪子在《西湖佳話序

幸古人之美蹟猶存，品題尚在……。但有其蹟，而不知其蹟之所從……。

因考之史傳誌集，徵諸老師宿儒，取其蹟之最著、最佳這而紀之。

他收集小說題材，對於過去歷史名人寓遊當地所遺留的古蹟，自然不能放

過。慎重起見，還費心「因考之史傳誌集，徵諸老師宿儒」。同樣地，當地風土民情和市井小民的現實百態都成為小說書寫的對象。透過小說作家的書寫，在在都顯示他們對當地山水的讚賞與情感。

## （二）今古興亡的歷史感受

「西湖小說」小說中常見作者有今古興亡之歷史感嘆，主要因杭州無所不在的古蹟裡，遊走於山水間斷石殘垣，顯現出歲月的痕跡。這些自然景觀對文人作家而言，並非只是單純的旅遊勝景（空間）。背後蘊藏著對古今歷史的懷想和昔日文人的追憶，因此「山水」對他們已形成出一種特殊的意義。因此學者夏鑄九就深刻說道：

空間、歷史與社會所交織成的研究領域中，空間必須包含在歷史之中，我不能想像沒有空間向度的歷史。事實上，歷史是由人類行動所建構的空間與時間之間的連續性互動，一個充滿衝突的形成過程。<sup>300</sup>

歷史興亡的感嘆，雖然指向時代變遷的無情，但是其內涵也反映出借古諷今的意圖。其表達方法有的是直抒胸臆，或是隱喻的形式呈現出昔是今非的興亡感。主要是西湖小說的作家群，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的亂世下，同時他們幾乎又是窮途潦倒的讀書人，根本無法力挽狂瀾，改變時代更替。因此小說中時常流露出他們對政治腐敗、社會弊端叢生的憂心，於是將古今歷史教訓，化為小說俚語傳世。

話說當地最早的歷史更替，無非就是吳越爭雄的故事，小說中常見春秋那時代的歷史人物穿插其中，有闔閭的霸圖，范蠡的瀟灑，西施、夫差的軼事。當然

---

<sup>300</sup> 夏鑄九等：《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47。

也會對歷史作個回顧總結。在《古今小說》卷 22〈木綿庵鄭虎臣報冤〉就將宋高宗比擬成吳王夫差：

西湖有三秋桂子，十里荷香，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說不盡許多景緻。……因此君王耽山水之樂，忘社稷之憂，恰如吳宮被西施迷惑一般……以致越兵來襲，國破家亡。<sup>301</sup>

從上所論，馮夢龍認為南宋的滅亡是自取的。《西湖二集》卷 1〈吳越王再世索江山〉，作者周清源更是對宋高宗無情的批判寫下：

並不思量去恢復中原，隨你宗澤、岳飛、韓世忠……苦口勸他恢復，他只是不肯，也不肯迎取徽、欽宗回來，立意聽秦檜之言，專以和議為主，把一個湖山粧點得如花似錦一樣，朝歌暮樂。<sup>302</sup>

雖然，周清原不敢直言將成當時的君王比擬成宋高宗，斬釘截鐵地說貪圖玩樂享受，不知民間疾苦，終有一日會導致「國破家亡」。但是，身為文人自我期許，面對古今歷史更替，除了有今古興亡的感嘆外，對政治與社會的關懷，藉著小說的書寫，表達出借古諷今的意涵。

## 二．崇慕先賢典範

本論文第三章有一節專門討論西湖小說中歷史人物。綜觀這些歷史人物，近則是出生於杭州當地人，遠則更擴及整個浙江或是在此宦遊或寓居的人物。這些歷代先賢名士，一直為當代文人尊崇的典範。從小說的書寫，

---

<sup>301</sup> 《古今小說》卷 22〈木綿庵鄭虎臣報冤〉，頁 326。

<sup>302</sup> 《西湖二集》卷 1〈吳越王在世索江山〉，頁 31。

將他們的事蹟、功勳主要可分為「政事」、「忠義」、「文才」、「隱逸」四大類：

忠義： 岳飛、于謙、王禕、伍子胥

政事： 褚遂良、錢鏐、宋濂、劉基、商輅、胡宗憲

文才： 白居易、蘇東坡、羅隱

隱逸： 葛洪、林和靖

對於這些先賢名士的景仰和懷念，大半都落實在特定的某個特殊象徵物，如建祠蓋廟或興墓立碑。南宋人吳自牧在《夢梁錄》就記載「古今忠烈孝義賢士墓」<sup>303</sup>，詳細列出每個賢士墓位置所在。當地較著名有四處：其一「三賢堂」<sup>304</sup>為了紀念白居易、林和靖、蘇東坡三人所建。其二「岳王廟」，當然是紀念抗金名將岳飛。其三「伍子胥廟」<sup>305</sup>紀念春秋吳國忠臣伍子胥等。其四為「忠節祠」<sup>306</sup>紀念褚遂良、于謙等。藉著外在的祭祀行為，除了表達對先賢名士追思懷念外，更標榜他們的事蹟和典範，期許後世永遠效法追隨。如周清原在〈三臺夢蹟〉除了讚譽于謙忠勇愛國、臨危不懼，並以西湖的正氣來比喻之，有云「吾所謂正人之氣，若鬱鬱不散，又能隱隱躍躍，而發為千古之徵兆者，此也。以此知西子湖靈秀之氣中，有正氣為之主宰，故為天下仰慕不已耳。」來表達他對於謙的追思景仰。

又如，唐代詩人徐凝遊歷了西湖邊吳山上伍子胥祠堂，不由自主回憶起吳、越爭霸歷史。赤膽忠心的伍子胥雖然成為悲壯的犧牲者，但是百姓

<sup>303</sup> 《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之《夢梁錄》卷14「古今忠烈孝義賢士墓」條，頁259。

<sup>304</sup>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卷1「三賢堂」條，頁26。

<sup>305</sup>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卷1「伍子胥廟」條，頁28。

<sup>306</sup>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12〈南山城內勝蹟〉，頁159。

卻從來沒有忘記過他，到此祭拜追念的人絡繹不絕。於是他感慨寫了〈題伍員廟〉一詩：

千載空祠雲海頭，夫差亡國已千秋。

浙波只有靈濤在，拜奠青山人不休。<sup>307</sup>

現在，杭州市也極力塑造優勢人文的地域意識，除了加強歷代故蹟的保存維護外，更大興土木建造當地近代名人紀念館，如在蘇堤的盡頭，南屏山下，就有國學大師章太炎（1869-1936年）墓，又有先生的紀念館。另外在西湖旁虎跑山上，有個傳奇人物弘一大師的紀念館，大師俗名叫李叔同（1880-1942年），他原本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任教，在39歲時，毅然決然來到虎跑寺出家，從此修行佛門中最艱辛的律宗。

崇慕歷代先賢名士的用心，進一步地說「一個地域要保持向心力，需要塑造古典偶像以形成文化的優勢。將地域中著名的人物作為偶像，可以增強地域文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從文人時時以欽慕之情描述前世代文人之風采，可以發現他們對當地先賢前輩之敬重。」<sup>308</sup>所以，不是生硬地記憶當時歷史，而是藉此表彰先賢名士之人文精神，形成當地的人文典範。

對先賢名士的追思，當地市井居民已經融入日常生活中，在特定的日子，上祠廟祭祀，表達對他們懷念。然而，先賢名士的對當地文人而言，更有深刻的意涵。經過歷史的嬗變，杭州山水孕育出多少能人賢士，或是吸引多少文人墨客，為它陶醉歌頌，激發當地文士有身處文化淵源流長的優越感。同時，外地的文士對於杭州人文薈萃的優越環境，不禁也投注欽

---

<sup>307</sup> 《西湖詩詞》，頁19。

<sup>308</sup>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 - 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頁174。

羨的目光，如有明一代湖北人袁宏道在寫給杭州友人的信中，其中有一段寫道：

虎林，名郡也。昔白太傅入洛陽，猶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

足知

杭之佳麗也。然唐時為太守者，公事之餘，放情山水，歌黛與煙嵐共翠，笳鼓與松風間作。蘇和仲為守，每出遊時，分曹徵妓，鳴金聚食，杭州至今以為美談。<sup>309</sup>

當地文人對於歷代名人賢士的懷念追思，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有的刻銘立碑，有的用詩歌表達。對西湖小說作者，如周清原、古吳墨浪子之輩，透過通俗小說的書寫，廣泛流傳到民間階層；不管如何，他們的共同之處，皆為褒揚先賢名士的人文典範，塑造地域的文化偶像。如此一來，透過他們的書寫創作，將過去的歷史典故，成為人們生命中共同的記憶。

值得一提，這些歷代先賢名士標榜不同的事蹟、功勳，但有個共通的根本處，就是「以人為本」的生命關懷。有的表現在政事，如忠君愛國、勤政愛民的行徑；有的表現在文才方面，如用詩文表達出社會的動亂，人民生活的困境。西湖小說的作者，在書寫的過程中也汲取「以人為本」的養分。作品大半呈現的是現實生活中人生百態，以人為著眼點，其中的「人」，尤其針對普遍的市井小民階級。呈現出他們對抗災難、疾病，面對人生挫折、困頓，展現出堅忍不拔的意志力，令人動容。

綜上所論，崇慕歷代先賢名士其文化意義，當有三項可以列舉。其一：對先

---

<sup>309</sup>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之〈袁中郎尺牘〉中「與李杭州」，頁74。（台北：世界書局，1964。）



輩名士之懷念。尤其在特定的地理景觀或紀念他所建的祠廟，如「蘇堤」 - 蘇東坡、「白堤」 - 白居易、「孤山」 - 林和靖、「岳王廟」 - 岳飛等。透過這些景觀或祠廟的建立，使先賢名士成為當地不朽的典型風範。其二：凝聚地方意識。塑造歷史人文偶樣，標榜他們忠孝節義的性格，形成強烈的文化優勢，並希望文化風氣能代代相承，期許當地營造人才輩出的文化氛圍。其三：「以人為本」的生命關懷為自許。

### 三．地靈人傑的自詡

閱讀西湖小說的作品，強烈流露出作家身為一個杭州人，懷著讚美自己母親的心情，向讀者敘述在這塊土地上，曾經演繹過的歷史故事。如果從秦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 210 年）設立錢塘縣算起，杭州已經有 2200 多歲了。先後有兩個朝代定都於此，分別是五代十國時的吳越國及南宋。如此一來，確立杭州成為全國重要的文化領導重鎮。學者劉子健就清楚指出這樣的文化現象：

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以江浙一帶為重心。……南宋定都杭州，經濟更繁榮，文化更高。政治經濟重心都聚在一起，這重心是史所稀見的。同時，這文化的型態，也和之前不一樣了。<sup>310</sup>

杭州位居文化領導的重要地位，背後自然有著豐富的人文資產，有林立的書院，興盛的刻書、藏書風氣等有利條件，促成當地才子輩出的盛況。除了優勢的人文環境，更有著秀麗的湖光山色，無怪乎，會有「人間天堂」之美稱。然而，杭州人物之盛，並非從南宋開始。北宋王安石遊歷杭州時，就寫了〈杭州呈勝之〉一詩，云「游觀須知此地佳，紛紛人物敵京華。林巒臘雪千家水，城郭春風二

---

<sup>310</sup> 劉子健：〈略論南宋的重要性〉，頁 63。刊於《大陸雜誌》第 71 卷第 2 期 1985。

月花。」<sup>311</sup>同時沈括亦有言「杭為大州，當東南百粵之會，地大民眾，人物之盛，為天下第一。」<sup>312</sup>

南宋時，杭州不論是經濟、政治、文化都推向頂峰。《夢梁錄》卷十七「歷代人物」就一一列出 150 餘人，這些人乃「歷代英傑，文武賢良，進士隱士之秀，兼之博學精華，忠勇孝義之才，或身廉而直道以事，或職顯而位居三公……或建立大功，終事中國，終節盛名，青史不朽。」<sup>313</sup>藉著這些人物的表彰，總結出「杭城湖光山色之秀，鍾為人物，所以新奇傑特，為天下冠。」<sup>314</sup>乃其他地區所不能相及。

杭州山水孕育出許多的賢人奇士，當地文人形成了因地自豪的優越感。正是「地靈人傑」的內在意識。這樣意識在西湖小說的作品中，也時有所見。流露出作家對鄉土人文的自許。尤其在書寫當地先賢名士的出生，總難免附會添加一番。墨浪子在《西湖佳話》自敘有云「宇內不乏佳山水，能走天下驚。思天下若渴者，獨杭之西湖。」稱西湖山川之秀，乃天下之首。接著更進一步說到「西湖得人而顯，人亦因西湖以傳。」強化出山川與人才的交互作用，地出人才；人顯山川的觀念，說明兩者相生相應之關聯。

同書中，以明代忠臣于謙為例，認為他降生於杭州，有其必然性，並非偶然。因為「西子一湖，晴好雨奇，人盡以為此靈秀之氣所鍾也。靈秀之氣結成靈秀之山水，則固然矣；熟知靈秀中原有一派正氣在其中，為之主宰，方能令山水之氣，醞醞釀釀，而生出正人來。」<sup>315</sup>從文句中，昭示出「地靈人傑」的自我意識，于

---

<sup>311</sup> 《西湖詩詞》，頁 43。

<sup>312</sup> 〔宋〕沈括：《長興集》卷 24「杭州新作州學記」條，頁 1117-315。《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7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sup>313</sup> 《夢梁錄》卷 17「歷代人物」條，頁 273。

<sup>314</sup> 同上，頁 272。

<sup>315</sup> 《西湖佳話》卷 8《三臺夢蹟》，頁 142。

謙乃山川靈秀之氣的化身，與人間凡夫俗子是截然不同的。

湖海士在《西湖二集》的序中<sup>316</sup>，同樣自豪地表示「天下山水之秀，寧復有勝於西湖者哉！」認為何處能與之媲美。作者周清原也以明代忠臣商輅為例，說到「自商輅中三元以後，浙江科名遂盛於天下，江西也便不及。此是浙江山川氣運使然，非同小可之事。」<sup>317</sup>科舉考試要能金榜題名，已經是非常之人，尤其連中三元（解元、會元、狀元），更是難如登天。有明一代，只出現二個，一個是許觀<sup>318</sup>，一個便是商輅。作者對此也認為，商輅得自「山川氣運」之助。

縱上所論，「西湖小說」的作品中，不難發現作者時時流露出地靈人傑的自詡之情。他們看待山川與人文的相應具有密切關聯，如此一來，更有益凝聚當地的地域意識，顯現出生長於斯的優越感。從另一個視角來看，作者對當地先賢名士的書寫，也透露出對自身的期許，希望自己能成為後代追憶的昔日「人傑」，不要辜負這靈秀的山川。

---

<sup>316</sup> 近代學者一致認為《西湖二集》卷首湖海士的序，作序者是周清原的老師虞淳熙。經考證虞淳熙同樣是浙江錢塘人，萬曆年間進士，官至吏部稽勳郎中。張淑芬：《周清原《西湖二集》研究》，頁 8-9。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4 年。

<sup>317</sup> 《西湖二集》卷 18《商文毅決勝擒滿四》，頁 142。

<sup>318</sup>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辛未中狀元，乃南直隸池州貴池縣人。

## 第六章．結論

「西湖小說」從宋元話本開始，到明末時達到顛峰。本文採用地域文化和敘事學的角度，去分析探討「西湖小說」，希冀能從其發展背景、內容探析、藝術技巧、文化內涵等方面，發掘與其他話本的異同處，及掌握其文化意蘊和時代精神。依本文研究，得到以下幾個觀察結果：

### 三．發展背景：

回顧白話短篇小說的發展，不難發現，有幾過特定的城市出現，溯源宋元話本，常見的有北宋的國都東京（汴京），和南宋的「行在」杭州。形成了小說中城市的興起。明代中葉後，隨著江南經濟商業的發展，新興城市如蘇州、揚州等地迅速崛起，話本小說也大量出現以新興城市為書寫的空間。綜觀話本小說史的演變軌跡，杭州作為小說創作的一個中心，時間上是最長久的，作用也可以說是最大的。

「話本」的產生，乃溯源至口頭技藝「說話」的底本。之後，話本承襲自說話的口頭敘述藝術，作品自然呈現出城市特性，成為都市文化的一種類別。故小說的興起，與城市的產生、市民的文化娛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城市的興

盛又與其歷史發展、地理環境、文化背景等三方面有緊密關聯性。

杭州在五代時為吳越國都，成為長江以南的文化、經濟中心之一。北宋時因山水勝景、人口繁密，被譽為「東南第一州」。南宋時更為朝廷所在地，人文薈萃、商賈集聚，故躍升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尤其當地土地肥沃、氣候溫和，乃是富有盛名的「魚米之鄉」。而且大量種植綿、麻、桑等經濟作物，為手工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料，促進經濟的發展，杭州自然地成為著名的絲織中心。同時，交通上又有大運河聯絡南北，方便了全國貨物、商賈的往來。

杭州除了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繁榮的商業貿易外，優勢的文化背景更是加速「西湖小說」的發展。因為因歷史朝代的不同，曾經設有各類學校，從南宋國子監到府、州、縣學，以及各類書院。當地自古又是刻書、藏書的重鎮。如此一來，有利於知識的傳播、文化的保存。尤其西湖是聞名遐邇的旅遊勝景，具有秀麗的湖光山色，多少文人名士為它歌詠讚嘆。由上觀之，「西湖小說」的繁榮並非偶然的，主要得益於杭州悠久的歷史，有關的傳說、軼聞及文獻典故可說是汗牛充棟，信手拈來都是精采的故事。城市的繁榮和文化的興盛，更是吸引文人墨客長期定居於此，因此「西湖小說」作家有的是當地人，有的是長期寓居杭州的外地人，但他們同樣將目光投注於這片俯仰於斯的土地，就地取材，編撰小說。他們的努力，呈現出「西湖小說」蓬勃的生命力。

#### 四．內容探析：

本文所討論的「西湖小說」，共收錄一百一十卷作品，探討這些作品的題材比重，可以概分為三大題材。其一為講史類，主要以當地歷代名人賢士為主人公，而且這些人物幾乎都與當地景觀有密切關聯，甚至結合。如西湖上「蘇堤」、「白

堤」，或湖畔「岳王廟」等，當親身遊歷於這些地理景觀中，背後蘊藏的歷史的軼事，油然浮現腦際，彷彿置身於前賢時流所共同經營的文化氛圍之中，自然地引起複雜感受和思緒。進一步地說小說家對西湖的書寫，他們所要強調的不僅是當地湖光山色（自然山水），而是山水背後的歷史記憶（人文山水）。藉著特殊景點以聯繫相關歷史人物，或是由山水去懷想曾經在此任官、寓居的名人才士。

其二為宗教類，主要分為以佛道人物為主角和宗教信仰方面。在杭州，宗教的影響力仍以佛、道教為最。尤其在宋朝南渡後，寺廟增為四百八十所。當地人的生活習尚，與佛教信仰緊密結合。如西湖又名「放生池」，及每年農曆二、三月盛大的祭祀活動，取名為「西湖香市」。附近城鎮的居民都共襄盛舉，來此祭拜。這些宗教的信仰，都寫實地記載在「西湖小說」中。另外，濟顛和尚原是當地盛傳的一位特異高僧，經過小說渲染、改編。濟顛的故事，甚至自成系列，流傳在民間。故濟顛和尚可說是西湖小說所產生一個獨具鮮活個性的宗教人物。再將西湖小說中佛道人物與其他小說比較，在書寫上會突顯出故事發生的地理景觀。如〈吳山頂上神仙〉 - 吳山、〈葛嶺仙蹟〉 - 葛嶺、〈靈隱詩蹟〉 - 靈隱寺等。其實將這些地理景觀匯聚起來，彷彿漫步在西湖周邊的廟宇，聽著作者講述著該寺廟傳說軼聞，給人身歷其境的感受。

最後為愛情類題材，就西湖小說而言，作者大半會預設場景 - 西湖，因為湖上熱鬧繁華自然吸引了許多當地人或是外地人的賞玩、駐足。因此成為小說中男女主人公邂逅的絕佳環境，進一步兩人產生愛戀，讓情節得以順利開展。從另外一個視角而言，作品中也呈現出男主人公遊玩西湖時，期盼與佳人相遇的心理。另外，有許多故事融合著杭州當地的習俗。當然，這是作者有意識地安排，將特定的節日習俗穿插在作品當中，其中包含著深層的意涵，呈現出主人公複雜的心理，有時也視為情節發展的一個轉機。在敘事時間方面，有相當大比率設定外部時間刻度在南宋。其實已顯現時間人文化情形，因為南宋這個時期，對杭州而言

是歷史性的黃金時期，相對地影響到文人心理，蘊藏著對那段歲月的憧憬和嚮往。最後，男女主人公的身分主要集中在文人與妓女的敘述模式，尤其是失意的文人，遇上能「識英雄」的妓女，從此生活得以改善，之後更能順利金榜題名，踏上仕途。

## 五．藝術技巧：

首先探討「西湖小說」與其他話本小說異同之處，呈現其傳承與超越的歷史軌跡，主要從四個方面著眼。其一在創作動機方面，「西湖小說」作家從事編撰小說原因有，無非是（1）社會教化（2）市場需求（3）揭露社會黑暗面（4）地域意識抬頭等因素。其二入話與正話的關聯性，早期宋元話本中西湖故事，受口頭文學的影響較深，因此入話與正話內容關聯不太，其作用也未能適切明白彰顯出來。隨著話本小說的發展，作者在構思時越見巧思，顯現出個人獨創意識。如果以時間順序觀察入話演變，其形式和思想，愈趨複雜也愈趨密切。尤其以《十二樓》、《豆棚閑話》等書問世，更可見作者巨匠巧思。從上所論，反映出作品的書面性和雅化的趨向，與早期的「說話」話本，越行越遠。

其三關注其敘事方式，話本小說一直遵循著「說給人聽」的講述方式，故作者採用第三人稱的全知敘述觀點，因此他對故事中一切無所不知。「西湖小說」的作者有意識在每篇故事正文開端，通常會或多或少將杭州吹捧、介紹一番。而且會引用一連串真實的地名，穿插在作品當中，用來召喚讀者，喚起其對杭州的親切感，及加強故事的真實性，如此一來更突顯出小說的地域色彩。其四詩詞運用，閱讀「西湖小說」時近一步發現有幾首詩詞，已成為西湖故事中常用的套語。如南宋人林升所作〈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

游人醉，指把杭州作汴州。」和蘇東坡〈飲湖上初晴後雨〉「湖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而且，藉著它們適切的運用，使作品自然烘托出特有的文化氛圍。除了散文部分，作者也會引入當地真實地名在詩詞之中，有時利用西湖名勝為題，或是穿插在詩文當中。另外，作品當中時常可見以前詩詞名句靈活生動地運用在小說中，除了將成功地烘托出主人公的心理感受外，更賦予舊有詩詞名句新的生命力，傳播在民間市井階層。

接著，綜觀「西湖小說」的故事，呈現給讀者有如《杭州風俗志》感受。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文人還是官宦，商賈還是雜役，芸芸眾生，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做為整個城市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點綴著城市生活的色彩，構成一幅色彩斑斕的杭州社會圖卷。從中我們輕易瞭解當地市民生活的樣貌。同時作品也反映出杭州的社會組織結構，和市井小民實際從事行業，這是在正史上所不易見到，更顯得可貴、生動許多。作品中，時有所見方言俚語出自主人公的口中，使得故事充滿通俗活潑的生活氣息。這些方言俚語往往帶有大量與當地景觀有關的語匯，更彰顯出當地的地域色彩。另外，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風俗習尚的差異，具有強烈的地方特色。舉凡食、衣、住、行等生活方式和節日習俗，「西湖小說」都會生動靈活的應用在情節當中。最後，值得一提是南宋時杭州呈現「東京化」的現象，這主要的原因是隨著宋室南渡的東京（汴京）移民，他們從貴族士紳到平民百姓皆有。因為他們對東京的眷戀和記憶，引導著杭州的風俗習慣，朝向「東京化」趨勢，這種情形也體現在「西湖小說」的作品中。

最後，回歸到故事情節的安排，「西湖小說」繼承傳統小說常中出奇的美學追求，有別的是取材多半來自百姓真實生活的題材。經過作者匠心獨運之後，竟可化平淡為神奇，呈現出翻新出奇，層層深入的情節結構。另外，「奇」與「巧」如同「磁」與「鐵」，不可分開才会有作用，應證了「無巧不成書」的道理。在「西湖小說」中每一作品，或多或少都運用到巧合的手法。讓故事情節峰迴路轉、引人入勝。然而，小說構思安排的最大困難，是追求情節的跌宕曲折、奇巧不斷



的同時，要能兼顧作品的真實性，使情節的發展，令讀者可信。所謂真實性，乃要兼顧到兩方面，首先要合乎當時社會的人情事理，符合所處具體生活環境。另外，要符合人物的性格特點，不能前後矛盾，無法統一。總而言之，作者在構思題目或是內容須要求奇穎、獨特外。情節的安排更見巧合的手法，製造出曲折動人、高潮迭起的藝術效果。同時情節的真實性更不容忽視，要合乎當時社會環境和人物性格，才會使讀者有確實、逼真，歷歷在目的感受。

#### 四．文化內涵：

杭州的文化主要被三種水孕育、導引著，分別是錢塘江、運河、西湖。據近代學者研究，杭州屬於河姆渡文化的發源地，時間上它更早於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故它象徵著中華文明長江流域以南的文化特色。繼而在《越絕書》《吳越春秋》書中，應證越國人蛇的圖騰信仰。其信仰也表現在越人的蛇（龍）紋身習俗。在「西湖小說」作品中，有關於蛇的圖騰信仰已消褪無形。取代的是其動物變形為情節主軸的故事。從這些故事透露出當地居民對水的敬畏，因而產生了水神的崇拜，稱它們為龍王，將蛇視為其子孫的化身。之後，有些故事如〈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敘述蛇賦有特異能力，幻化成人形後，又注入現實文化因素，從而締造一個頗具人文色彩的幻想世界。這些動物變形故事經過不斷流傳與改編，符合當地人將蛇看待成有靈的東西，對它存有神秘感和恐懼感的複雜心理。

運河，這條攸關全國經濟的黃金水道，每天送往迎來多少貨物、商賈，促進了沿岸城鎮的發展，位居大運河終點站的杭州，無形地受運河經濟文化的氛圍影響，開啟居民新的視野和價值觀，金錢和現實享樂成了追求的目標，因此社會風氣充斥著驕奢淫逸的商業氣息，傳統倫理價值觀和標準，不再如牢籠般束縛人民的行為。「西湖小說」中就有不少作品，描述主人公枉顧傳統道德教訓，極力追求財、色的故事，寫出活生生的現實百態。作品進一步突顯出重視個人享樂和

滿足，藐視傳統倫理綱常的價值觀。

西湖的美馳名中外，歷史上不知吸引多少詩人詞客為它歌詠讚嘆。儘管他們身份不同，有的入仕為官，有的是孑然一身。但相同的是，在閒暇之餘嚮往自然恬靜的山水風光，尋求一種安頓自我的方式。實踐「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理想。西湖，是他們心中絕佳的去處。面對這山明水秀的人間天堂，心境格外瀟灑、超脫起來，更容易激發他們創作的靈感。山水本是無知的，但對遊覽山水的文人雅士，卻是有知的。各有各的興懷、感受。不管如何，遊覽有助於讓人心胸更為寬闊，重新省視人生的意義，喚起生命的自覺。因此歷史上文人墨客，或是「西湖小說」中才子文士，西湖都是他們嚮往已久的天堂，無不呈現出以一遊西湖為幸的心理。

「西湖小說」的作者，多半為杭州人或是長期寓居當地的文人。他們對這塊生長或久居的土地，自然有一份強烈的熱愛與感情。尤其杭州是譽貫古今的名城，歷史悠久，人文薈萃。因此這些文人作家會有強烈的自覺，形成與他地區隔的內在意識，正所謂地域意識。這樣意識乃驅使文人作家，書寫「西湖小說」之關鍵所在。另外杭州「流風遺韻，古蹟奇聞，史不勝書，而獨未有譯為俚語。」激發他們用小說俚語來為杭州作地方誌的意圖，來保存豐富文化、理解鄉邦典故，或是傳述故舊史實。如此一來，賦予作者「捨我其誰」的使命感。

在小說中常見作者有今古興亡之歷史感嘆，主要因杭州無所不在的古蹟裡，遊走於山水間斷石殘垣，顯現出歲月的痕跡。這些自然景觀對文人作家而言，並非只是單純的旅遊勝景。背後蘊藏著對古今歷史的懷想和昔日文人的追憶，歷史興亡的感嘆，雖然直接指向時代變遷的無情，其內涵也反映出對當時政治與社會的憂心，藉小說的書寫達到借古諷今的意圖。

綜觀小說中歷代先賢名士，他們一直為文人作家尊崇的典範。從小說的書寫，將他們的事蹟、功勳主要可分為「政事」、「忠義」、「文才」、「隱逸」四大類。對於這些歷代人物的景仰和懷念，大半都落實在特定的某個特殊象徵物，如建祠蓋廟或興墓立碑。藉著外在的祭祀行為，除了表達對先賢名士追思懷念外，更標榜他們的事蹟和典範，期許後世永遠效法追隨。主要是，一個地域要保持向心力，需要塑造古典偶像以形成文化的優勢。將地域中著名的人物作為偶像，可以增強地域文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儘管歷代先賢名士標榜不同的事蹟、功勳，但有個共通的根本處，就是「以人為本」的生命關懷。「西湖小說」中作者也汲取這個人文傳統。作品大半呈現的是現實生活中人生百態，以人為著眼點，其中的「人」，尤其關注普遍的市井小民階級。呈現出他們對抗災難、疾病，面對人生挫折、困頓，展現出堅忍不拔的意志力，令人動容。

小說中常流露出作家對鄉土情懷的抒發，由於這份對鄉土熱愛，延伸出文人身居於此的自豪、優越感。尤其，杭州山水孕育出許多的賢人奇士，自然形成了因地自豪的內在意識，正是「地靈人傑」的自詡。小說中更清楚指出于謙、商輅等名臣，無非不是當地靈氣化育而成，強化出山川與人才的交互作用，地出人才；人顯山川的觀念，說明兩者相生相應之關聯。



附錄（一）

西湖白話短篇小說 一覽表

書名	篇名	卷數	作者	題材	時間	備註
六十家小說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	1	洪楸編	婚戀	北宋	
	西湖三塔記	3		宗教	南宋	
	風月相思	9		婚戀	明	
	五戒禪師私紅蓮記	13		宗教	北宋	
	勿頸鴛鴦會	14		婚戀	北宋	
	錯認屍	18		婚戀	北宋	
	李元吳江救朱蛇	26		宗教	北宋	
京本通俗小說	碾玉觀音	10	繆荃孫刻本	婚戀	南宋	
	菩薩蠻	11		宗教	南宋	
	錯斬崔寧	15		公案	南宋	
西廂記	錢塘夢	書後附刊	不詳	婚戀	南宋	參見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所轉錄之全文。
熊龍峰四種小說	馮伯玉風月相思	1	熊龍峰刊	婚戀	南宋	同《六十家小說》之<

			行			風月相思>。
	張生彩鸞燈傳	2		婚戀	南宋	同《古今小說》卷 23 <張舜美燈霄得麗女 >
	蘇長公章臺柳傳	3		婚戀	北宋	
	孔淑芳雙魚墜傳	4		婚戀	明	
萬錦情林	裴秀娘夜遊西湖記	6	余象斗	婚戀	南宋	今參見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所轉錄之全文。
古今小說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3	馮夢龍	婚戀	南宋	
	眾名姬春風弔柳七	12		婚戀	北宋	
	單符郎全州佳偶	17		婚戀	南宋	
	臨安里錢婆留發跡	21		講史	五代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	22		講史	南宋	
	張舜美燈霄得麗女	23		婚戀	南宋	取材自《熊龍峰四種小說》之<張生彩鸞燈傳 >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26		公案	北宋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7		婚戀	南宋	
	月明和尚度柳翠	29		宗教	南宋	
	明悟禪師趕五戒	30		宗教	北宋	取材自《六十家小說》 之<五戒禪師私紅蓮 記>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34		宗教	北宋	取材自《六十家小說》 之<李元吳江救朱蛇 >
	任孝子烈性為神	38		婚戀	南宋	

警世通言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6		宗教	南宋	
	陳可常端陽仙化	7		宗教	南宋	
	崔待詔生死冤家	8		婚戀	南宋	
	計押番金鏝產禍	20		宗教	北宋	
	樂小舍拼生覓偶	23		婚戀	南宋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28		婚戀	南宋	
	喬彥傑一妾破家	33		婚戀	北宋	取材自《六十家小說》之〈錯認屍〉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38		婚戀	北宋	取材自《六十家小說》之〈刎頸鴛鴦會〉
醒世恆言	賣油郎獨占花魁	3		婚戀	南宋	
	小水灣天狐詒書	6		靈怪	唐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8		婚戀	北宋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16		公案	明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33		公案	南宋	
初刻拍案驚奇	陶家翁大雨留寶 蔣震卿片言得婦	12	凌濛初	婚戀	明	
	衛朝奉狠心盤貴產 陳秀才巧計賺原房	15		俠義	未標明	
	鹽官邑老魔魅色 會稽山大士誅邪	24		宗教	明	
	趙司戶千里遺音 蘇小娟一詩正果	25		婚戀	南宋	
二刻拍案驚奇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梅香認合玉蟾蜍	9		婚戀	南宋	
	神偷寄興一枝梅 俠盜慣行三昧戲	39		諷刺	宋	

型式言	千秋盟友誼 雙壁返他鄉	14	陸人龍	俠義	元末 明	同幻影 10
	吳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雪裏手	26		諷刺	南宋	同幻影 26
石點頭	感恩鬼三古傳題旨	7	天然痴叟	宗教	南宋	
	王孺人離合團魚夢	10		婚戀	南宋	
西湖二集	吳越王再世索江山	1	周 楫	講史	南宋	
	宋高宗偏安耽逸豫	2		講史	南宋	
	巧書生金鑿失對	3		宗教	南宋	
	愚郡守玉殿生春	4		宗教	南宋	
	李鳳娘酷妒遭天譴	5		宗教	南宋	
	姚伯子至孝受顯榮	6		講史	元末	
	覺閻黎一念錯投胎	7		講史	南宋	
	壽禪師兩生符宿願	8		講史	宋 明	
	韓晉公人奩兩贈	9		俠義	唐末	
	徐君實節義雙圓	10		婚戀	南宋	
	寄梅花鬼鬧西閣	11		婚戀	南宋	
	吹鳳簫女誘東牆	12		婚戀	南宋	
	張採蓮隔年冤報	13		公案	南宋	
	邢君瑞五載幽期	14		婚戀	宋	
	文昌司憐才慢注祿 籍	15		講史	唐末	

	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	16		宗教	南宋	
	劉伯溫薦賢平浙中	17		講史	明	
	商文毅決勝擒滿四	18		講史	明	
	俠女散財殉節	19		俠義	元末	
	巧妓佐夫成名	20		諷刺	南宋	
	假鄰女誕生真子	21		婚戀	元	
	宿宮嬪情滯新人	22		婚戀	明	
	救金鏗海龍王報德	23		宗教	元末	
	認回祿東嶽帝種鬚	24		宗教	南宋	
	吳山頂上神仙	25		宗教	明	
	會稽道中義士	26		俠義	元	
	酒雪堂巧結良緣	27		婚戀	元	
	天台匠誤招樂趣	28		宗教	南宋	
	祖統制顯靈救駕	29		俠義	宋 元	
	馬神仙騎龍昇天	30		宗教	唐	
	忠孝萃一門	31		講史	明	
	薰蕕不同器	32		講史	唐	
	周城隍辨冤斷案	33		公案	明	
	胡少保平倭戰功	34		講史	明	



歡喜冤家	伴花樓一時痴笑耍	6	西湖漁隱 主人	婚戀	南宋	
	乖二官騙落美人局	9		婚戀	明	
	兩房妻暗中雙認錯	13		婚戀	明	
	馬玉貞汲水遇情郎	15		婚戀	未標明	
	王有道疑心棄妻子	18		宗教	南宋	
	黃煥之慕色受官刑	22		婚戀	元	
十二樓	拂雲樓	7	李 漁	婚戀	北宋	
西湖佳話	葛嶺仙蹟	1	古吳墨浪 子	宗教	晉	
	白堤政蹟	2		講史	唐	
	六橋才蹟	3		講史	北宋	
	靈隱詩蹟	4		講史	唐	
	孤山隱蹟	5		講史	北宋	
	西冷韻蹟	6		婚戀	南宋	
	岳墳忠蹟	7		講史	南宋	
	三臺夢蹟	8		講史	明	
	南屏醉蹟	9		宗教	南宋	
	虎溪笑蹟	10		宗教	南宋	
	斷橋情蹟	11		婚戀	元	
	錢塘霸蹟	12		講史	五代	

	三生石蹟	13		宗教	唐	
	梅嶼恨蹟	14		婚戀	明	
	雷峰怪蹟	15		婚戀	南宋	
	放生善蹟	16		宗教	明	
二刻醒世恆言	栖霞嶺鐵檜成精	5	心遠主人	宗教	南宋	
	慶平橋色身作孽	12		婚戀	南宋	
五色石	兩納聘方成秦與晉	6	筆煉閣主人	婚戀	南宋	
豆棚閑話	范少伯水葬西施	2	聖水艾衲道人	講史	春秋	

註 1：話本小說中頭回（入話）故事雖然以西湖或杭州為背景，但其篇幅未及全卷內容 1/3 就不予收錄。

註 2：另外有些白話短篇小說書目不予收錄：

- (1) 東冶青坡居士《西湖遺事》，共十六卷，有十五卷採自《西湖二集》，有一卷採自《西湖佳話》，只是回目有更動，以惑讀者。
- (2) 錢塘漁隱叟《胡少保平倭記》，內容與《西湖二集》中〈胡少保平倭記〉相同。
- (3) 上谷蓉江氏《西湖小史》，文中所指的西湖乃是廣東博羅縣的西湖，非浙江杭州的西湖。
- (4) 錢塘陳梅溪《西湖拾遺》，共有四十八卷，但首三卷為圖，末卷為「止於至善」，故實為四十四卷，但基本上是三本書的選編。有二十八卷採《西湖二集》，有十五卷採自《西湖佳話》，有一卷採自《醒世恆言》，因此不重覆收錄。
- (5) 西湖浪子《幻影》其書乃是將《型世言》回目更動，重新翻刻。雖然其中有兩回故事，以西湖為背景，但在《型世言》都有收錄，因此不重覆

收錄。

- (6) 醒世居士《八段錦》第一段〈懲貪色〉只是改變了《古今小說》之〈新橋市韓五賣春情〉主人公的姓名而已，因此不予收錄。
- (7) 署「南陵風魔解元唐伯虎（寅）」《僧尼孽海》，全書共二十五目，三十二則，用文言演述，描寫僧尼不守清規、情慾愛憎的故事。雖然有幾則故事乃發生在杭州，但是依本書體制嚴格而言，不是白話短篇小說，因此不予收錄。

## 附錄（二）

### 明末清初小說作者與刊行和杭州有關書目

	書名	作者	說明
01	型世言	陸人龍	題「崢嶸館評定」，而崢嶸館主人為陸雲龍為杭人，今考證作者為其弟陸人龍。
02	歡喜冤家	西湖漁隱主人	西湖乃杭州名勝。
03	載花船	西冷狂者	西冷乃杭州地名。
04	弁而釵	醉西湖心月主人	西湖乃杭州名勝。
05	宜春香質	醉西湖心月主人	西湖乃杭州名勝。
06	西湖二集	周清源	據序知周清源著，明末杭州人。
07	天湊巧	西湖逸史	西湖乃杭州名勝，題「羅浮散客鑑定」。
08	貪欣誤	不題撰人	與《天湊巧》同「羅浮散客鑑定」。
09	清夜鍾	薇園主人	今學者多認為作者是陸雲龍，而他是杭人。
10	無聲戲	李漁	在杭州撰寫刊行。
11	（一、二集）		
12	十二樓	李漁	在杭州撰寫刊行。
13	跨天虹	鷺林斗山學者	又題「聖水艾納老人漫訂」，鷺林即西湖靈鷲峰，又名飛來峰。西湖又稱「明聖湖」，「聖

			水」可能是明聖湖的簡稱。
14	豆棚閒話	聖水艾納居士	西湖又稱「明聖湖」，「聖水」可能是明聖湖的簡稱。
15	照世杯	酌元亭主人	諧野道人作序於西湖。
16	一片情	不題撰人	後署「沛國樗仙題於西湖舟次」。
17	十二峰	心遠主人	首有戊申巧夕西湖寒士序。
18	二刻醒世恆言	心遠主人	與《十二峰》同作者，推測該書同樣編刊於杭州。
19	幻影（三刻拍案驚奇）	夢覺道人、西湖浪子輯	西湖乃杭州名勝。
20	濃情快史	嘉禾餐花主人	西湖鵬晏居士評閱，西湖乃杭州名勝。
21	玉妃媚史	古杭艷艷生	古杭情痴生批，古杭乃杭州。
22	朝陽趣史	古杭艷艷生	古杭乃杭州。
23	于少保萃忠全傳	孫高亮	乃杭州錢塘人。
24	韓湘子全傳	錢塘雉衡山人	武林泰和仙客評閱，錢塘乃是杭州地名。
25	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	仁和沈孟梓	錢塘乃是杭州地名。
26	禪真逸史	清溪道人	作者寓居杭州，在此刊行。
27	皇明中興聖烈傳	西湖義士	西湖乃杭州名勝。
28	醋葫蘆	西子湖伏雌教主	西子湖乃西湖別稱。
29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	不題撰人	磊道人序于西子湖。
30	樵史通俗演義	江左樵子	錢江拗生批點，錢塘江乃杭州名勝。
31	遼海丹忠錄	平原孤憤生	錢塘人陸雲龍序。
32	續金瓶梅	紫陽道人	序末署「西湖釣叟書於東山雲居」。

33	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	天花藏主人	亦題「西湖墨浪子偶拈」。
34	濟公全傳	西湖香嬰居士	西湖乃杭州名勝。
35	醒世姻緣傳	西周生	序中有「傳自武林」，而武林乃杭州古名。
36	西湖遺事	東冶青坡居士	西湖乃杭州名勝。
37	西湖拾遺	錢塘陳梅溪	西湖乃杭州名勝。
38	萬花樓演義	西湖居士	西湖乃杭州名勝。
39	繪芳錄	西泠野樵	西泠乃杭州地名。
40	剪燈新話	瞿佑	杭州錢塘人
41	包龍圖斷百家公案	安遇時	杭州錢塘人
42	東西兩晉演義	楊爾曾	杭州錢塘人
43	西湖佳話	古吳墨浪子	西湖乃杭州名勝。

註：以上資料從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等書目檢索所得。

附錄(三)

## 西湖短篇小說

### 內容題材比重表

	六十家小說	京本通俗小說	熊龍峰四種小說	萬錦情林	三言	二拍	型世言	石點頭	西湖二集	歡喜冤家	十二樓	西湖佳話	二刻醒世恆言	五色石	豆棚閑話	合計	比重 (%)
講史					2				11			7			1	21	19%
宗教	3	1			6	1		1	9	1		5	1			28	25%
婚戀	4	1	4	1	12	3		1	7	5	1	4	1	1		45	41%
公案		1			3				2							6	5.5%
俠義						1	1		4							6	5.5%
靈怪					1											1	1%
諷刺						1	1		1							3	3%
合	7	3	4	1	24	6	2	2	34	6	1	16	2	1	1	110	100%

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考書目

### 一．原始資料（小說類）

- 天然痴叟：《石點頭》，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
- 心遠主人：《二刻醒世恆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古本小說集成》，1990年。
- 古吳墨浪子：《西湖佳話》，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
- 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北京：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年。
- 艾衲居士：《豆棚閒話》，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
- 李漁：《十二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 佚名：《京本通俗小說》，台北：世界書局，1958年。
- 佚名：《熊龍峰四種小說》，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
- 周清原：《西湖二集》，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
- 洪楸：《清平山堂話本》，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馮夢龍：《古今小說》，台北：里仁書局，1991年。
- 馮夢龍：《警世通言》，台北：里仁書局，1991年。
- 馮夢龍：《醒世恆言》，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
- 凌濛初：《拍案驚奇》，台北：東大圖書，1981年。
- 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
- 陸人龍：《型世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筆鍊閣主人，《五色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古本小說集成》，1990年。

## 二．古籍資料（依照年代）

〔漢〕司馬遷：《史記》，台北：天工書局，1985年。

〔東漢〕袁康：《越絕書》，收於《四部備要》據抱經堂本第282冊卷14，台北：中華書局，1981。

〔東漢〕趙曄：《吳越春秋》，《四部備要》據平津館本第288冊，台北：中華書局，1981年。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店，1986年。

〔宋〕林逋：《林和靖先生詩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

〔宋〕《咸淳臨安志》，〔宋元地方志叢書七〕，台北：大化書局。

〔宋〕蘇軾：《蘇軾詩集》，台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

〔宋〕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

〔明〕張岱：《西湖夢尋》，台北：久博圖書公司，1987年。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



- 〔明〕張瀚：《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5年。
-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64年。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
- 〔明〕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 〔明〕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台北：三民書局，1956年。
- 〔清〕吳仕臣：《十國春秋》，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
-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台北：啟明書局，收錄於《隨園全集》下冊，1960年。
- 〔清〕范祖述：《杭俗遺風》，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 三．一般書目（依照筆劃）

- （義）馬可波羅：《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注 馮承鈞譯，台北：台灣商務，1962年。
- （法）泰納：《藝術哲學》傅雷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1年。
- （美）韓南：《中國短篇小說》，王青平、曾虹譯，台北：國立編譯館，1997。
- （美）凱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曉軍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
- （日）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年。
- （德）恩斯特·卡西勒著：《人論》甘陽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
- （德）恩斯特·卡西勒著：《語言與神話》于曉等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
- （英）佛斯特著：《小說面面觀》李文彬譯，台北：志文出版社，2002年。

王定璋：《白話小說 - 從群體流傳到作家創造的社會圖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1999 年。

王仲榮：《隋唐五代史》（上、下），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92 年。

王維先選注：《西湖詩詞》，台北：仁愛書局，1985 年。

王旭烽：《西湖新夢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王旭烽：《杭州史話》，杭州：杭州出版社，2000 年。

王平：《中國古代小說文化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 年。

王榮初選注：《西湖詩詞》，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年。

石昌渝：《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年。

老舍：《老舍論創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年。

李文初：《中國山水文化》，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年。

李修生、趙義山：《中國分體文學史·小說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吳剛：《中國古代的城市生活》，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7 年。

屈萬里、昌彼得：《圖書版本學要略》，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年。

居閱時、瞿明安：《中國象徵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杭州文化局編：《西湖民間故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 年。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胡萬川：《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94 年。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台北：丹青圖書公司，1983 年。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胡亞敏：《敘事學》，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年。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年。

孫楷第：《滄州集》，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徐志平：《晚明話本小說石點頭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91 年。

徐志平：《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98 年。

夏鑄九：《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出版社，1993。

馬振方：《小說藝術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烏丙安：《中國民俗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年。

- 高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87年。
- 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
- 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台北：木鐸出版社，1984年。
- 陳大康：《通俗小說的歷史軌跡》，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
-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
- 陳捷先：《明清史》，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
- 莊因：《話本楔子彙說》，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
-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人物類型與中國市井文化》，台北：學生書局，2000年。
- 曹文趣等選注：《西湖遊記》，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
- 歐陽健等：《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1991年。
- 閔宗述等編：《歷代詞選注》，台北：里仁書局出版，1997年。
- 張荷：《吳越文化》，瀋陽：遼寧出版社，1991年。
- 張俊：《清代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
- 黃清泉、蔣松源、譚邦和：《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台北：洪葉文化事業，1995年。
- 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 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 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
- 葉樹聲、余敏輝：《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
- 賈文昭、徐召勛：《中國古典小說藝術欣賞》，台北：里仁書局，1983年。
- 雷群明：《聊齋藝術通論》，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
- 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
- 趙世瑜、周尚意：《中國文化地理概說》，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 齊裕焜：《明代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齊裕焜：《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9年。
- 蔣寶德、李鑫金：《中國地域文化》(上、下)，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7年。
- 蔣夢麟：《西潮》，台北：金川出版社，1983年。

- 樊星：《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 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4年。
- 樂蘅軍：《意志與命運 - 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
- 鍾敬文：《民俗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
- 魏橋等：《浙江方志源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 羅鋼：《敘事學導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蕭欣橋選注：《西湖白話小說》，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
- 譚正璧：《三言二拍資料（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顧志興：《浙江出版史研究 - 中唐五代兩宋時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 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 四．學位論文（依照發表時間）

- 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73年。
- 禹東完：《聊齋誌異夢境與變形故事之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86年。
- 李世珍：《艾衲居士《豆棚閒話》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89年。
- 費臻懿：《古吳墨浪子《西湖佳話》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1年。
- 劉雪貞：《傳統小說中狐妻故事之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2年。
- 張淑芬：《周清原《西湖二集》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4年。
- 黃明芳：《馮夢龍編作三言的社會經濟基礎》，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4年。
- 汪蕙如：《「二拍」敘事技巧之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5年。
-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 - 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國立師範大學國文

系博士論文，2001 年。

## 五．期刊 單篇論文（依照筆劃）

宋莉華：〈汴京與杭州：小說中的兩宋雙城記〉，收於《女性的主體性 - 宋代的詩歌與小說》大安出版社，2001 年 10 月。

李大健：〈試論地域文化對作家創作風格的影響〉，《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2000 年 4 月。

何二元：〈地域文化二題〉，《文藝評論》1994 年 1 月第 2 期。

阿英：〈《西湖二集》反映的明代社會〉，收於《小說閑談四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吳禮權：〈《西湖二集》：一部值得研究的小說〉，《明清小說研究》1991 年第 2 期。

范宜如：〈話本小說中詩詞之運用及其意蘊 - 以「西湖小說」為例〉，《國文學報》25 期，1996 年 6 月。

范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7 年 第 2 期。

侯迺慧：〈從山林天籟、湖遊娛樂、到悲歌懷古：西湖題詠詩在唐宋元時期發展的三個階段〉，收於《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14 期，1996 年 12 月。

崇理：〈西湖香市〉，《佛教文化》1999 年第 2 期。

陳東有：〈再論運河經濟文化與《金瓶梅》〉，收於《金瓶梅文化研究》，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 年。

陳炳良：〈話本套語的藝術〉，收於《小說戲曲研究第一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

張學軍：〈尋根文學的地域文化特色〉，《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 第 3 期。

程勤：〈論杭州「絲綢之府」的形成〉，《絲綢》1998 年第 4 期。

劉子健：〈略論南宋的重要性〉，《大陸雜誌》第 71 卷第 2 期，1988 年。

劉勇強：〈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文學遺產》2001 年第 5 期。

鄭生勇：〈杭州歷史上的人口遷移〉，《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第 2 期，1997 年 7 月。

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收於《鄭振鐸全集》第 4 冊，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 年。

鄧紹基：〈談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兩個特色〉，收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文精萃 - 小說戲曲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